谁愿意遭受布拉格那样的命运？
每个人都渴望冲破缠绕着这座城市的忧郁气息。

# 布拉格

## 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

Prague Pictures, Portraits of a City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 著　张鹤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布拉格，欧洲神秘之都。这座被喻为“诱人的女妖”、“放荡的女人”和“邪恶的女巫”的城市，在可爱魅人中又具有一种撩拨人心的邪气。历史上深陷于抑郁、妄想和宫廷斗争之中的著名君主鲁道夫以及围绕他的众多占星者、炼金术士、魔术师和艺术家们惊心动魄的生平故事，将其神秘、荒诞且充满幻想的氛围延伸至今。在破坏和占领的“洪水”中，在混乱的迷雾中，布拉格展露出它夺人心魄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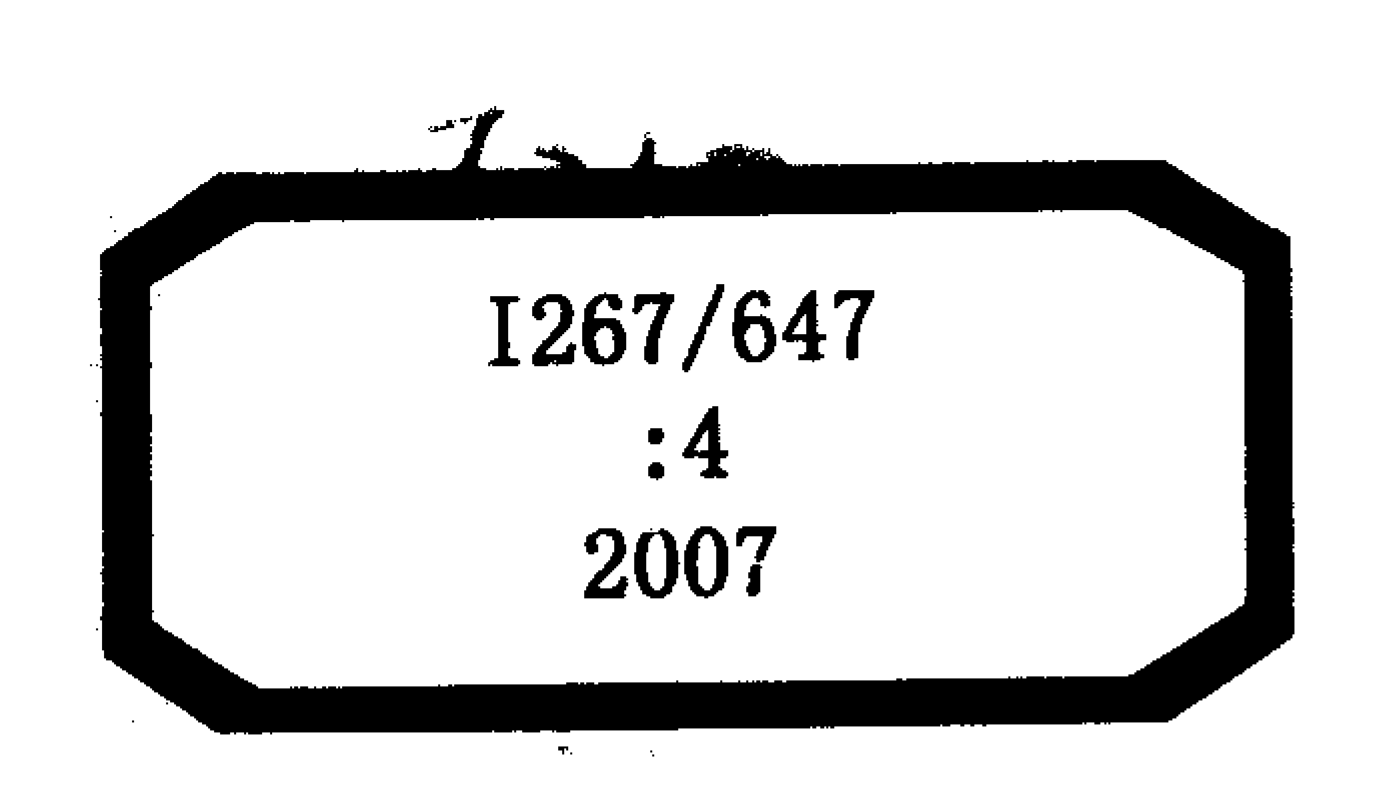
沿着布拉格的悲壮历史，约翰·班维尔向我们展开了布拉格阴沉忧郁的历史画面。在苏迪克这位建筑摄影师孤独的影像中，浮现出这座城市坚忍、明晰、真切且奇异、苍白、憔悴的美。走进布拉格，就是走进一个神秘的梦，走进它曲折忧郁的光影，走进它坚忍而骄傲的内心……


上架建议：文学·旅游

ISBN 978-7-80225-283-7

9 787802 252837 >

定价：18.00元




# 布拉格

## 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

Prague Pictures, Portraits of a City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 著　张鹤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爱尔兰）班维尔著；张鹤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9
（作家与城市）
ISBN 978-7-80225-283-7

Ⅰ.布… Ⅱ.①班…②张… Ⅲ.散文-作品集-爱尔兰-现代 Ⅳ.I56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9607号

---



**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 著 张鹤 译

**责任编辑**：赵 林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合|和|工作室·蒋艳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经销电话**：010-65276452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6.75
**字 数**：106千字
**版 次**：2007年9月第一版 200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283-7
**定 价**：18.00 元

---

# 购书须知

这本书不是导游手册，也无法做导游手册使用。很难说它究竟是什么，单一的主题由各种不同的片断组合而成，我试图通过记忆和想象重建一座城市。这是一首写给恋人的感伤的情歌，却永远得不到回应……许多城市都有一种特殊而强烈的魅力，但没有哪座城市像布拉格那样，对染上思乡病的游子的内心能产生如此巨大、奇妙的影响——他思恋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故乡，而是他离开的那座建在伏尔塔瓦河上的城市。旧地重游，他会觉得自己似乎从未离开过，却又因健忘、疏忽和不够忠实而愧疚。也许，这里所写下的，就是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的一个求和解的安慰性礼物，或者说是一封出自不忠恋人之手的道歉信。

约翰·班维尔

# 一　透视:苏迪克的城市

第一次到布拉格，是在冬天。一月的雪，落满一城，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在我最初的记忆中，似乎雪花将这座城市的寂静涂得更重了。布拉格的宁静无处不在，真切可触。尽管时有笛鸣钟响，马路上喧声四起，人语嘈杂，但这些汇聚的声音一触及到背景上的沉寂，就好像触到一扇建在大厦高处的玻璃窗，通通被关在窗外，没了动静。旅程之初，有许多可资回想的印象，我得费些功夫以使那些浮光掠影不至于影响到我对那座金碧辉煌的蓝色大教堂的记忆——应该有所选择，而不能随心所欲。20 世纪 80 年代初，正是冷战开始明

显地转入温和相持的阶段，但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已经呈现出结束的趋势了。我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时候，曾经期望自己先前获得的有关东欧生活状况的种种说法能够有所改变，但结果大失所望——大部分传闻竟是确确之言，真是令人沮丧；不过，别的地方倒是让我常有惊奇之感。

J.、G. 和我约定在特利斯特见面，两位女士在那个令人油然生出感伤之情的珠灰色港口足足滞留了两天才上岸——布拉格的雪在特利斯特就是雪泥。女人们盼着尽快离开，我到达的当晚就启程了，我们乘坐布达佩斯的火车，半夜在留比加纳换乘直达布拉格的卧铺。说是“卧铺”，却是名实不符，我们那节车厢，除了一个穿着细条闪光面料西装的大胖男人打着鼾声外，没有一个人躺下来睡觉。沿途，火车每到一处无名小站都要停下来喘口气，仿佛一匹病马站在黑夜中打着响鼻。好像经过维也纳的时候，我打了个盹儿吧？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境线，两个身穿厚大衣的士兵携带自动冲锋枪，进车厢检查护照。他们眉头紧锁，坚定而谨慎地来回翻动护照纸页，似乎没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让他们大为烦恼。他们带的枪设计得不太好，过于粗壮结实了，看上去不太好用，好像是用卡纸做的，拿来吓唬人。那个大胖男人还没睡醒，最后，他总算睁开眼睛坐起来，开始上上下

下地摸衣袋，弄出一些证件来，他咕哝了几句什么，那两个等着检查的士兵彼此对视了一眼，笑了。我在结了霜的车窗上摸出一环清晰的指印，透过它看见外面是一片足球场大小的空地，荒凉寂寞，寥无一人，闪亮的冰面上留着几块让人悚然心惊的印记。高架上有一座望台，明晃晃地亮着，灯光穿过冬夜的浓雾，宛若巨大的蒲公英。铁轨在远处闪着若隐若现的微光，一道道模糊不定的人影在交错的铁路线上像幽灵一样地滑动。我从窗边转回头，发现有人正用我旁边的燕麦色窗帘穗擤鼻子。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把它还给我，用一种听起来很像老式战争片中才有的低沉喉音诚恳地欢迎我到捷克斯洛伐克来。

我们住的旅馆——我怎么也想不起它的名字了——是一座光秃荒凉的水泥建筑，上面嵌着满是灰尘的玻璃窗。旅馆坐落在一条毫无特色的街道上，我后来在这个城市逗留期间再没找到过它，只记得它离温西斯广场不远。这家旅馆是专门为西方游客提供住宿的少数有正式批号的商业机构。我们所有人都曾受到警告说，我们被当局看做是兼职间谍，被非法的换钱者当做是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把美元的吝啬鬼，被年轻人看做是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和放荡小姐，尽管很有钱，甚至趾高气扬地自我炫耀，但却可能拿着几条牛仔裤到大街上去

卖，只为了赚上几块克朗。的确如此，我们刚刚走进旅馆大厅，就有一个满脸堆笑的年轻人迎上来，他穿着皮外套，两手轻快地插在衣袋里，用一种古怪的英语低声问我们要不要换钱，他保证提供“全市最高汇率”。为了证明他的服务质量，他刷地掏出一厚叠砖头大小的克朗，转眼间又送回了衣袋。因为无法表达纸币的缩写“kcs”，我们就送了它一个昵称，叫“咳咳 (kecks) ”(直译就是“呕吐”)。我们是第一次遇见这个不乏善意的小伙子，他不危险，也无犯罪迹象，反倒有点儿经理人的派头，你可以一眼就认出他来。他们往往带着一种职业微笑，表达近乎天真、率直，在这种表达背后潜藏着一种不失自尊的恳求，他的微笑正表明他希望小小的愿望能够获得满足。可我们还是遗憾地拒绝了他的服务，这自然也在他的意料之中。我们满怀暧昧的歉意继续往前走，因为未能回应这座危机四伏、穷困贫乏的城市向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求助而感到不安。在旅馆大厅的塑料棕榈树下，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杯冷咖啡，桌边坐着两个美得让人心疼的姑娘，她们穿着去年流行过的巴黎或纽约时装，手腕纤细，面色苍白，大大的眼睛周围涂满了青黑色的眼影，鼻翼轻翕，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这是另一种服务——只能是又一次遗憾地拒绝。

显而易见，我肯定是最糟糕的游客。服务生放下行

李，得了小费，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我独自面对暂时属于我的屋子，深感愕然和突兀，瞬间生出小小的惊慌：我怎么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安身之地真是令人愤慨，根本不像住人的地方，反倒更像一个四方盒子，床被巨大的床单严严实实地包住，椅子从不曾有人坐过，写字台也不曾有人伏在上面写过东西，房间里的服务菜单夹在一个塑料皮的文件夹中，单薄、寒酸、粘腻，令人大倒胃口，碰都不想碰。那块辨不出颜色的地毯，很像一件破烂的西装，让人煞是难堪。坐了一夜的火车，我一直没睡，感觉头晕眼花，但旅途的兴奋仍未消退，我爬上床躺下，两手叠放在胸口上，使劲盯着昏暗的天花板，看着它的通风孔和仿造的小号枝型吊灯。有一团形似口香糖的东西粘在天棚上，可能是前个房客留下的一个结实的纸团。此时本来正是细细地思考布拉格简史的最佳时段，我却毫无心思，一翻身坐了起来，跑过走廊去找J.和G.聊天。

为她们两人安排的房间比较宽敞，比我的大得多，一层冷雾薄薄地悬在空中。面对巨大而死寂的无声威胁，她们连行李都没打开，J.甚至还穿着外套。我们设想着早餐的样式。女士们浑身颤抖地说起在布达佩斯的格莱特经历的一次备受打击的早餐——她们掀开镍罐的盖子，有一只腰形盘，映到她们眼中的是一条灰色肿胀

的半环形香肠，浮在油腻腻温吞吞一寸高的水面上。我们琢磨着是否应该出去找家咖啡馆坐坐，尽可能在附近找一处当地人常去的地方，地方不大却很舒适，不像这间屋子那样令人心生恐惧。我们设想着那里有灰蒙蒙的窗子，一台铜制咖啡机，架子上放着报纸，对这种地方，我们相当熟悉，可在旅馆附近却根本找不到。还需要消磨几个小时才能到中午和教授见面。女士们忍着饥饿的折磨，决定上床睡觉；我则拿起一本旅游手册到河边去散步。

我比一位普通旅客更有好奇心。几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其中部分场景就发生在 17 世纪初期的布拉格。我写的时候，不认为创造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城市会比在想象中重建 17 世纪初期的生活更困难——所有的虚构都是创造，所有的小说都在讲述历史——不过，我仍蛮有兴趣想了解那种逼真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了解一下我的创造究竟有多少说服力。我的小说因“对时代的捕捉”精确生动而颇得读者的盛赞，出于感激和客气，我从未对读者的提问做过回答，我明白，他们赞扬的是我运用想象力的技巧，他们认为我有能力说服他们相信那些事就是那样发生的。不过，幻想有时会让人渴望看到具体的事物，就像在梦中得获预言的人渴望知道现实中的结果一样。有许多奇特的例子表明，当我尽心

尽力地虚构完某人某事后，它们就具有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另一部小说中，我虚构的一处多年前的场景实则是当今的波兰，我制造了——也许更恰当的表达是——我塑造了一个次要角色，一位军人，因情节的需要而出现在小说中，没想到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竟然确有其人。小说出版后，我收到了他的自传，是一位热心的波兰历史学家寄来的。虚构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那天早晨，查理桥荒凉至极，几乎不见人影，以后来此观光的游客会觉得很难相信这事。一般来说，从早到晚，这座布满了石头雕像的桥面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雾气在河面上升腾，微微闪光，那正是16世纪某个时候，我的主人公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乘游船从德国的乌尔姆市到达此地时的景象，他来这里是为了向皇帝展示星图的印刷件，他希望按照皇帝的名字把它命名为《鲁道夫星表》。在我的前方，朦朦胧胧地现出荷拉德卡尼城堡的影子，就像在那位离船登岸的天文学家眼前朦朦胧胧地出现时一样，城堡雄伟而空荡，玛拉·斯塔纳小区在前方不远处，开普勒做鲁道夫的皇家数学教师时曾住在那儿。天哪，我竟然早已看到了这一切，真是让我惊讶不已。可我为什么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呢？部分原因是，站在那儿衡量我的艺术创造结果，我被虚构本质的虚幻性所震动。想象一个冬天的

早晨、一条河、一座城堡、一位夹着书刚从船上下来的游客，它们纷纷从书页的空间——一个充满暗示的世界里走出来，进入这个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这完全是一种创造的技艺，一个大型的比喻。你可以继续想象下去，继续讲故事，继续尝试着去模仿盲目的命运女神的作为。

关于布拉格的美，可写的实在太多，不过，我不敢确定“美”是不是描述布拉格的最恰当的词汇，这座建在伏尔塔瓦河边上的城市，神秘、混乱、荒诞且充满幻想，它是欧洲三座神奇而不可思议的都市之一，另外两个是都灵和里昂。当然，它也有可爱魅人之处，只是这种可爱魅人具有一种撩拨人心的邪气。安吉洛·马利·里佩利诺在《神奇的布拉格》中有一首充满迷乱气息的颂歌《爱在这里》，他把这个城市描绘成一个诱人的女妖，一个放荡的女人，一个邪恶的女巫。“古董商喜欢卖弄她虚伪的沉静，她的幽寂似乎自古就被无数荣耀包围，那些凝滞不动的如画风景就像装在玻璃球中，这一切只增加了她的邪恶。她狡猾地通过拼写和字谜进入人的灵魂，那是她掌握的唯一钥匙。”里佩利诺的布拉格不是奇迹般地保存着宝贵的艺术珍品和古雅的艺术建筑的名胜之地，这些曾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城市极力宣传的东西，这些也是好莱坞电影关于莫扎特和萨莱

里的幻想故事中的背景；里佩利诺的布拉格是那个“有暧昧的走廊和可恶的通道……仍然散发着中世纪气味的”城市。在谈及咖啡馆时，卡夫卡写道，“在我们的时代，它是犹太人的地下墓穴”，就像“小酒肆”、“老夫人”、“三颗小星星”那样的小酒馆，他有时会逃离那些“暗藏凶险的小巷，令人走投无路的窄道”，逃向“那些环绕在布拉格周围的绿色小岛，鲜花盛开之地，公园、凉亭、花圃……”。就是这样一个古老的布拉格，令人难以忘怀，神秘、沉默、而又混乱无序，于1948年被共产党接管拯救，20年后苏联入侵，采取铁腕政策，最终使其屈服，直到1989年革命，才采取了和平过渡的“天鹅绒政策”。如今到处可见美元的踪迹，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心爱的牛仔裤，麦当劳就开在查理桥边。哦，有什么不行的？布拉格也有同样的权利像我们一样地享受大众消费。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吃便宜的汉堡包，就像可以自由地出版颠覆传统的诗歌一样。不过，说起里佩利诺，还是会觉得有些异样，他在罗马大学讲授捷克文学，于1978年去世，他告诉我们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他常常跑到德国，凝望东方，遥对着“波希米亚的重叠山峦”，仿佛一个忧郁的恋人思念他的远方情人，这处旅游胜地对他充满着无限诱惑。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热爱布拉格，她的混乱无序和

她的神秘沉默都为他所爱。他喜欢引用1893年威廉·姆尔什季克在小说《桑塔露琪亚》中使用的那个奇异意象，这个城市让小说主人公联想到“一列嘶叫着的火车从她和那些新生的人群、那些新的牺牲者身上碾过，所有的一切都在渐渐地消失，重归大地深处”。

里佩利诺尽最大努力所做的就是在表述这个城市的时候，不会被它吸附消泯，不会让自我被这个世界异化，这也正是里尔克所说的我们生于此世的任务。仅靠一本旅游手册，走马观花地游遍一座城市的名胜古迹，你根本无法真正了解它。可是，你又如何能完全认识像布拉格这样一个变化多端、令人无从琢磨的城市呢？布拉格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隐藏在美丽的老城广场上吗？——那里有咖啡馆和著名的钟楼；隐藏在周边的远郊里吗？——那里有沉闷的水泥建筑群，大多数布拉格人都在那儿过着非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时光的记录有如岩层的重叠，玄武岩层的普热米斯尔王朝处在最底层，上面是岩灰与金刚石合层的哈布斯堡王朝，然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花岗岩层，最上面就是当今疏松多孔的石灰岩……那么，哪一时期的哪一处地方所代表的才是其最美好、最真实的景象？我年轻的时候曾以为，要真切地了解一个地方，就要到它的中心腹地去，你一定就会爱上那里。有许多城市在我面前展开了她们可爱的四肢的轮

廓，而有多少个布拉格就需要用多少只眼睛去观看，不，还得更多的眼睛才行——布拉格简直大得无边。我满怀惆怅、郁郁寡欢地走回旅馆，冰雪让我的脸凉如玻璃。

我们三个人在女士们的房间里等教授来，大家都有点儿焦虑不安，或许是因为先前的期待过于强烈了吧。我们到布拉格是带着使命的。G. 认识一位年轻的捷克移民，最近刚到纽约，我姑且称他米洛斯吧。米洛斯想在哥伦比亚学建筑，在读期间，他一时还找不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他的父亲认为有办法帮助他，他有一些艺术作品可以卖掉，能卖不少钱，可是把这些珍贵作品带出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容易。我们是自愿帮忙的，打算把它们偷偷带出去。我和 J.、G. 在都柏林和加利福尼亚打国际长途商量这事，这看起来绝对是鲁莽的冒险之举。冬日的光线从铁幕后面照射过来，我们不免顾虑重重。那个时候，西方游客因最微不足道的走私行为被抓，一关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故事在旅游者中非常流行，大使馆的领事或公使出面也无济于事。我经常沉湎于那种无聊的空想中，认为一间单身小牢房也许是最好的写作空间，不过，在东方的集体监狱中度过一段有始无终的日子，我对这种暗淡的前景实在不怎么看好。J. 和 G. 向我描述的格莱特的那只香肠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总之，或许是因某种内在的联系，我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像那只香肠

一样因时间太久而布满渍点，抽抽巴巴，它不是漂浮在镍盘的水中，而是突然落在一只锈迹斑斑的锡盘子里，旁边还有一块灰绿色的厚面包片……此刻想打退堂鼓肯定是来不及了，门外响起了教授轻轻的叩门声。

他又高又瘦，面色苍白，密密的短发覆在额前，那是北欧人的发型。第一眼看上去，难以确定他的年龄究竟是30岁还是60岁。他相貌英俊端正、近乎完美，长着一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面孔，却又带着某种特别的谦逊。即使此刻他站在我眼前，我觉得也很难完全清楚地认识他，似乎在原本清晰的记忆的印痕上，有一道裂纹突然迸裂开来。我想他一定用了许多年时间试图让自己不被那些当权者、警察、间谍和告密者注意，他表面的真实已经消失殆尽。他很像那种刚刚谢幕的演员，虽洗尽铅华，面孔却多少受到蚀损。他用一种郑重、细腻、颇富中欧风格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握手，带着忧郁的微笑，那种感觉不像是与我们初次见面，倒像是与我们做最后的道别。他的英语表达相当准确，微微有点儿口音。他用温和沉着的语气欢迎我们到布拉格来，似乎我们到的不是布拉格而是他自己的领地。在这里，我们多次听到这种具有归属感的语气表达，在知识分子圈里尤甚。这些艺术家、批评家、学者带着流放者的激情认为这是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历史，虽然破败但仍然辉煌，

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神秘，这是他们赖以维生的观念，但许多珍贵的事物已经从他们的生命中被拿走了。我带了一瓶免税的爱兰尔威士忌作礼物，教授叫道：“喔，是詹姆森!”语气间透出他对这份珍贵礼物的熟识，似乎它来源于某个神奇的产地，就像中国的丝绸、撒马尔罕的香料。他从我手里接过酒瓶，动作灵巧优雅，同时带着真诚的感激。怎么说呢，就是“courtly”——彬彬有礼而不失尊严。这让我大为震动，我从未见过哪个人能如此恰当地合乎这种表达。

他在房间里踱了一两步，我关房门的时候留意到他无框眼镜后面闪动的不安，或者毋宁说闪动着警觉。他静静地握着威士忌站在那儿，双臂绷在两侧，灰色风衣一直扣紧到喉咙。G. 说起我们三个来到布拉格的使命，他听了，立刻竖起手指，贴在嘴边，让她别出声，然后指指天花板中间那只落满灰尘的灯具。这是布拉格的另一种姿态，总是带着凄楚的抱歉的微笑，对此，我们虽不陌生，却很沮丧。的确，在各个地方都藏着窃听器。

我们走进大厅，教授认为在那儿谈话比较安全，当然也得压低声音才行。先前那两个漂亮的黑眼睛姑娘已经走了，塑料棕榈树下面的桌子上留着两只空咖啡杯，杯子边缘印着一道道红色的唇吻。教授说，有大约 20 张照片，他希望我们能把它们带给他儿子。我本以为是

油画，原来是照片，是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捷克大师采用原始的接触印相技术制作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教授不乏忧虑地说，如果我们觉得把这批东西带出国有些为难的话，一定别客气，他可以再想别的办法把它们送到纽约。可是，很显然，我们是他唯一的希望。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说，我们一定要帮他。他又带着那种痛苦而忧伤的表情微笑了一下，清清喉咙，小心翼翼地用中指推了一下眼镜中间那道不太结实的金色横梁。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晚上到他家去吃晚饭，在那儿，既可以看到照片也可以见到他的妻子。这时，通往餐厅的两道门在我们身后打开，两个侍者从里面出来，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只浅托盘，上面摞着一叠用过的碟子，他们的脚跟与脚尖同时旋动，并列而行，仿佛老音乐片中那些举止讲究的男芭蕾舞演员。随后，两个人昂着头朝厨房的方向走去，毫不费力地托举着那堆高高的东西。房门打开的一瞬，我们瞥见了几处细节，房间里有一张主餐桌。那是一张圆形大桌子，可容 6 到 8 个人围坐。毫无疑问，我的记忆因偏见而夸张了我在那一瞥间的印象——许多猪挤在饲料槽前边。教授叹口气说：“俄国佬。”他们呼呼噜噜地大吃大喝，根本没把餐厅里的其他人放在眼里。两年后，在布达佩斯，我又见过他们一次，大约有 12 个人，当时，我很不明智地应

邀去欧洲参加一个有关安全与合作的讨论会[1]，那是一个关于冷战的清谈俱乐部，现在肯定解散了。会议的原意是希望促进东西方作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但事实上，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和俄国人彼此表达着不满和轻蔑，而把其他国家的代表看成是无足重轻的三岁小儿不予理睬。苏联代表团是作家协会成员，领队是一个面色灰白、脸如刀刻的男人，穿着松松垮垮的西装，吸着变了质的香烟，一口糟糕的牙齿，午餐休息时间他们霸着咖啡厅里最大的桌子，边吃边说，连呼带叫，将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胜利感尽情地表露出来。当然，如今回想起来，我仍然纳闷，是否他们以及与他们相似的在布拉格餐厅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要让自己的高叫压过别人的声音——因为那些贴近他们的耳朵悄悄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冷硬的内心早已知道——到卫星城进行一场短途旅行、到俄国郊外的别墅度假、在莫斯科狂欢纵饮、自由兑换外币等等，所有在极权国家被当做特权的东西，正在走向终结，一切很快就被新兴的黑手党阶层、犯罪集团和奢靡无度的总统家族的成员所控制。

---

① 我是CSCE会议的参会者。尽管说起来并不情愿，可有种感觉还是油然而生，平心而论，美国人的言辞态度要比他们的东方集团的对手温和文雅，自然穿戴得也整齐些，但前者的举止言谈里也透出一股恬不知耻、大肆炫耀的伪善，甚至将此当做一种与众不同的标记——只能用这个词，他们对当地的亲美者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种族宽容和关心的态度来，尤其是以此态度对待两位美洲印第安作家的遗产，要知道，那个地方本来是那些勇士们的故乡。——原注

不过，迄今为止，这些代表仍然一个都没少，莫斯科的政客仍然伸着长长的猪嘴四处打探。尽管隔着两道半透明的门，在房门旋开轻合的刹那，他们一对一对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最后一个，肥头大耳，我们看见他坐在桌子的首位，后背冲着我们，贴在椅子下的脚套着一双粗肥的黑鞋，仿佛两只胖大的猪蹄，两条裤管拉起来，露出两只皱皱巴巴的灰色短袜和两块肥胖多毛的腿肚子，直到最后，他们全都消失了。

教授打算向我们介绍一些有关布拉格的事。我们非常感谢，同时也很担心在工作日的早晨这样拉着他谈话会耽误他的工作。他笑了一下，说，现在他的时间可谓绰绰有余。他解释说，他卷入了1976年底由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共同签署的人权声明即七七宪章运动，当权者曾下令逮捕摇滚乐队队员和艺术家，他本来是位艺术学教授，如今已被大学辞退。从这以后，他和妻子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过活，政府曾多次威胁要停止这种供应，倘若他坚持要和那些堕落的反革命集团继续保持来往的话。他认识瓦茨拉夫·哈维尔，后者那时还关在监狱里。1976年以前，确切地说，早在1968年以前，他经常在咖啡馆和小酒店里会见他的那些老朋友，他们在那儿的谈话曾被便衣警察监听过。教授时不时地就会被警察局传唤、审问，其实当局知道得很清楚，他早就被

剥夺了政治权利。他用一种不乏倦怠和苦涩的幽默语气向我们解释这一系列过程。早晨会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通常在黎明时分，那时他还躺在床上，一个友好温和的声音问他是否介意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一幢大楼里去一趟，每次地方都不一样，然后是谈话。打电话的人会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谈次话，他根本不用担心，别太着急，车在外面等着，他好好准备一下就是了。然后，他立刻起床，收拾整理出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睡衣睡裤、干净的衬衫、换洗的内衣、袜子、剃须用品和最最重要的牙刷，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为他准备咖啡和面包卷。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他说，听起来有些奇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人几乎不说什么话，只是忙着事务性的琐事，尽管事实上，他们两个都知道，也许这一去，他们再也见不到对方了。有些朋友和熟人也这么被传唤过，“谈次话”，然后就再也没回来。教授告诉我们，到了那幢指定的无名大楼——它通常在城市中某个相当丑陋的广场上，他就会被关进一间窄小、无窗的房间，除了一张铁制桌子和一把呆板的椅子外，别无他物。他被指令填写一叠办公表格，将他自己及父母、妻子、儿女的种种生活细节都一一地陈列出来，他心里清楚，此时正有许多双眼睛透过他面前的那道墙上的双向微型装置观察他。随后，审讯者迈着悠闲的步子进来，

神态轻松，面带微笑，同时也具有无限的威吓力。

教授说，在押期间，在连续三天三夜或更长的时间里，6个审讯员每隔半小时轮流审问他，但他从未遭受过皮肉之苦。类似的秘密警察机构无处不在，无论是国家安全部还是情报局都备有大量资料。天鹅绒革命之后，许多文件被公开了，情报局的名册上竟有数万名密探，能开列出这么一张单子来也真是不容易。教授说，通常，他们会天南海北地闲谈一番，从他有可能谈及和愿意谈及的人或事入手，对此，他别无选择，只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许多年以后，另一位捷克朋友，也是七七宪章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作家兼翻译家兹德涅克告诉我，1989年之后的一天，他在市中心散步，偶然看到街道对面有个人就是当年审问过他的审讯员，他想也没想，就冲那人大喊，声音穿过了拥挤的人流，他喊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似乎这是世界上他最想知道的、最重要的事。那个密探审问员怎么样，我问，希望听到他急忙竖起衣领，满面含愧地偷偷溜走。"哦，"兹德涅克耸耸肩膀，说，"他冲我笑着摆摆手，喊道：'嗨，你好吗？'然后继续走他的路。"

这时，我们来到兹拉塔·乌里斯卡即著名的黄金巷，我们沿着荷拉德卡尼城堡外面的围墙走得很艰难，我不知道怎么到的那儿。事实上，我几乎不太能想起来我第

一次在布拉格旅行时都乘过什么交通工具了。我们肯定坐过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尽管J.有幽闭恐惧症，我们还是乘过地铁，地铁倒是异乎寻常地干净整洁。不过，我还是无法想起我们坐的那些交通工具。我们就那样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在某个空隙间，又去了什么地方。唉，记忆女神的神奇之舆是多么容易溜走啊!

古老的黄金巷首尾两端都铺着圆石。一簇簇小房子沿护城河边的墙壁而起，是16世纪末鲁道夫二世为24位城堡守卫队员建的。人们会奇怪，为什么只有24个人？有关历史的最简单的叙述往往容易引起困惑。17世纪，黄金巷的房子主要是城里的黄金匠们居住，因此得名。让人好奇的小街有许多传说，例如，鲁道夫的那批炼金术士就在这里建立实验室，毕竟，炼金术士也是金匠之一种，这也许可以解释街名来源混乱的原因吧。想到那些炼金术士和他们的蒸馏器皿挤在狭窄逼仄的小屋子里，这场景让人感觉很有意思，不过，我手中的旅游手册上却另有说法，它以一种显然是责备的口吻说，不管民间有什么样的传闻，鲁道夫的那批炼金术士根本没在黄金巷待过，而是被禁闭在维卡斯卡巷，在圣维特大教堂的北面。哦，对了，对了，我们不久就去参观了大教堂。让我印象颇深的是，我从教授那儿听说，卡夫卡在黄金巷22号住过一段时间，如今，他的现代同乡，

捷克大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①]就住在此处[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捷克大预言家德·特贝丝太太住在4号。还有更多的神奇……

真的，身在布拉格，怎么能略过卡夫卡呢？我们不知道能否有机会去参观一下他的出生地。这个嘛，教授皱皱眉，说，咱们可以去看看那所房子，不过，那栋坐落在塔楼旁边的建筑最初是属于圣本笃教团的，1887年被烧毁，几年后卡夫卡一家搬到了位于温西斯广场的一处新公寓楼，早期的楼房全都保存着，前门是石头做的。一块出自雕刻家卡雷尔·赫拉迪克之手的小标牌高高地挂在门边的墙上。1963年在里比利城堡召开了一场关于卡夫卡的著名讨论会，1965年建立了纪念馆。那场讨论使官方接受了这位布拉格最伟大的艺术家，把他看做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堕落和冷漠予以尖锐抨击的批判者[①]。教授解释说，此前，从官方角度来

①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1901~1986）：捷克诗人，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② 1916年11月，卡夫卡和他最心爱的姐姐奥特拉租住在黄金巷22号。卡夫卡单独有一间房，不过，好像里面没有床；在他离开保险公司的那段时间，他整天在这儿工作，然后去吃晚餐，午夜时分在老城堡的石阶上漫步，穿过马尼斯桥走进坐落在老城区的美泉宫旁边的公寓。他在黄金巷住得很高兴，在给女友费丽丝·波尔的信中，他写道：“有座自己的房子真是很不一样，你可以锁上门走入外界，它不是屋子，不是公寓，而是一座房子。走出家门，可以直接走进小巷宁静的雪中。”其实环境并不舒适，卡夫卡经常需要临时预备些东西。一天，他回到家中，发现炉火灭了，他告诉奥特拉说：“我把所有的报纸和手稿都拿过来，只要一小会儿，温暖可爱的火苗就会燃烧起来。”老天，所有的手稿……——原注

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是没有卡夫卡这么个人的。捷克当局一直在禁销他的书籍，而且声明无论是那些书还是它们的作者都不曾存在过。对这种简单化做法你不得不佩服，这种试图完全抹掉一个人的生活及其在黑暗中闪烁光芒的作品之举，真是令人恐怖和厌恶。

我们沿着陡然上升的街道一路前行，松软的雪块在我们脚下咯咯吱吱地响。在这座山城，喧哗的雪声伴随着我们，仿佛某种扰人平静的絮语。我们沉默无言，追想着卡夫卡在他的祖国竟然被人活生生地抹掉那么多年，这听起来可真是……真是太具有卡夫卡的风格了，这让我们深感不安和抱愧。不过，教授看起来似乎不像我们那么不安，在那些日子，在想起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想到它在苏联控制之下所处的困境、所受的限制与沉默，以及里佩利诺用一句文绉绉的短语“凯列班的统治”[2]表达的轻蔑之情时，布拉格有良知的民众的尴尬是以一种极为微妙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你可以设想，对于所有被征服的人民来说，那是一种全民共有的痛苦，面对陌生来访者的眼睛，他们赧然无语。19 世

① 卡夫卡对待自己故乡的态度是爱恨交织的。1902 年，他写信给朋友奥斯卡·波拉克，说：“布拉格不放手，我也不放手。这个又老又丑的老太婆长着爪子。我们得在两个地方——费塞拉德和城堡给它放把火；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离开。或许，在饮宴狂欢之前你可以仔细考虑一下。”——原注

② 凯列班：系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后比喻丑恶残忍的人。——译注

纪40年代，爱尔兰发生了一场悲惨的饥荒，当时乡村的情况近乎绝望——反对英国统治者的起义接二连三地爆发，又相继失败，经济陷入崩溃，实际上就是——饥饿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切断了与外界的往来，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插上门闩，封住窗户，拒绝外界的关注，等待死亡降临。他们并不认为这种不幸是无缘无故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相信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无论是初次还是后来对这个城市的参观游览中，当布拉格的某些旧日相识在许多年后成为我的朋友，我仍然没有勇气自以为是地问他们，在1968年，是否捷克人对自己莫名其妙的失败、对自己未能在苏联坦克进入之时奋力抵抗而感觉失望。可事实上，他们又能做什么呢？那些正当花季的孩子们，又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莎士比亚曾用美妙悲伤的诗句问道："美如何能含怒而辩？她难道能比一朵鲜花更有力量？"那个时候，我们都想起匈牙利人6年前的起义，城市的废墟里、大街上、碎石路面都铺满了尸体。谁愿意遭受布拉格那样的命运呢？

自然，每个人都渴望冲破缠绕着我们的忧郁气氛，开始说起城里那些仍然活着的作家，他们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局无法否认。教授把我们带到一个文学酒吧吃午饭。它藏在老城广场和大河之间一条狭窄曲折的街道里，那是一个褐色的地方，窄长、低矮，里面摆满长条

凳、三脚凳，还有烟熏的天花板——至少，教授是这么描述它的，它是虚构中的“金色老虎”吗？我立刻想起这是波希米亚人翻译的一本书，那是都柏林市波尔伯格街上一家爱尔兰小酒店。不管是不是“金色老虎”吧，那天店里可真是热闹非凡。爽快的酒吧侍者手里晃着一升装的皮尔森啤酒杯，一边将成堆的香肠和土豆分给遍布四处的喧嚷的客人。店主娴熟而严肃地经营着自己的买卖，让人不由得想起马戏团里的魔术师用魔棍和旋转的盘子变戏法的情景。空中缭绕着水蒸汽和烟雾，蒙了一层雾的镜子上有几道浅痕，映出侍者们成双成对地奔来跑去的身影。我们让教授把最好的或者至少是最有名的作家指给我们看，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一位赫拉巴尔或者斯克洛夫斯基。教授向四处仔细地张望了一下，然后咳嗽了一声，用指尖推了推眼镜的间梁，现在我明白，这个动作意味着接下来将是满怀歉意的解释。今天的文学界没多少突出的分量。临窗而坐戴着围巾的那位，摆出一副作家的架式，却从未出版过什么东西，至今没人说起读过他的某部作品。坐在墙角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金发碧眼，依然美丽，据说和塞弗尔特有过绯闻。那个一头银发、神情倨傲、头昂得像只公鸡的家伙 20 年里一直热衷于将乔伊斯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翻译成捷克文，据说他是警察局的密探。那一位，就是正从

房间那边向这边看的面色忧郁的老人是斯沃博达，是一位批评家和通俗小说作家，自1968年起，他的名字就被禁止印到出版物上。我对教授说，他无需感觉抱歉，在60年代初的都柏林，当大作家们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闯入麦克迪、派里斯或者爱尔兰人酒吧，希望能遇上布伦丹·贝汉①或者帕特里克·凯文纳，可惜除了一些像我一样眼露烦躁之色的文学爱好者和某个行为乖僻、身无分文、企图蹭一杯酒喝的末流诗人外，我没遇到过任何名家。教授无力地笑笑。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的说法，只把这当做一种善意的同情。生活，就像昆德拉的小说标题一样，在别处。

午餐。啊，也许这正是谈谈捷克饮食风格的时候，然后才能说那些更有味道的题目。我的捷克朋友们，我非常在乎你们，不想得罪你们，所以，请明智地跳过下面的这两段——我事先可是提醒过你们的。我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吃到过糟糕的饭菜。多年前我在伦敦一个朋友家吃过一盘通心粉，上面布满了牛腰肉丁，做得难吃极了，那是格鲁博小姐的手艺。说真的，那味道，我一辈

① 布伦丹·贝汉（Brendan Behan，1923~1964）：爱尔兰剧作家，民族主义者。因参加政治活动被送入青少年犯教养院3年，判处14年监禁，6年后大赦获释。剧作《死囚》、《人质》均以苦涩的幽默和冷嘲反映监狱中工人阶级的生活，贝汉的剧作很像意大利16~17世纪的假面喜剧，演员时而表演，时而与观众交谈，语言生动活泼，并经常杂以爱尔兰粗俗的歌曲和戏谑讽刺。——译注

子都忘不了。在一个离布达佩斯不远的可爱小镇有一家旅店，我曾在那儿面对一只热气腾腾的大盘子，上面是鹅肉片、捣碎的土豆和泡菜，三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级渐变的灰色度，而且还闪闪发光。一个绚丽的秋日下午，在奥加卡，我看见午餐的小盘子里装着还算悦目的绿色拉，想都没想就吃了下去，结果不知道是哪一只大肠杆菌竟然顺着我的消化道一路穿梭，像粒墨西哥跳豆一样忙个不停，贴着我的肠壁有三个月之久，时不时地在里面弄点儿事情出来。就不必说我在布拉格的饮食经历之惊险了，和它们也不相上下。事实上，有那么几年，我在那儿也吃过几顿美味佳肴。众所周知，人们对巴伐利亚的饮食评价甚低。不过，一般而言……据说……我个人觉得……就是……捷克的饮食吧……那个……可真不比巴伐利亚好多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德国东南部雷根斯堡市的一家德式小酒店……算了，那是另一个故事，在另一个城市。[①]

捷克人和巴伐利亚人毗邻而居，两国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共通之处，他们最喜欢的食物莫过于布丁了。其微妙之差似乎只在于它们一个好像我们小时候叫的“纳可

---

①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说不久前，我在捷克的库特纳·荷拉镇开普勒啤酒店的菜单上看到的对一道菜的描述：“鸡胸内覆香蕉，香蕉拌以冰激凌和葛利奥丝的杏仁酱。”我马上要了一份易懂的英语菜单。顺便说一句，葛利奥丝是一种樱桃利口酒，就我所知，我从未尝过这种酒。——原注

乐”——一种坚硬的弹子，一个好像那种被水浸坏了的网球，不过，它们的质地和口感应该相差无几。捷克布丁的黏度变化较大，从最一般的面包布丁到土豆布丁，通常会配上一种闻起来有股泔水味的白色泡菜，此外，还有一种较为少见的水果布丁。也许捷克布丁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黏度了。这小东西坐在盘子里，又白又嫩，胖墩墩热乎乎的，倘若你胆敢举起餐刀去切它，刀锋肯定会被那股多情的黏力紧紧地缠住，布丁上切开的刀口会发出叽叽咕咕的响声，刀刃一离开，切口会马上复原，粘合在一起。许多食物都可以给布丁做配菜，无论是最为普通的热狗还是较为厚实的煮熟的牛肉片。它也可以有单独为其准备的配菜，比如丝梅特纳，这是一种又酸又甜的调味酱。那天，在“金色老虎”——姑且是叫这名字吧——食物的简单粗陋令我们大为惊诧，盘子里只有几根苗条得让人忧虑的烤香肠，还有一块厚实完好的黑面包，被泛着气泡的金碧辉煌的捷克啤酒浸湿了，闻起来很像盛夏季节被热浪烘焙的草地的气味。当然，当然，除了这次，还有别的进餐时刻，噢，记忆女神转移了她的视线……

午餐之后，我们觉得不妨去参观一两个画廊。G.在旧金山的当代艺术展览馆工作过，对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品颇感兴趣。教授又轻轻地咳了一声，又伸出指尖推

了推眼镜横梁。主要的展览馆……包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家博物馆……从70年代起就已经关闭了，他如是说。关闭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倘若去询问布拉格的那些“不知名的权威们”，他们会用一套陈词滥调对付你，那些说法既不新鲜尖锐也不迂腐简单，反倒充满活力，不是轻蔑地不予理睬，就是言辞极为无礼，同时又小心地保持着表达的含糊，振振有词地宣称整理和修复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可惜，从未有过任何积极恢复的迹象。当教授与其他学者为近10年来艺术创作的停滞而忧虑时，他们受到警告的次数也便随之增加。

谈及艺术建筑时，教授要带我们去看看圣维特大教堂。我们再一次登上荷拉德卡尼小山，奋力爬行在花岗岩的台阶上，小说家古斯塔夫·梅利克会以其惯用的开玩笑的方式这么写：“四个人鱼贯而行，后面人的脑袋瓜顶着前面人的脚丫。”下午的太阳隐到了密云的背后，阴霾的天空飘落大朵大朵的雪花。在我们眼前，大教堂高耸挺拔，直插云霄，“美得疯狂”。菲利普·拉金喜欢把大教堂描绘成一艘长着尖塔顶的大船，搁浅、停靠在百塔之间，四周是气浪喧天的暗礁——那些珊瑚色的巴洛克式宫殿。大教堂也是出手大方的查理四世不惜重金给布拉格留下的一份礼物，1344年开始动工，到1929年仍未完工——不知是否有人曾认为这样的建筑

物还有完工的时候。第一位建筑师是法国阿拉斯布市的马太。金色大门由三道哥特式拱门组成，上饰精细的边带，出自彼得·巴雷之手。仰头远视，整个教堂似乎正以飞快的速度刺向云霄，直入虚无之境。说到建筑物上的怪兽饰，另一位不为布拉格认可的儿子里尔克称其为“漫画、丑像”；对那些怪兽饰，我一直有种疼痛感。塞弗尔特在《登查理石桥远眺》一诗中写道：

有些时候城堡
和大教堂
闪动着幽昧的奇丽
那些砌墙的石
黑沉阴暗
仿佛采自月宫

我们走进教堂，刹时堕入巨大而悠远的寂静之中，无声的影子、古老的气息，冬日苍白微弱的光线从头顶的玫瑰花窗渗透进来，我无声地抬头仰望，褪色的玻璃窗显得过于华丽了。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地区》中，有一首《登荷拉德卡尼山》，写他在某一时刻体验到了一种现代人的恐惧，塞缪尔·贝克特将其翻译过来：

在圣维特的玛瑙里
看到自己的样子
真是令人心惊
那就是你悲哀欲绝的时刻
就像大白天里
那个疯狂的拉撒路

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教堂中厅的地板上响起，时不时地发出令我自责的回声。我走进圣温西斯的小教堂，那块游人本可以自由逡巡的地方，如今被一条天鹅绒带子拦了起来，对于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这道禁忌虽看着客气却不可忽视。葬在此处的是温西斯一世，一位值得赞颂的君主，是普热米斯尔王朝的第四代国君，935年，他那可恶的哥哥博莱斯拉夫下令将其谋杀于这块圣地。旅游手册上说教堂内室墙裙上的“c1372”字样是用宝石镶嵌成的，果然如此；那个简洁精致的“c”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温西斯小教堂的北门有一只动物——别人告诉我那是一头狮子[①]——嘴里紧紧衔着

① 不过怎么看那头狮子都更像是一只快活的狗，如果不说是过于活泼的小狗，它很像短篇小说作家扬·聂鲁达描述的那只圣温西斯的狗，它就在小教堂主塔楼后面的一幅图画中，可惜我怎么也没找到它。顺便再提一句，根据史书记载，温西斯并非被谋杀于圣维特教堂，甚至都不在布拉格市内，而是在附近的一个名叫斯达拉·波莱斯拉夫的小镇。——原注

一口铜钟，据说国王被害时紧贴着这扇门。

把教堂看做是慰藉和避难之所，对此，我一直深感惊讶。相反，对我来说，尤其是这个庞大的天主教教堂，似乎是一个只与痛苦的赎罪和流血仪式相关的毫无感情的纪念碑，峭硬、冷漠、无情，华莱士·史蒂文斯关于“古代殉道者的神圣沉默”的说法使其更显沉重。多年前，一个暮色微沉的黄昏，我曾在津巴布韦首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旁听过一次唱诗班的彩排，当时，我吃惊地发现，我7岁的儿子因为恐惧站在我的旁边悄悄地哭泣。我尝试着安抚他的时候，想起童年，虔诚的母亲常常强迫我长时间站在这种地方。瞬间，我从一个父母都是无神论者的小孩子身上看清了一个景象：那些愁苦的雕像、褪色的玻璃窗上侧目而视的殉道者画像和色彩斑驳的一排排旗帜，以及雕刻而成的布道坛……一切都散发着狂热而令人惊惧的气息——拉金说的没错。儿子后来告诉我，最让他害怕的是唱诗班的领唱在歌曲的间奏中，对着话筒发出的一阵阵低沉的宣告与激励；它们听起来一定很像上帝在天上发出的怒责，厌倦而可怖。

但我知道，倘若此事发生在几百年前，我的儿子站在这个地方，除了敬畏和好奇之外根本不会有任何恐惧之情。显然，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到处灯火通明，几乎成了不夜

城，外界事物无时无刻不对我们的感觉造成冲击，荧光频闪的银幕、巨大的广告牌、流行音乐、层出不穷的香水、质地精良的织品与光滑柔软的皮货……走出世界，走入教堂，完全是另一番天地。约翰·怀兹达在《中世纪之秋》的首页上写道：

> 500年前，所有的事情较之于当代，其形态都更为确切清晰。忧与喜、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似乎比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更大，无论忧伤还是喜悦，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每种经历都是明晰而纯粹的……光明与黑暗、宁静与喧哗之间的差异就仿佛夏与冬的对立，这种对立远比我们今天所体验的更为强烈。在现代都市里，我们难以找到完全的黑暗和绝对的沉寂，总有一缕淡淡的灯光或者一声遥远的呼喊打破那种纯粹。

圣维特大教堂在许多年前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奇异创造，金色的入口金光闪烁，雄伟的大门与高耸的窗户在开合间变换着来自天国的光线。幽昧的颜色、响亮的声音、薰香的气味、上千支燃烧的圣烛，还有钟声……怀兹达写道："每日钟声敲响，似乎都与圣徒有关，它

用众所周知的声音宣告着悲哀与欢喜、宁静与焦虑、召集与训告。”

里佩利诺啧啧有声地评论说：“在布拉格小说家笔下那些病态的人物形象中，大教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梅利克那部阴森而不乏滑稽的小说《格来姆》[①]中，一个重要的场面就发生在圣维特大教堂里，在“细弱的蜡烛味和薰香”之间。甚至连一向对超自然事件无动于衷的扬·聂鲁达，在记述玛拉·斯塔纳地区淳朴山民的言行时，也被山上与众不同的灰石头所吸引，回来后，他注意到石头的坚实并未受到任何削弱，相反，“在每个礼拜堂，你都能发现它与敬拜的神香和塑像配合得相当默契”。在聂鲁达的小说《圣温西斯的弥撒》中，叙述人回忆自己当年做服侍圣坛的男童，他和朋友们都知道一件事，每天夜半——还能是别的时间吗？——当钟声在教堂里回响之际，就是圣徒温西斯重回教堂，在高高的圣坛上做弥撒的时候。一天夜里，他一个人藏在已经上了锁的教堂里，想要一睹圣徒温西斯的鬼魂做的弥撒。夜晚，最后一缕光线消失了，午夜降临，“一块仿佛蛛网的东西在教堂中厅的上空飘浮，闪着银色的微光”，孩子霎时被巨大的恐惧攫住，“我感觉黎

① 格来姆：16世纪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译注

明前的黑暗与寒冷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一种含混不明的情绪突然向我袭来，然后它就被一种更猛烈的力量击碎——那就是恐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什么，可我就是害怕，我的内心幼小、脆弱，根本没有自我支撑的力量”。

布拉格作家都喜欢吓唬自己，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那代人尤其如此，他们酷爱神秘与怪异。如里佩利诺所言，他们的小说“一再重复那种令人深感压抑的感觉，这源自于西班牙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16 和 17 世纪的哈布斯堡皇室，包括鲁道夫，都曾接受过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们的教育），芜乱不堪、令人胆寒的伤口，破裂的肢体，喷涌而出的鲜血，这个神秘景象是恐惧的来源”。他从一本听起来不太靠得住的、出自吉利·卡拉斯科·赞·利沃维科之手的《曼弗雷德·马克米林的小说》1907 年中，找到一个看起来似乎很生动的例子：

> 每次凝望墙上的十字架，我都感觉身后站着什么东西。令我异常恐惧的是，我从前凝望而感觉毛骨悚然的那个十字架，如今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悬荡于黑暗中。

在另一个名为《哥特之灵》的故事中，“那个遍体鳞伤流血的基督在黑暗中发出光亮，就像神迹一样，从十字架的两翼上升，慢慢地接近圣坛”。

当然，与圣维特教堂有关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当属卡夫卡的《审判》了。约瑟夫·K受其工作单位的银行经理之托，陪一位意大利商人参观这座城市的艺术景点。在这部小说中没有哪个人物形象丑恶，但作家对意大利人的描述却不乏丑化。他嘴上留着铁灰色的浓密髭须，带着神经质的微笑，他迫切要求能找时间去看看大教堂。但这怎么看都像一个阴谋，意大利人根本就未按时赴约，约瑟夫·K只好一个人在教堂的中厅徜徉，听着自己脚步的回音，虽是上午，教堂里却一派幽昧，他面对的一个“闪着银光的圣徒雕像”无疑就是扬·聂鲁达的小说中尼波米克小时候看到过的“银色圣约翰像”。约瑟夫·K无法解释为何大白天里教堂如此阴暗，“外面究竟是什么天气呢？简直沉闷之极，是午夜时分了吧”。

> 远处，圣烛排列成一个大三角形，在高高的神坛上闪烁。K不敢断言，刚才是否见过这些圣烛，也许是刚点燃的。教堂管理人的职业习惯是举步轻悄，几乎不引人注意。K偶

然转过身，发现身后不远处燃着另一支圣烛，这支圣烛又粗又长，插在廊柱上。圣烛倒很悦目，但是，只用圣烛给挂在昏暗的小礼拜堂中的神坛画照明是远远不够的，反倒使小礼拜堂的黑暗更显浓重了。

就是在这种场景中，K与神父相见，后者自称是狱中神父——事实上就是世界这座监狱的神父——他知道约瑟夫·K的名字，并给他讲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寓言故事，“一个乡下人”寻找“法的入口”，却被一个难缠的守门人拦住，他让乡下人在法的门前坐等了许多年，直到这人日渐老迈，临近死亡之门。守门人对他说：“你真是无法得到满足啊。”

那个人说：“可是每个人都不想到达法的面前吗？为什么这么多年，除了我，没有一个人要进这道大门呢？”守门人看出那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便在他聋聩的耳边，大声吼道：“除了你，谁都不允许进到里面去，这道门是专为你设的。现在我要去关门了。”

牧师在长篇布道词中讲述了一个意蕴丰富、有多重

释义的寓言故事，他指出："法的门前的守门人开头与那个乡下人开玩笑，告诉乡下人尽管明令禁止他不能进门，但他仍然可以尝试着进去看看……"我们知道，卡夫卡的幽默里有一种阴郁和嘲讽。他做保险评估员的工作就是对客户的索赔请求进行评判，在给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他感慨地说，这个世界似乎处处隐藏着事故，"瓷器厂的年轻女工跌下楼梯，总是抱着一摞高高的碗，这真是让人头疼的事"。还有一种传闻，说他当着一群朋友的面朗读《审判》，刚读了第一页就没法读下去了，因为听众大笑不止。然而，前面那个关于法律的寓言玩笑，诚如马克·吐温所言，德国人的幽默从来都不好笑。几年前，著名的德语学者、卡夫卡研究专家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去世前曾向我说过，1951 年 12 月，他和其他几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布拉格的一次斯大林主义者的新浪潮电影审查会上被集体逮捕。当时，他想知道他为什么被逮捕，审讯者面露讥笑，说："这正是你应该告诉我们的问题。"我立刻就想起监狱的牧师向约瑟夫·K 讲述的那个守门人的幽默与友好，甚至是同情。我同时也想起两个穿着教士长袍的绅士，带着一种倦怠的神情，苍白虚胖，头戴高帽——"显然是不可折叠的那种"，在 K 31 岁生日的前夜，走进 K 的公寓，把他带到一处小采石场执行处决，那个地方很像布

拉格城里的斯特拉霍夫地区。“反抗是毫无用处的。他即使反抗，给他的同行者制造些困难，靠搏斗来夺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称不上是英雄。”

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冷，空荡荡的大教堂里凉森森的。教授站在J.和G.旁边不远的地方，指着一扇褪色的玻璃花窗，向我们解说所绘图景的精湛细节，就在这个时刻，我因一种莫名的震动而深感羞愧。我看着他站在那儿，穿着松松垮垮的西装，单薄的银发、斯拉夫人的高颧骨，戴着那副经常滑下鼻梁的眼镜，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与这个男人的生活之间的差异——许多年来，他被迫采取一种掩饰的方式生活，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尊严和自尊心，只是为了满足妻儿和他自己最基本的衣食需要。我的朋友兹德涅克战前曾翻译过捷克文的《哈姆雷特》，1968年以后非常畅销，连续再版。尽管作为译者，他的名字遭到禁用，但他还是从译著中获得了一小笔版税。他说：“我可以在初雪之际，到剧院去走走。我缩在单薄的大衣里，听说《哈姆雷特》大受欢迎，我就想，太好了，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一件大衣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就是这么活着的——“吮自己的手指头”——仅能糊口而已，他说着，把手放到嘴边，大笑起来，很满意自己的语言游戏。兹德涅克说他最遗憾的是“对我来说，太晚了点儿”，他叫道，“哈

维尔革命来得太晚了!”这听起来似乎好笑。一天，我们坐在他的汽车里，我敦促他详细谈谈“那些日子”里他的生活，他开始轻声地笑笑，冲我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你像那些总想质问我的人似的，那些没名没姓的家伙!”随后，他收起了笑容，面色沉重，向挡风玻璃窗外望去。对此，我能明白多少呢?

那天，我们一伙人回到宾馆已是午夜。教授告别时答应明天来接我们到他家去。宾馆大厅里，两个黑眼睛美人仍然守在盆栽的塑料棕榈树下，端着咖啡杯，打量着来来往往的男人，寻找潜在的主顾。这些美丽尤物。走进电梯，我不解地问道，她们干吗非得从事这个职业? J.说：“我想，她们是为了‘咳咳’。”我们累得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深夜，从宾馆陌生的房间里莫名地醒来，那种感觉异常特别。窗外一片漆黑，床头桌上有一盏灯发出微暗的光，仿佛一个忠于职守又冷漠的哨兵。陌生的家具似乎在悄悄地上演一场缓慢而庄严的帕萨卡里亚舞，在你偶然张开双眼的一瞬，它们骤然停止了舞步，蜷伏在暗淡的灯影里。此时，户外的各种喧声似乎因黑暗过于浓重而更模糊了，下班回家的人流潮涌而生的嗡嗡声、呼叫声，收音机时而迟钝地寻找着，仿佛一只手在床单下

面搜索，试图抓住些什么，一块思想的碎片、一个梦、一段记忆，却一无所获。这场联翩的浮想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寂静、空中的嗡鸣、羊毛的温暖……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那遥远而无从追忆的过去。是那个孩童时代吗？那是一段早已消失的日子，轻轻触摸意识的模糊边缘，激动人心的就寝时光使无数记忆纷至沓来。而长大成人的日子，则总是头脑清醒、时时警戒，投入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务当中。

20年前，我初次造访布拉格，如今，有多少是曾经的记忆，又有多少是今日的创造呢？记忆是一幅壁画，庞大、鲜活，饱受时间的蚀损。前景要比最远处的背景更多了一层朦胧的雾气，在中间地带，真实的事物正在活动着，却因过于忙乱难以看清真相。我们凝望着一张面孔、一间熟悉的屋子、一小段风景，令人吃惊的是，从那个地点移开脚步，也许，从哪个地方，就有一双眼睛自人群中凝望着我们，带着坦率、平静、愉快和好奇的神情，很像普桑[①]画的《随着时间之乐起舞》中那个宁静温和的女祭司的眼神。在光秃的灰泥墙上，还有一大块斑痕，曾经未能及时修补的破损处现在将要得到修整。第一次在布拉格的经历与后来尤其是最近几次

① 普桑（Poussin，1594~1665）：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代表画家，绘画以巴洛克风格为主，《台阶上的圣母》为其宗教画杰作。——译注

的游历，我仍然记忆犹新，如在眼前，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似乎完全不合情理。那个满怀期望穿着皮外套换钱的小伙子，那两个坐在大厅里揽客的妓女，她们的口红、过了时的发型，那棵塑料棕榈树。我看见教授站在大教堂里，神情真挚地指着高处褪色的玻璃窗。我看见自己从睡梦中醒来，穿戴整齐，躺在一张又高又大的床上，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些记忆的碎片，而不是别的更有意义的记忆呢？为什么？

教授的妻子身量不高，肤色黧黑，漂亮而热情。她的名字嘛，姑且称作玛尔塔吧。她的衣着打扮就其年龄来说，有点儿太年轻了。她穿着一件紧绷绷的黑色套头外衣，黑色皮裙，黑色长筒袜，裙子短了点儿。这身装扮乍一看不免显得过于冷酷，全是黑的，而且透着一股尖利的味道，我想这是她采取的一种姿态和方式，对自己所处的卑劣、强制的生活现实进行的反抗与挑战。我在布拉格遇到的人当中，不管是压抑的、愤怒的还是失望的，这是第一次，她让我感觉她是一个真正的囚徒。在她的绝望中，有一种狂躁、幽闭、抑郁的气质，似乎，她曾日复一日地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从门到窗、从窗到门，一只手深深地插入头发当中，另一只手夹着一支晃动的烟卷。她的神情中有着惊恐和强烈的不满，又

带着一点儿幽默。她对政府和她的家族进行了一番激烈尖锐的长篇述评，她好像有不少亲戚，他们个个都让她大为鄙夷……她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把头扭到一边，轻轻地笑起来，摇着脑袋，嘴里发出哒哒的声响，似乎对自己过于年轻、过于快活、过于兴奋的样子产生怀疑，她忍不住要嘲笑自己，她抱歉地摆摆手。我想在她的心中，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所处的困境，面对黑色荒诞的生活，她愤怒地确信，这样的日子总有一天要改变的。我从看她第一眼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她。她展现于人前的，是具有挑战味道的黑色套装、红色指甲、拉直的染发、光彩照人的面容，她拿出西班牙弗拉门戈舞蹈演员常用的那种引人注目的耸动肩膀的方式，递给我一只深绿色平底玻璃杯，里面装着大半杯伏特加。

我们所在的房间虽小却整洁明亮，四周是淡黄色的仿斯堪的纳维亚式家具。每个地方，每处空间都得到了妥善的利用，玛尔塔珍藏的波希米亚玻璃杯与教授的书籍在书架上平分秋色。穿过拱门，是一条狭长的厨房，锅里正散着热气。J. 和 G. 还有我挤坐在一个窄小的沙发里，膝盖顶着咖啡矮桌的边角。教授坐在我们对面，那张椅子显然是他的“专座”，褪了色的粗绒窗帘缀着流苏，有一个旧的木头窗帘摇杆。他活动的时候，或者听玛尔塔进行富于挑战性的长篇大论时，他就坐在摇椅上

前后晃动，速度渐次加快，一旦椅子摇得太快，在后仰时将他带离地板，他就抓住扶手，直直地靠在椅子上，然后突然停止晃动，脸上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微笑，仿佛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核战争狂人，因地心引力而受困。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言，问主人在这套公寓里有多少间房。教授闪烁其辞，玛尔塔正站在厨房里，从热气腾腾的锅边转过头来，苦笑了一下。这个包括了一间小浴室的寓所就是他们所有的房间。玛尔塔指指我们正坐着的木制勺形沙发，说："那是我们的床!"教授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进一步证实道："这是可以折叠的。"我当时一定是面红耳赤。

玛尔塔站在炉灶边有声有色地忙碌着，教授则引导我们在想象中游历布拉格的博物馆，那些我们在现实中无法参观的地方。我感觉，他对捷克 20 世纪艺术进行的研究和论述非常具有启发性，但他的表述却很低调。我异常震惊地发现，他提到的大多数艺术家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段时间，布拉格的现代主义发展迅猛、蓬勃昌盛，但她的光彩却被煊赫如巴黎和维也纳这样的大都市的光芒所遮蔽。终生流亡的弗兰提斯克·库普卡，1895 年定居于巴黎，他是欧洲抽象艺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音乐中汲取许多奇思妙想，他喜欢称自己是"色彩交响乐作曲家"，他也从摄

影中吸收灵感，认为摄影的抽象感很强。库普卡在巴黎的时候，更年轻一代的布拉格画家们正在建立“奥斯玛”八人社，全都是先锋主义者，1911 年他们逐渐发展为一个艺术群体，并成为立体主义的摇篮。最伟大的立体主义艺术家是雕塑家奥托·古特弗雷德，尽管在专业生涯的末期，他沉醉于天真的现实主义而放弃了立体主义艺术。这座城市存留下的最直观的立体主义艺术作品就是建筑。[①]早在 1911 年，建筑家约瑟夫·霍霍尔就在费塞拉德山脚下建造了一批颇具特色的建筑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之后，1918 年，战争结束时，布拉格变成了欧洲先锋运动的中心，尤其是超现实主义，布拉格人对它的热心是不言而喻的。城市里已经出现了类似达达主义的运动——被称为“德维秀”，查利·开普林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德维秀”最终分裂，但留下了富有实力的遗产——有诸如约瑟夫·希马和金迪利希·司迪斯基这样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名字、名字、名字。听着教授的叙述，我有一种深深的羞愧感，就像一个专业探险家被告知，在距他出生地不远处的山谷中早就蕴藏着一个繁盛的文明遗址，而他对此竟然毫不知晓。

① 事实上，最直观的就是在荣曼诺夫广场的那些立体派灯柱。——原注

吃过晚饭，我们围坐在小方桌边，桌子一端嵌入了房间的一角，我们试着将话题从艺术转向东西方冷战关系的讨论。可玛尔塔没什么说的，她只想听听对美国——一个自由而富有的国度的描述。她抱怨儿子尽管常常来信，却从来不说那些她迫切想知道的种种细节。百货店真像他听说的那么繁华丰富吗？梅西、布鲁明代尔、艾·玛格纳姆、涅尔曼·马尔库斯……每个传奇的名字在她唇间轻呼而出的时候，似乎都闪着灼热的光。J. 和 G. 不再是 1968 年柏克莱幸存的说客，试图向她阐明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某些生活真相——我后来回忆，当时的气氛有些尴尬——在弗吉尼亚州照样也有大量穷苦白人生活在贫民区，但玛尔塔把这些话都当成异端邪说，不想听。她受过高等教育，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化学家，她不是天真的小孩子，不是愚昧无知的文盲，信号未受干扰的时候，她可以收听到美国之音和英国的 BBC 广播，她对西方社会民众的苦难与抗议并非一无所知，但她坚持说，事实上，我们不过是在苏联统治的一个外省里生活，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思想。她说，我们，J.、G. 和我不断地就东欧问题大说特说，她整个晚上都在听我们说，但我们却不真正明白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名称的真正含义，不管怎样，我们无意中已经与苏联人结成同谋，接受了现状。东欧？她依次盯着

我们每个人，反问道，东欧在什么地方？从哪个地方开始？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巴黎人每天早餐必不可少的新月形面包，我们都知道它的起源，它的形状源于奥特曼帝国旗帜上的新月形标志，早在可怕的欧洲最终以强大的武力将无信仰者推向东方之前，新月形就被挂上了维也纳的墙头。是的是的，如果说真有一个东欧的话，它也不过就在伊斯坦布尔，不会比它更远！

谈话至此，大家都很激动，我们喝着味道不佳的摩拉维亚葡萄酒，教授的妻子兴奋而富于豪情，简直和丽碧丝没什么两样——稍后我们就会说到丽碧丝，她是狂怒的母亲的象征，患有间歇性抑郁症，整个20世纪都受着凌辱、被叛和侵略。[①]在她向我们满腹怨愤地慷慨陈词时，教授用一种爱怜的目光赞赏地看着她，默默地鼓励她说下去。我真是羡慕他们两人的默契，一个人尽情倾诉的时候，另一个就沉默地倾听，相互依赖，彼此扶助。谁能知道，在那么多年里，有多少次，教授在受

---

① 在小说《无知》中，米兰·昆德拉以敬畏之心表述了时间上的轮回："捷克的历史在20世纪因其所具有的一种数字之美而倍显夺目，这是由三组重复的20年构成的。1918年，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后，它获得了独立；1938年，失去独立。1948年，从莫斯科输入的共产党革命开创了第二个20年；1968年，因寻求自我解放激怒了俄国人，苏联派驻50万大军入侵布拉格，独立再次结束。1969年秋天，占领者接管了所有的权力机构，可令人惊讶的是，1989年秋天，像欧洲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占领者以平静、温和的方式放弃了管理，这是第三个20年。"——原注

到当权者的诋毁、朋友和同仁的背叛、被剥夺了私人空间之时，有多少次，他只好转回到这里，在这个逼仄狭小的避难所，心神疲惫，却需要重新振作，这一切都让他的妻子对当权者的镇压表现出更大的愤怒和蔑视。她说完，再次陷入沉默，但脸上的愤怨之色并未稍减，而只是以语气词来表达罢了，就像风雨雷电后远处传来的回响。

教授看着他的酒杯，嗯，他淡淡地说，玛尔塔讲的那些都是真的。有那么几个阶段，对他和她来说，布拉格的生活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也许，那些反抗压迫的日子还不算最艰难的时候，尽管苏联人入侵而后合并捷克政府的 20 年让人不免恐惧，但它们多多少少还让人对未来充满一种不安的兴奋感。可等到政府被合并、坦克驶入街道时，一股可怕的嗜睡症很快便席卷开来，这个国家走向衰亡不是因为它再一次惹上麻烦，而是因为它久唤不醒的嗜睡症。教授仍然盯着他的玻璃杯，嘴角挂着讽刺的微笑。他说，他真希望自己能把这种懒散混沌的情状归罪于苏联人，或者那几个自产自用的小暴君，但事实是，捷克人已经这么昏昏沉沉地做了 350 年的梦游者了。1620 年的白山战役失败之后，年轻的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借助新教徒的力量，被布拉格国会任命为波希米亚王，也就是后来的“冬之王”，却遭到哈布斯

堡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镇压，后者曾接受路德教会中耶稣会士的教育，是他们的重型武器。①甚至那个因迷恋故国而头脑不够清醒的里佩利诺都同意教授所做的这个令人沮丧的诊断，认为这个国家从白山之役惨败后就成了“一个脚软头昏的国度”。他写道：“布拉格的节奏缓慢之极，没完没了地咀嚼（就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那样连续咀嚼几个小时），时不时地清醒一下，会爆发出一股力量，结果又造成紧张症，弄得很快就精疲力竭了。”游客的说法是，“这个城市一直板着面孔，听任忧郁脆弱、窒息昏昧、恹恹无力、苍白衰弱等等在狭窄的街道上逡巡，君临这片无主之地，古老的辉煌不过是堆垃圾”。这一切令游者深感震惊。教授毕竟与里佩利诺还不一样，后者曾被当做一个弃儿抛在意大利，前者却是家养的儿子，他的评价自然不会过于苛刻。但尽管教授度过了那些日子，显而易见，他仍希望自己能抓住这个城市的肩膀，狠狠地摇上一摇，让那些石头纪念碑在底座上格格响动……可不管怎样，他说，他绝不离开，绝不，哪怕美国街道的路面上铺满了黄金。

---

① “1617年奥地利斯捷里亚公爵费迪南成为捷克国王，次年禁止布拉格新教徒集会，引发捷克人民起义。图伦伯爵组成临时政府，捷克暂时摆脱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620年，捷克和巴拉丁联军在白山战役中失败。费迪南复位，残暴镇压捷克人民，捷克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行省。”（此注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新世纪百科全书·白山战役》）——译注

1968 年 8 月之后到苏联人完全接管之前，有一个令人困窘的空白阶段，逃离布拉格还相对容易些，当时有十多万捷克人离开了祖国——玛尔塔多次求他，两人一起逃到纽约去，去找他们的儿子，他在那儿有工作，与大学人士有往来，甚至有可能为教授找到一份工作。但教授不为所动，是的，他毫不动心。玛尔塔开口说的时候，她的丈夫心不在焉地盯着杯子里的沉淀物。她责怪他说："你总是跟我引用那些诗句，那个糟糕透顶的诗人维克多·迪克写的糟糕透顶的诗歌里的那些糟糕透顶的句子，说那些胆敢离开的人必定死。[①]可你并不会死的!"是的，教授轻轻地点点头，显然以前他们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会活下来，但对他的内心来说，某些东西会死去，因为他一离开布拉格，他必会失去最重要的那部分精魂。"这是，"他说，一只手指轻轻叩打着白松餐桌，假定在那一刻它是欧洲，"这是我唯一了解的文化。"

饭后，玛尔塔不断地劝我们喝一种甜的利口酒，是当地的特产，名字我忘了，是绿色的吗？还是因为杯子它才变绿的？……教授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近似乐谱夹的东西，我看第一眼时想起小时候我姐姐经常拿着

---

① 维克多·迪克的诗句引自诗歌《祖国的话》，由贾斯廷·奎因译为英文："如果你离开我，我不会死；如果你离开我，你必会死！"——原注

它去上钢琴课，陈旧的皮面上有一个哑铃状的银色金属扣。他把夹子放到咖啡桌上，平放着打开。里面有一叠照片，大约 30 张，用丝带精心地扎好。因为吃饭时葡萄酒的作用，现在又喝着利口酒，在那一瞬间，我隐隐地生出一股宗教的情绪，仿佛在参与一个神圣的仪式。怎么能不是呢？毕竟，真正的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生动的存在啊。

照片出自约瑟夫·苏迪克之手，是黑白照片，几乎全是布拉格的街景，有几张室内照，其中包括《迷宫——我的摄影室》，两张 20 世纪 60 年代末名为《纪念品》的系列静物，仿佛摄自于梦境；还有一张美妙之极的《核》，摄于 50 年代初，被摄者坐在路边，头发半遮着脸。我以前从未见过苏迪克的摄影作品，说实话，在来布拉格接受这项使命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我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布拉格艺术家，他与巴黎的尤金·阿特盖这样的视觉大师一样独特、深邃，只是，这种公允的评价来得迟了些。

奇怪的是，第一次看他的作品，我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我一张一张地翻看那些照片，好几次都觉得自己以前肯定见过这些片子，甚至对它们还异常熟悉……可事实上，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它们。这个时候，柏拉图那个陈腐老套的理式说显然是对的，在我们

的无意识深处，一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理想形态，倘若这种先验模式真的存在的话，我们确实会拿它来衡量、测度我们在世界上所遇到的每一个新事物。当我观看这些无言却让人过目不忘、似梦如幻却又真切逼人的风格独特的影像时，我立刻生出一种卑微感，这是因心弦相应而拨响的温柔的震撼，仿佛一阵细密的冷雨，令人心神凛然。一句话，我在这些影像当中，找到了布拉格。艺术，就像亨利·詹姆斯在反驳庸人 H.G. 威尔斯时所说的，艺术“创造了生活，创造了趣味，创造了意义”，人们是这么理解他的意思的——艺术作品选择“美的事物”，亨利·詹姆斯自己正是这么做的，必需的事件、必需的时刻，看似毫无规律地接连出现，却呈现出最真实生动的生活原貌，从前以为已从记忆中抹去的却依然残存如初，德里达把“无”假想为需要填写的空白插页。整整一天，我在城市里走来走去，似乎什么也未看见，可是，突然，苏迪克的照片，甚至就是几张摄自私人摄影室的片子，都在向我展现一种坚忍、明晰、真切且奇异、苍白、憔悴的美。就是从这里，从我膝盖上的这叠照片中，我终于触摸到了布拉格。

1896 年，约瑟夫·苏迪克出生于科林的波希米亚镇，晚年这里成了最能唤起他创作激情的地方，让他

拍摄了不少具有普鲁斯特风格的照片。他三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全家人搬到布拉格。15岁那年，他到宁姆博科一家装订商处做学徒，后来又给布拉格的一位装订商当徒弟。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被征入伍，赶赴意大利的前线，一枚来自己方的炮弹炸伤了他的右臂，使他最终截肢，他的装订商职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被送回布拉格时，他刚刚能动弹，在老兵医院里熬了很久，等待康复。早在此前，他就对照相术颇感兴趣，曾带着相机跑到前线，拍摄了大量战友们的照片和意大利的乡村风光。他一生只出国两回，最后一次就是重访意大利，到那个曾经受伤的地方去："黎明在城市的远处闪动，大地沐浴着晨露，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可惜，我的手臂不在那里……"

马上面临的就是找工作的问题，苏迪克放弃了政府提供的工作机会——在街边摆个烟摊，享受地区专卖权。相反，为了弥补养老金的不足，他在布拉格的林阴大道上兜售自己的照片。这种沿街叫卖的生涯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他未受过专业的摄影培训，没有合法的经营证明，无法得到必要的保护。不过，在老兵医院有一位名叫内德玛的医生，说真的，他一定与凡·高的加歇医生是精神上的近亲——他发现了苏迪克的艺术潜质和坚忍的个性，帮助他成功地进入布拉格的绘画艺术学

校学习摄影。尽管老师卡雷尔·诺瓦克教授是个保守派，不喜欢苏迪克的拍法——苏迪克后来带着不满的情绪说他是“一个高贵得不能再高贵的绅士”，但苏迪克还是通过了课程考试，于1924年获得了专业摄影师证书。此后，他的作品引起了德鲁斯维尼·布拉斯出版社的注意，并与之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委派他以自由记者的身份进行拍摄，这使他有机会搬进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实际上，那个地方比公园里的小亭子大不了多少。工作室坐落在尤间德，在玛拉·斯塔纳与大河之间，此后的30年里，这儿成了他的工作间和他的家。

工作室里放置的摄影设备大多是上个世纪过了时的产品，苏迪克却觉得它们异常合用，毕竟，他自己就是19世纪末的一个“产品”。20世纪40年代，他弄到一台柯达全景相机，显示日期为1894年制造。尽管只有两档快门速度，但他仍然仔细研究了它的使用说明。这是一个庞大、敦实的家伙，就因为这东西透着一股子敦实劲儿，他才越发地喜欢它，当然，这也要归结于一个事实——这家伙比他还年长两岁呢。尽管只有一条胳臂，他还是尽力带着它走遍城市乡村，为的是记录某些奇异的景致。他带着它的时候，常常能拍到一些极佳的照片，其中就包括组照《1952~1970：消逝的雕像》，拍的是一些残损的树，那是他在故乡近郊的森林中漫步时

偶然发现的，影像有一种单纯质朴的美。作为一个艺术家，苏迪克一向给人以缄默从容的印象，但他的眼睛经常关注的却是那些残损受伤的高大植物，也许，他是以此作为自画像吧。

20世纪50年代初，他掌握了全景照相机的种种技术难题。最开始，令他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相机一次只能拍摄一幅10×30cm的长条底片，曝光之后，他得返回暗室去安装另一条底片。苏迪克的朋友建筑师奥托·罗德耶的妻子、纺织工艺美术师波兹娜·罗德耶洛娃解决了这个难题，她帮他做了一个黑色暗袋，大到足可以容纳他和那台相机。不管是在空无一人的森林还是在人潮涌动的城市街道，每次拍照，他都跪在选景地上，然后带着相机爬进漆黑一片的暗袋里，更换新胶片时全凭手摸。遗憾的是，没有一张苏迪克钻进相机里的照片，否则，那一定是一幅颇合某些评论家口味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形象的图片，而那些出于他想象的超现实的照片则因过于滑稽和幽默而无法贴上这样的标签。

苏迪克最为成功的拍摄是出版于1959年的《全景布拉格》，也只有他能做成这件事。他的其他重要作品集和首次出版的作品是受出版商德鲁斯维尼·布拉斯委托拍摄的圣维特大教堂，1928年，这座建筑物在重建改造中呈现出完成的迹象。作品集包含60组照片，每

组 15 张，从拍摄到冲印全都出自苏迪克一人之手，它们是苏迪克建筑摄影中最重要的部分，唯一能与其相媲美的就是出版于 1942 年的《对比》系列。十几年后，他回头重拍大教堂，从他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拍摄、冲印过程中进行的创新实验。这时，苏迪克采用了难度很大、艺术价值也极高的接触印相技术。这种技术要求摄影师在暗室中将干板直接转印为图片，没有任何修改、调整的机会。1940 年，他偶然印制了一张大幅的接触印相照片，拍的是查理大教堂里一尊创作于世纪之交的雕像作品，这使他很快意识到这种工作方式的可能性。接触印相提供了放大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他后来说："从那天起，我不再做任何放大照片了。"在前柯达时代，这种工作方式的变化意味着需要使用大幅的玻璃干板，其中一些大至 40×50cm。这种技术既辛苦又费时，每个玻璃干板他只影印了数量极少的照片。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教授之所以想让我们把这些照片带给他儿子的重要原因，它们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给予苏迪克的作品以精彩评价的是布拉格装饰艺术馆的兹德涅克·柯斯内，他是苏迪克的作品保护人和传记作者：

当苏迪克把那只沉重的木制全景相机放

在坚实的三脚架上，当他从那些帆布袋里拿出镜头，选择合适的一只，把它插入机身；当他爬进他称之为“修女服”的大黑布里，当他精心地推敲构图、仔细地观察光线；当他调试机器、插上片盒、本能地扭动光圈；或者摘下镜头上的那顶小“帽子”；然后，当光线开始在干板上绘出影像时，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说出一句富有魅力的话来——“演出开始了……”

另一位著名的见证人是摄影家索尼娅·布拉季，集中营的幸存者，战后和苏迪克一起工作，苏迪克称她是他的“徒弟和追随者”。1971年，她在纽约的松加画廊为他举办了摄影个展。她认为，“苏迪克似乎一辈子都活在‘光’的里面”，她写道：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间罗马式大厅里，教堂的螺旋梯低低地延向深处——那里简直像地下墓穴一样黑暗，在建于中世纪的厚重坚实的墙壁旁边，只有一扇小窗与街道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我们支起三脚架和照相机，坐在地板上谈话。突然，苏迪克刷地一下站

> 了起来，一缕阳光照进这黑暗之地，我们在这个布满古老灰尘的地方挥动衣服，像苏迪克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看清光线”。显然，苏迪克早就知道，一年之中会有那么两三次，阳光可能照到这里，为此，他一直在等待。

她记得与他一起到城市的旧墓地去，在那儿，苏迪克创作了不少充满激情和灵感的照片：

> 我喜欢夜幕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那时，常有一种莫名的凄凉悄悄降临。苏迪克坐在那儿，等着最后一缕夕阳映在古墓的石碑上。对我来说，这景象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纳粹占领时期，这片墓地是唯一一处允许带着犹太星标的犹太人自由活动的场所。

尽管苏迪克是一个伟大的风景艺术家，他却只把布拉格当做他的主要拍摄对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自言他的写作目的就是让自己在这部小说中“创造”出美国。读者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声明，且不乏骄傲，可这的确是所有艺术家唯一想做的事，他们“创造真实”，因为这才是艺术的本质。詹

姆斯在他响亮的宣言中，将此表述为艺术“创造生活，创造趣味，创造意义”。在纳粹占领之初，拍摄任何题材的照片都有可能惹上麻烦，甚至风景片也不例外，也可能受到威吓，苏迪克只好退回到他的工作室拍摄。不过，他不但未受到制约，反而在那儿获得了一种更为内在的自由。他就此创作了两组极为精妙的组照：《工作室的窗》（1940~1954 年）和《公园里的小路》(1940~1976 年)。那些窗景多数是透过雾气缭绕的窗格玻璃拍摄的，精巧神秘又简洁质朴，令人心驰神往又神秘莫测。尽管这些景象似乎随处可见，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布拉格的精髓所在。

苏迪克是这座城市的炼金术士中的一个。那些认识他的人，往往带着敬畏之情回忆说，他工作室的暗房中有一种神奇的气氛。兹德涅克·柯斯内注意到，甚至在夏天，那里的空气仍然凉爽怡人。“好多年来，地板上被腐蚀出了好几个洞，一排排木头架子上摆满了装化学药品的玻璃瓶。苏迪克自己配制显影液和定影液洗印他的照片。关于他的暗室曾有许多故事。在工作中，他依靠经验与本能，而很少依赖配方。他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工作室里的纸张、照片、印刷品、书籍、计时器、蜡烛、留声机等等密密麻麻地一直堆向天花板，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珍贵无比的东

西——大事记、大帆船、生活中的陈谷子碎石头什么的，好像被魔法召聚来的一般，非常像那个神经质的皇帝鲁道夫二世，毫无节制地搜集大量珍宝和垃圾，妄图用这堆杂乱而庞大的东西垒起一座防御工事，以抵挡他最恐惧的死神的入侵。在《迷宫》系列中有一张摄于1969年的照片，拍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纸卷，可以看到纸卷的另一端，仿佛出自阿希米波多的亲手设计，他是鲁道夫的宫廷画家，他的《幻想的风景》和超现实主义作品《未写完的信》表现了他的纪实性绘画风格——不是物品的随机堆砌，而是奇异的智力拼图。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授予苏迪克一系列并不相称的荣誉，1961年，他获得“功勋艺术家”称号，1966年获得“劳动奖章”。但对他的批评也是呈系列的，评论家指责他脱离大众生活，给他安上了一个不问现实、喜欢为罪恶辩护的罪名，批评的焦点在于他的照片对自然景物关注得太多，对人关注得太少。[①]他反驳说，当他费尽功夫安好那套摄影设备准备拍摄时，旁边的人早都走光了。令人备觉惊奇的是，这些精妙明晰、富于美感的作品竟然是在那么一个黑暗的岁月完成的。苏迪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他差一点儿牺牲，1918

① 最近，我在巴黎曾和亨利·卡蒂尔-布莱森及夫人、摄影家马丁·弗兰克谈过一次，他们告诉我，他们发现苏迪克的作品中“缺少足够的人”。——原注

年，生死未卜之际，他亲眼目睹了奥匈帝国的垮台；1968年，在另一次生死交际处，他经历了苏联的入侵。然而，即便是在黑暗中，他仍然能让他的工作闪烁火花——他对布拉格夜景的研究是他最优秀的成果。他是一个感觉异常灵敏而又浪漫的人，他以圆熟、精湛的技艺拍摄的作品直接诉诸心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提到过他的毫无伪装的单纯、谦逊和他的幽默感。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外省的穷孩子，从未受过良好的教育。战争让他失去了一条胳臂，让他的内心备受折磨。他未经训练，他也不是知识分子。他告诉索尼娅·布拉季，当年他进入布拉格的绘画艺术学校学习，“卡雷尔·诺瓦克教授是一位高贵的绅士，聪明能干，这个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他受不了我在战争中学到的那些骂人话和表达用语。”不过，他还不属于野兽派。除了摄影，他最喜欢的就是音乐了……教授和玛尔塔温柔地忆起每周四晚上在苏迪克家举办的“音乐会”，那时，他会邀请朋友们到他的工作室，在他自制的唱机上播放唱片。他的创作与雅那切克的作品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出生于胡克瓦尔迪地区，它成为苏迪克最后一本摄影集的主题。事实上，雅那切克的作品与苏迪克的创作在表现强度、表达怀恋的感觉、表现静默的动态、表达对于祖国的真挚之情时，二者极为相似。苏迪克的美学原则就是简洁，

布拉季曾把他对摄影的评述记录、总结如下："发现——这很重要。首先是发现，然后才是作品，然后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才会因此停留。"布拉格有许多著名的儿女，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卡夫卡——曾经努力捕捉过这座城市最为生动鲜活的精华之处，它的神秘和虚弱的魅力，它的忧郁之美，它的光与影，以及这座建在伏尔塔瓦河上的城市独具的奇异而幽昧的光彩。

当我回想着在布拉格度过的日日夜夜，我无法确定自己是从记忆中还是从约瑟夫·苏迪克的照片中提取的那些印象，对我来说，他的作品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我尝试着回忆我们同教授夫妇道别的情形，他们住的那个无名公寓区在温西斯广场西部一条毫不起眼的街道上，可此刻，我眼前鲜明地浮现出一张苏迪克的夜景，有点儿像落雪之夜的普拉斯尼桥，或者是卡姆帕岛上一处亮着灯的圆石广场，周围有冬天的树，或者是查理石桥后面离城市更远的地方，前景的路灯闪着朦胧的光，仿佛透过泪眼看到的一样。在门边，玛尔塔握着G.的手，嘱咐她一定"代我向加利福尼亚问好"，这句问候在我们听起来更像是对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的告别。我想，玛尔塔最终也不会到美国去的，尽管对她来说那并不是不可能。两年前，我们听说教授去世了。时间过得真快，往事一去不复返！那天夜里，我们三个人默默地

走在大街上，冰雪满布、空荡荡的街道就在我们住的宾馆的后面。G. 手里握着照片，照片卷得紧紧实实的，密封在一只圆纸筒里，看着好像除了一张 30 年代捷克形式主义艺术展的海报复制品外，别无他物。第二天早晨，冒着交加的雨雪，我们坐火车离开了这里。在奥地利国境线上，我们停了一个小时，巡查的士兵进入车厢，拿着一种形似牙医探测镜的大家伙，在座位底下和行李架上搜寻，看看是否有人胆敢藏在这些地方偷渡出国。我的手心沁出一层冷汗，我很担心他们要求 G. 打开纸筒检查里面的东西。不过，士兵们显然对艺术并不感兴趣。我们通过奥地利国界，第一眼望见的就是一块广告牌，一个半裸女人正在推销某些西方腐化堕落的标志性物品——迪奥时装和奔驰汽车，在它们映入眼帘的瞬间，我本能地生出狂欢之念，这生动快乐、活色生香的景象令我无法抗拒，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教授和他的妻子，不由得满心羞愧。

# 二　门槛

我对捷克大陆历史知识的简单了解是从网络上下载的，我注意到那个地区最初的居民是史前的鱼类。一位无名作者写下了这段令人怀疑、不尽可靠的记录——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历史记录说当史前海洋开始变干的时节，鱼儿们就接二连三地长成了恐龙和长毛象，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凯尔特人。这批神秘的族群遍布各处，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来到这里。但有些专家却声称这些凯尔特人从未存在过。罗马人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波优哈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波希米亚”，据说是从凯尔特人的一个分支波伊

族而来。不久，这支红头发种族就被西方的日耳曼人、南方的罗马人所取代，但后者并未越过多瑙河。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中间几百年的明显停滞是一大段空白期，直到公元6世纪，斯拉夫人到来，占领了伏尔塔瓦河左岸，在这里建立了费塞拉德。9世纪末，普热米斯尔的第一代君王博日沃伊在此建立了城堡，这是普热米斯尔王朝的起家之地。不过，偶尔喜欢较真儿的《旅游手册》用一种嘲弄的语气说，费塞拉德的那座城堡“是作为让我们相信的传说”而存在的。与此同时，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犹太商人相继而来，定居在河对岸，也就是现在的诺维地区，或者说是新城区。此处通过一座木桥与斯拉维克区相连，曾几何时是一个活跃之地。10世纪60年代末，一位西班牙籍犹太人亚伯拉罕·伊恩·雅曲受凯立夫·阿-哈卡姆二世的派遣从科尔多瓦出发来此参观，他带着外交事务到麦斯堡朝见奥托皇帝。好学而喜游的亚伯拉罕对世界上的许多城市都有所了解，对布拉格全民性的奢侈印象尤深。

传说，就像《旅游手册》上所言的，总是有一种耸人听闻的想象性，在布拉格起源的问题上，对于移民和第一王朝的起家等等从未有任何细致确切的材料可资证明，不过，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民间故事谈到这个问题。从前，在东方，有兄弟三人，老大叫捷克、老二叫利

克、老三叫罗斯。他们向西方进发，寻找新的居地，从而成了不同民族的祖先。罗斯在第聂伯河住下，成为俄罗斯之父；另两个兄弟继续寻找，利克转向北方，找到了波兰；捷克爬上了波希米亚的瑞普山，立刻就喜欢上了他目之所及的一切。捷克族的人在那里快乐地生活。两百年后，一个名叫克洛克的新首领出现了，他就住在传说中的费塞拉德地区。克洛克有三个美丽的女儿——凯兹是女医师，特塔是女祭司，丽碧丝是女先知。不久，丽碧丝继承父亲的皇位成为捷克的统治者。然而，捷克的男性臣民也像今天的大多数男人一样，不喜欢在女权统治下生活。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条历史记录上说，“有个家伙对捷克由一个女人统治颇感不满，就开始对丽碧丝的某个决定进行抱怨”，丽碧丝从神的异象中得到指点，遂派一队臣民跟着她的白马，跑进森林，寻找一位正在修造房门槛的农夫，在那里，他们找到了诺维即“新城”。百姓和白马带着普热米斯尔·奥拉克也就是那个农夫胜利归来。普热米斯尔城堡建在伏尔塔瓦河的高处，那里遍布石头，奥拉克和丽碧丝就在这儿结婚，普热米斯尔王朝从此建立……

真是有意思，人的想象几经辗转竟然能够成为说明历史的证据，然后，这些所谓的证据再几经辗转，就突然变成了现实生活。抛开所有对名字、日期和地点的沉

迷，我的思绪一直牵系在那座跨越伏尔塔瓦河将右岸的新城和左岸的老斯拉夫区相联结的木桥上。它看起来像什么呢？它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呢？这些问题一出现在脑海中，便让我浮想联翩，一座又一座建筑物在我眼前一一掠过。罗曼蒂克的、神秘奇异的、透过暴风雨看到的、在水波间傲然挺立的、在晨雾中高拔入云的、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闪动微光的……11世纪，石结构代替了木结构——《旅游手册》上写道，“即所谓的朱迪思式桥”——为什么是“所谓的”？不明白。在当时，这种替代很常见。建筑大师彼得·巴尔莱带来了布拉格城的黄金时代。1357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时期，以其命名的石桥历经火灾水祸和多次战争，至今仍屹立在伏尔塔瓦河上。

我想，至少这个是彼得·巴尔莱建造的……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论文《建筑居地遐思录》中对桥的本质、桥之为桥的因素进行了深邃的思考，就像那个来自德国的建造者造桥一样。关于桥的定义开始成为实际的存在。“它不仅仅联结着那些已有的两岸，岸之所以成为岸只是因为有桥跨越了河流……它引导着河流、岸和陆地彼此相邻。桥将大地集结起来就像河流塑造了风景。”他写道，“桥是这样的‘场所’，它悬空而越，联结着天空与大地，接纳着神明与凡人。”海德

格尔指出桥是一个“实体”，这是基于一种古老的聚集与集合的感觉，“桥是一个实体，只是一个实体。为什么呢？因为它将上下左右四极联结了起来。”

> 无论方式如何不同，桥总是护送着那些或悠然漫步或匆促奔行的人们的脚步，将他们送至彼岸，走向目的地，走向人生终点。跨越溪谷与河流的桥拱，有的高些有的低些，但不管走过的人是否注意桥拱的起伏，他们都会循着自己的路线走向下一座桥，事实上，他们正努力克服自身的平庸和弱点，以使自己能够接近健全完整的神明。无论我们能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能否为桥的出现而心怀感恩，就像面对桥上的圣像时所想的那样，还是根本看不到桥的神圣的存在甚至将这一切都置之度外，桥都像一条通道，在神明面前聚合，又在神明面前穿过。
>
> 桥以自己的方式将大地与天空、神明与凡人聚集在一处。

今天，站在查理桥上，置身于满脸紧张的游客和心情不佳的观光者之间，眼前的风景似乎少了许多应有的

色彩。桥上风光能令人想起海德格尔精神化的界定，但世俗化的界定可能更适合当今世界遗产城市之一布拉格的真实情况。

河流、桥、人类社会……

费塞拉德城堡坐落在峭壁之上，自 1085 年起，普热米斯尔王朝统治了 50 年，当时费拉提斯拉夫一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王宫。1140 年以后，普热米斯尔皇室搬到布拉格城堡的后面，即河的左岸，在此地建立了皇权中心；后来，查理四世大兴土木，重建城堡，修建要塞，迄今为止，这些强大坚固的堡垒依然有迹可寻。15 世纪，几次胡斯宗教改革战争使查理的建筑艺术品损失了大半。此后，费塞拉德城堡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城，商人和手工匠人住在这里，这里逐渐地被历史的压路机推压碾平，为另一个城堡开辟了道路。这种接二连三的衰落和破败带来一种明显的停滞和压抑感，即使在鼎盛时期，这里的喜庆气氛也比意气消沉的老城和忧郁沉闷的玛拉·斯塔纳城堡稀薄得多。费塞拉德尽管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却不大。到达那里的最佳方式就是从地铁站出发，途经之处有典型野兽派特征的庞然大物——文化宫赫然耸现，还有同样令人不快的科林斯式旅馆，亦属于那种沉闷之作，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它们都虎视眈眈地俯瞰着一所监狱——旅馆里的客人

可以看到囚犯们在放风时间绕成圈儿忧伤缓慢地蹒跚而行。离开这个恐怖之地，进入纳·布坎斯，这是布拉格又一条令人难以理解的荒芜、倦怠且凶险的街道。这儿有塔波门，那儿是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圣马丁圆顶教堂是罗马风格的珍贵建筑，仍然行使着教堂的功能，是我进过的最小的教堂。此地为安葬了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梅塔那、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和扬·聂鲁达而自豪，斯梅塔那曾根据丽碧丝和那位强壮的农夫的传说创作了一出歌剧。行走在冷寂无人的小公园里——捷克语把公园叫作“sad”（英文意为“忧伤”），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用在这儿似乎尤为合适，不太适宜的是此处的居民是四对巨大的石头雕像，都是出自约瑟夫·米斯尔贝克之手。另一群居民住在附近的墓地，它们不仅有丽碧丝和普热米斯尔，还有扎博伊和斯拉沃伊，我的《旅游实地指导手册》认为后面两个人是“古老传说伪造的神秘人物”。1945年，人们把石像从原来的帕拉斯基桥搬到了这个地方，同年2月帕拉斯基桥受到美国炮弹的损毁。这是桥的另外一种特性，正如海德格尔在一首不出名的颂诗中所言：不幸之极，它们那么容易受到炮火的攻击。

对于最后一次参观费塞拉德的经历，我究竟能清晰地回忆起多少呢？我草拟了一份清单：沙石小径上落满潮湿的枯叶。一位母亲带着刚学走路的孩子穿过公墓走

向一条伸向远方的小路，似乎两边的墓碑是超市中一排排的售货架。一位修女走进圣马丁的圆顶教堂，点起一支蜡烛，脸上洋溢着喜悦纯净的微笑。仰望冬日里树上萧条的黑色枝丫，可以看到教堂黑色的尖顶。一个嗓音柔和的男人穿着一件蓝色毛衣，坐在小广场的桌子边，兜售着进入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门票——但事实上，对教堂本身我并没有多少记忆……从历史的观点来思考，就像给一个故事赋予一个快乐的结尾，其实就是决定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问题。黑格尔在德国耶拿大学论述绝对理念时，听见窗子下面拿破仑和他的骑兵正在鏖战，他把这个小小的科西嘉人想象成一种战斗精神的化身。与此同时，拿破仑正在想的却是他的痔疮，同样，仍然是这些痔疮可能成为滑铁卢战役惨败的主因之一。事物各有因果。在不断的解构过程中，事实很容易受到影响。不规则几何的创始人伯努瓦·门德尔洛特思考的问题是——一条海岸线的精确长度究竟是多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停下来，说欧洲海岸线最终的精确度是几千几百英里呢？如果我们使用码尺作为测量单位，计算的数字会远远地小于我们用英寸进行的测量。想一想所有那些大海湾、小湾、入口、沙丘、岩石、泥土的纹理、原子、电子、核子、基本粒子、超弦理论……这么一想，立刻让人头晕目眩，根本找不到可

以停下来的地方，因此，只能听之任之，既往不咎。历史是巨大的画面还是微小的笔触，是壮丽的风景还是落满尘灰的历史记载？爱尔兰的历史学家正在忙于研究在修正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之间展开的热烈辩论。修正主义者想要对古老的虔信忠诚进行新的阐释，他们指出，也许1840年的那场饥荒并不完全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的错误，也许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并非像我们一向所以为的那样是光荣的流血牺牲；而传统主义者则认为，历史学家把许多史料当做一种民族建设的工具，对曾经的历史，他们坚持一种诗意的、民族主义的解释。在费塞拉德墓地，有一个特殊的部分——斯拉维——即万神庙，19世纪90年代初由建筑师维尔建造，那些雕像模仿的是“喜乐之乡”和“哀痛之乡”的风格，包括大约50个民族英雄的遗体，还包括新艺术画家阿尔方斯·穆乔和音乐家扬·库贝利克。

在斯拉维的这些纪念碑里，我们偶然发现了年轻的安东尼·伯吉斯的同学，那位曾经鼓励他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喜欢“和妓女们调情鬼混”。

我想提的问题是，历史学家、游客和散文作家全都在同一件事上纠缠不休——“真正的”布拉格到底在哪儿、又该如何定位，实际上，可以说只有这么一件事。

我记得那些落在费塞拉德高地小路上的枯叶，是什么让落叶给那个地方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魅力？当我想起黄金巷，在我眼前清晰地闪动的是我第一次和教授一起走在雪地上，脚下的雪块积聚着，变成灰色的冰，而不是卡夫卡 1916 年秋末至冬天写作《乡村医生》及其他短篇小说时的那座房子。圣维特大教堂阴郁的辉煌在我的脑海中只有微光闪动，相比之下，某个下午的记忆却不可思议地异常清晰。那天下午，我离开那座拥挤的建筑物和那群声浪喧天的游客，撑着一把雨伞，带着一卷儿导游报，走进杰尔卡街。没想到，那里竟然悄无人迹，我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在圆石路面上的回音，追随着一个似乎明确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我并未遇到什么特殊人物，也未看到任何不同寻常的景物，那为什么我独自漫步的印象竟会如此深刻而顽固地扎根在我的记忆中呢？新凿的白色石头铺砌的标志和靠着教堂东墙堆放的装满灰浆的袋子，让我想起苏迪克在 20 年代为重修的圣维特大教堂拍摄的出色组照，是因为这个吗？我不知道，正像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欧洲海岸线的精确长度一样。我能知道的不过是，我看见自己站在那儿，看见午后那盏泛着银珠色的灯，鹅卵石路面上闪着微光，一个日本人皱着眉头察看地图，一条脏兮兮的狗迈着小步跑过去，寻找着某个对它来说极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些让我们能

记住的东西，似乎，这才是我们运用出色的视觉记忆精确地捕捉并存留的事物，冲洗之后，一切都褪去了，前景只留下虽模糊却真实得令人悚然的细节。

如果不把布拉格看做地方而是看做人，不关注它的壮丽景色而关注伟大的人物，那会怎么样？1355 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1316~1378 年）将布拉格变成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北罗马”，从此开始了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并吸引了欧洲各地的艺术家和学者——包括诗人彼特拉克——来此游历和定居。查理是卢森堡公国约翰的儿子，约翰是一位盲斗士——双目失明的战士？——死于克烈思战役。查理于 1347 年被选举为德国君主，1355 年接受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他开始着手从意大利和教皇手中转移权力，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中心地带建立自己的王国。1356 年，他的黄金诏书[1]为皇帝设立新宪法，制定了皇权选举制和选帝侯的

① 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1347~1378 在位）于 1356 年颁布的帝国基本法。又称“黄金诏书”，因诏书上盖有黄金印玺，故名。诏书主要内容是确定皇帝选举法和规定诸侯权限等。1356 年 1 月和 12 月分别在纽伦堡和梅斯的帝国议会上公布。金玺诏书除序言外，共 31 章。规定：皇帝由当时权势最大的 7 个选帝侯（圣职选帝侯：美因茨、科隆、特里尔三大主教；世俗选帝侯：波希米亚王、莱茵的巴拉丁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的边地伯爵），在法兰克福城选举产生。选举会议由美因茨大主教召集并主持；帝位加冕礼在亚琛举行；德意志国王即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再需要罗马教皇的承认。还规定选帝侯在其领地内政治独立，拥有征税、铸币、盐、铁矿开采等国家主权，以及独立的、不准臣民上诉的最高司法裁判权，拥有监督帝国的职权。金玺诏书从法律上确定了德意志侯国的分立体制，进一步削弱了皇权，加剧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金玺诏书的原件今存于维也纳国立图书馆。——译注

权限，声称选帝侯拥有领地的独立权。布拉格在查理统治时期扩张领土，家畜市场（即今天的温西斯和查理广场）曾被合并到新城，建设工程开始于圣维特大教堂，并创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查理是一个极为慷慨开明的君主，才智超群、知识渊博，同时还是一位富有活力的鼓动家和行动者，但我至今仍无法完全明白他。我对他的想象只能源于那些高高在上的雕像群，它们或者面色虔诚肃穆，或者镀着一层黄金，面无表情、昏昏欲睡。对我来说，他那双目昏盲的老父亲倒是更为真实，这位好武喜斗的老人手执利剑，站在克烈思的土地上，向围绕他的无边黑暗奋力劈去。

在布拉格的历史上，最能代表老布拉格的历史人物就是鲁道夫二世了。这个生性忧郁的疯子上过各种各样骗子的当，但却成了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厄和约翰尼斯·开普勒的坚定的资助者。鲁道夫二世生于1552年，这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最为混乱的时期。他的父亲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是费迪南一世的儿子，即查理五世的兄弟，娶了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别急，别急，我们用别的方式再说一遍。鲁道夫二世的父亲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马克西米利安是皇帝费迪南一世的儿子，后者是皇帝查理五世的兄弟，即哈布斯堡王朝的建立者——或者你也可以说他们的老爹都是王朝建立者。马

克西米利安娶了堂姐妹玛丽亚，即查理五世的女儿。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意味着鲁道夫的父母亲的血统使其成为疯子乔安娜的曾孙！[1]所以不必奇怪鲁道夫的人格特征有缺陷。不过，尽管如此，家族成员对疯子乔安娜没有任何的解释说明，人们对如何在树型族系稠密的枝条之间为她确定合适的位置一直拿不定主意，常有抱怨。

鲁道夫二世 11 岁时，在母亲玛丽亚的坚持下，他匆匆离开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在维也纳的宫廷和那些慷慨友好的亲朋，到他母亲的兄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家中去生活。在那儿，他被当做欧洲的一个天主教君主接受一种更为严厉的现实教育。当时的欧洲对新教改革有一种憎恶之情。在马德里的 7 年中，用里佩利诺的话说，鲁道夫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西班牙人，学会了各种风俗礼仪和虚伪的君主政权的各种伪装。固执、要阴谋、讲究宗教仪式的排场、猜忌、迫害异教徒、火刑审判台、对君王权力的无边幻想、对拥有土地和海洋的虚荣心——这就是他的学校教育”。对于鲁道夫这样一个喜欢幻想且对精神生活极为在意的人来说，这种教育经

[1] 乔安娜是卡斯提尔和里昂的女王，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的妻子，是查理五世的母亲。丈夫去世后，可怜的乔安娜疯了，与查理共同执政了一小段时间后就离开了，在托德斯拉斯城堡孤独地度过余生。唉，欧洲的那些皇族们哪…… ——原注

历无疑是灾难性的。鲁道夫对炼金术和文学艺术的兴趣远大于对欧洲政治权力和阴谋诡计的热衷，正是因此，阿希米波多才成为布拉格的怪异风格大师并成了鲁道夫的主要宫廷画家。不过，里佩利诺深信西班牙的教育对这位年轻君主的个性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它加重了他那病态的羞耻感，他渴望独处，这为他日后的妄自尊大和迫害情结埋下了种子，这些东西后来严重地困扰着他。”西班牙对鲁道夫的宫廷影响极大，当这个受过耶稣会士教育的年轻君王代替老一辈执政时，他是一个自由派的天主教徒。这个新起之秀受到罗马和马德里的支持，成为残酷迫害新教改革者的工具，鲁道夫时代之后，曾出现著名的“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波希米亚地区，那些狂热的天主教教徒被看做是“西班牙人”。

嫉妒、妄想、抑郁症、无药可医的忧郁情绪……深深地困扰着鲁道夫，尤其当他眼见时光飞逝，展望人生的终结之地时，这种前景更令其惊恐难耐。鲁道夫是一个具有强迫症的收藏家，他搜集了无计其数的护身符，堆满了布拉格城堡大大小小的房间，他希望这些东西能筑起一道防御之堤，帮助他逃过死亡的追逐。各种各样做工粗糙的工艺品和废物与那些精美的艺术品混在一起。这个内心脆弱的人继承了强大的权力，他常常表现

出来的状态就是沉湎于那些小玩艺儿，雇佣所有的手工匠人在珍珠、果壳、樱桃核、琥珀片、鸟蛋、鲨鱼齿、胆石等的表面进行雕刻和装饰。倘若没有如此巨大的耗资，也就不会有如此浩大的成果。他从维也纳购买了一幅油画《十字念珠》，是他最欣赏的艺术家之一阿尔布雷赫特·丢勒创作的，由四个强壮大汉每人抬一只角一直抬过阿尔卑斯山。

里佩利诺对鲁道夫的收藏癖很感兴趣，他说："在许多奇异古怪的物品中，我需要提及的是……一把铜制的椅子，无论谁坐到上面都很像一个囚犯；一只音乐钟，一只镀金的小盖子上面雕刻着打猎场景中奔跃的鹿群；一支管风琴，可以自行演奏小曲和组曲；鸵鸟标本；用以煮沸一剂毒药的犀牛角杯；用耶路撒冷的粘土制作的还愿章；来自希布仑山谷的一块泥土，是耶和华神用以制作亚当的原料；一只巨大的曼德拉草根好像一个小人儿，靠在柔软的天鹅绒衬垫上，仿佛一个可爱的小东西躺在玩具床上……所有这些都属于人造假人格来姆、机器人和卡夫卡的奥德拉德科族系。"不过，这还只是最基本的样品。里佩利诺继续搜集，对鲁道夫的奇珍异宝室里的古怪玩艺进行了一番整理，汇编出一份"无系统的库存清单"：

蜥蜴的石膏模型和其他银质的动物复制品，海泡石、玳瑁壳、珠母贝、椰子、彩蜡质的小雕像，埃及泥质小雕像、精美的玻璃镜和铜镜、眼镜、珊瑚、装满艳丽羽饰的“印第安”盒子、用稻草装饰的“印第安”匣子……“印第安”绘画或者说是日本绘画，光润的银色和金色的“印第安”坚果核及其他颇具异国风情的物品，还有大帆船等等都是从印第安航运来的，一个彩色石膏的女人体是布拉格超现实主义者的最爱，琥珀和象牙块是用来掷骰子的，一只黄色琥珀的头骨、琥珀高脚玻璃杯、风笛、波希米亚碧玉镶嵌的“风景画”，一张珐琅银质小桌，玛瑙、碧玉、黄玉和水晶，一幅镶在一只乌木框内的银质画，一只用东方雪花石膏制作的浅浮雕，漆石、镶嵌画、小银塔、上覆银盖的水晶高脚玻璃杯，一只黄玉玻璃水瓶是为鲁道夫特制的，星彩石玻璃水瓶，用波希米亚玛瑙制作的水壶有一只金手柄，狮子形的黄玉饮水容器、镶嵌红宝石的金质餐具、泥水罐（其中一些盖着红色丝绒），有一群小雕像的珊瑚船、镀金的木船、镀银的精致小船、饰以水

> 晶的珠宝首饰盒、饰以珍珠母的首饰盒、银质琵琶、青金石薄片、犀牛角、象牙号角、艳丽炫彩的刀具镶嵌着金子和宝石，精美的瓷器、丝绸的碎片，各种球状物包括一只银质鹰头、球形手镯、测量仪，威尼斯的玻璃酒具、希腊神话巨人波吕斐摩斯的古老的头颅、希腊神话中得伊阿尼拉和马人的银像、各种颜色的纪念章、马约利卡陶器、结构标本、马具、马刺、马笼头、粗砺的木头马鞍、圆顶的大帐篷、紧身衣等等，都是土耳其骑兵在突袭、跟踪时留下的物品，标语、枪头、项圈、各种金属牌、鸵鸟蛋做的高脚杯、军刀、凶残的匕首、步枪、短剑等刀具类的东西，还有迫击炮的碎片、手枪以及各式各样的自动钟或音乐钟，无数的钟表、钟表、钟表。

舒展一下紧皱的额头，我们不妨先放下里佩利诺不乏夸张情绪的浪漫表达，以更冷静的方式来探讨一下鲁道夫的收藏之缘由。历史学家 R.J.W.埃文斯对鲁道夫的研究还是颇具说服力的，他为我们展现了这位皇帝的三个不同侧面：第一，他是一个“内心脆弱、摇摆不定和无所依靠的君主”，他的统治以荣耀开始却以耻辱告

终，他被弟弟马提亚废黜，因恐惧而退缩进荷拉德卡尼城堡；第二，他又是一位出色的鉴赏家，是艺术家与科学家的资助者和保护人；第三，这位“鬼才皇帝”受惑于约翰·迪和爱德华·凯勒这样的魔法师，沉醉于星相学、炼金术、犹太神秘哲学和“古老朴素的迷信”活动当中。不过，这些侧面还不足以完全说明这位皇帝的个性——毕竟，人都是多面的，埃文斯最终指出，尽管这些性格层面有重合之处，但鲁道夫的性格多面性仍具有根本上的统一。“尽管谈论一个时代的哲学不乏冒险性，但不可否认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氛围，在16世纪末的欧洲，有一种思考的趋势，这正是布拉格皇族宫廷的特征……部分证据表明这是出于普世主义者的努力，是基督教徒保持精神和政治结合的一种结果，目的是避免宗教分裂，取得内部和平，将欧洲从奥特曼的胁迫下拯救出来。”甚至鲁道夫对于奇珍异宝的嗜好也可以被当做是一种更为动人的智慧、好奇心和冒险行为，成为启蒙运动的先导，而未被看做是一种对黑暗权势的恶劣追求。[①]连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作是骗子、投机者和庸医的约翰·迪也获得了重新评价，受到研究文艺复兴的学

① 这种观点的教益性令人想起伟大的理性主义数学家以撒·牛顿先生晚年献身于炼金术的研究一事，它涉及的不是对《圣经》的解释，而是身为皇家造币厂的管理者，他需要找到铸币成型的方法。——原注

者弗兰塞斯·耶茨的推崇。这样一来，迪不但是一位炼金术士和通灵师，同时也是一位地理学家、数学家、藏书家、菲利普·西德尼先生的老师，出版过数学、航海和历法方面的书籍。

埃文斯写道："对于神秘的探索事实上是一种试图突破现实经验的努力，同样，它与艺术家运用象征和标志的手段并行不悖甚至是相互重合的。与此同时，在鲁道夫的时代，对于自然的所有理解都应归于一种主要的方式，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家就是那些研究周围世界的动力的人，他们的观测方法和观察因果不是彼此毫不相关，而是通过一种彼此呼应的神圣计划进行的精神活动。"因此，不把维卡斯卡巷工作室中的鲁道夫的炼金术士集团当做黑衣魔法师，而是看做今日那些探究神秘而矛盾的现实世界的量子物理学家，这也是可能的。就像从前的炼金术士那样，当代物理学家的工作远比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沉重得多，他们信赖自己的直觉，经常依靠美感进行判断就像依靠纯"科学"一样。埃文斯说："哲学（炼金术）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描述自然界背后的力量，而且也试图控制它们，那些理解了自然能力的初学者也学会了利用自己的知识。"埃文斯在谈及鲁道夫时指出："他坚持传统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论，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认可的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是

极为神秘的。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由知识的秘密源头紧密相连，炼金术、占星术和炼丹术等研究项目都是探索研究的最佳课题。”与此相反，也有少数鲁道夫的同时代人坚持认为，在鲁道夫沉湎流连的神秘事物中并没有任何高级生命存在，他意欲从炼金术士那儿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希望他们找到把低劣的金属转化为金子的手段，以帮助他重新补足因其疯狂收藏而挥霍欲空的皇家国库。

鲁道夫的收藏品的监管人是意大利古文物研究专家乔科伯·斯特拉达，一位经验丰富、性情狡猾的学者，他不但聚敛搜刮了国库的钱财及专为皇帝设计的奖章和珍贵的书籍，还出于皇室的自豪感和讨好之目的，对皇族的血统进行了一番大规模的书写，在《古代百科知识简明手册》中，他将鲁道夫的祖先一直追溯至朱利乌斯·凯撒。不过，斯特拉达仍是一位诚恳的学者，他编纂了一本包括11种语言的辞典，出版了古物研究和机械力学书籍。提香曾为他画过一幅重要的肖像，他在宫廷中获得的高位无疑部分来自于他的女儿卡塔丽娜的支持，她是单身汉鲁道夫的长期情人，为他生了6个孩子。[1]

① 他们的儿子以鲁道夫幻想中的祖先朱利乌斯·凯撒命名，以堂·朱利斯、奥地利的堂·凯撒或马魁思·朱利奥之名而为人所知，他是历史上无数“蓝胡子”（连杀七妻的男人）之一。——原注

许多年里，鲁道夫深陷于抑郁、妄想和围绕其王位的移交而进行的宫廷斗争之中，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沃尔夫冈·卢夫，他先是国王的侍从，后陆续升为高级侍卫和智囊团主席，为皇帝出谋划策，颁布命令。但到了1599年，鲁道夫开始怀疑卢夫正在阴谋反对他，可能与西班牙王及布拉格的宗派人士勾结在一起，于是将卢夫驱逐出去，后来又把他召了回来，不久又出于利益需要将其免职。鲁道夫喜欢惩罚那些他认为背叛了他的人，把他们投入地牢，然后扔掉钥匙。可怜的卢夫在狱中度过余生，10年之后，另一位名字异常风光的朝臣菲利普·朗·Z.兰格费苏也遭此下场。这是一个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一位炼金术爱好者，他并未反对过哈布斯堡家族，却神秘地暴死。

随着卢夫令人意想不到的最终离开，国家事务实际上陷入停滞状态。鲁道夫逐渐地惯于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或者沉于深深的绝望中无以自拔。他当时只在城堡待着，他散步的人行道是封闭起来的，这样他在黄昏时分散步不会被人看到。塞弗尔特在他的诗作《布拉格》中写道：

夜的城堡无处不在
越过黄杨树常青的顶梢

那个荒唐的皇帝踮起脚尖
走进他的胜地——魔术花园
走进玫瑰暮色中的阳台
玻璃叶子叮叮地响
似乎有远风漫拂
却是炼金术士手指的轻触

1611年，鲁道夫的弟弟马提亚曾多次受到他的可怕威胁，马提亚在维也纳的霍夫堡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由新教徒接管皇位，鲁道夫还是不免惊恐，他慢慢地毫无防卫地退出朝政。马提亚被任命为哈布斯堡家族领袖，宣告摄政。他带领军队进入布拉格城门，11月11日，强迫鲁道夫离开王位，答应给他一笔养老金，住在荷拉德卡尼城堡，当然，和他的那堆收藏品在一起。不久，发生了一件令鲁道夫大为惊恐的事情，他养的那只温顺的非洲狮子死了，根据一个预言者的说法，这表明国家首领的死期到了。鲁道夫只好酗酒度日，浑身水肿，于1612年1月20日驾崩，死得很痛苦。对于他个人的古怪性情和执政时期的不幸事迹，伏尔塔瓦河上的居民都充满了哀痛，人们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精神之子。

谁能想象到后来者的评价呢？在网上搜索关于鲁道

夫的信息，不可思议的是，令我深受启示的不是来自里佩利诺、埃文斯或叶提斯的说法，而是来自奥斯威辛纳粹德国党卫队指挥官的回忆录，来自普罗提诺的《埃迪斯四世和五世》，来自《泰勒吐比斯》中的三段情节和《鲁道夫：红鼻驯鹿》一书中的七种解释。这就是辉煌的没落。

# 三　布拉格狂欢夜

还是个小小少年的时候，我就爱上了埃娃·巴多克。埃娃是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演员，如果我没弄错，她的真名似乎是埃娃·伊万诺娃·斯若克。据我所知，她目前仍健康地活着，住在布达佩斯或贝弗利山区。她嫁过四次，当然没有一次是嫁给我，其中一次是和演员库尔特·尤金结婚。据说她有无数的情人，其中包括弗兰克·席纳塔，不过他否认自己是她唯一一个孩子的父亲，让我多少吃惊的是，他竟然还是米尔福德·海文侯爵。1959年，埃娃出版了自传《有价值的生活》，我不够忠心，竟然没读过。她演过的影片有《深

红色的海盗船》（1952年），一个标题很有意思的《一万间卧室》（1957年），与彼得·费什同演的《阿姆斯特丹行动》（1959年），后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娃的深沉与热情是她那个时代美的标志，对我来说，她是有钱男人的朱丽叶。在《阿姆斯特丹行动》中，我记得她有一头乌黑的披肩发，前额是齐刷刷的刘海儿，穿着一件黑色圆领紧身毛衣，胸脯尖挺，令我的青春血脉贲张。同样的一件黑色紧身皮裙配在教授夫人玛尔塔的身上，我的激情回忆仍未稍减。20世纪50年代的爱尔兰还只是个省区，坐在烟雾弥漫的影院里整整看一下午电影，对一个少年人来说，埃娃是他在世界上最大的希望。就我当时而言，她值得我毕"死"追求。

许多年后，我开始周游列国，穿过冷战铁幕进入东欧，我发现埃娃并非独一无二，事实上，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到处都是埃娃·巴多克，也许她们也住在东欧其他我未曾访问过的国家。大街上、电车里、脏兮兮的商店的柜台后面……无论朝哪个地方望去，埃娃的亲姐妹表姐妹都有着同样的深沉与热情，都像她一样可爱，都有着同样又黑又大的眼睛，梦幻般的眼神，迷离地看着远方。可以肯定，对于西方和西方纸醉金迷的"堕落"生活，她一定梦想了好长时间。初到布拉格，我在街上逡巡，看着来来往往的美丽姑娘，不由得生出

形而下的烦恼，她们不再是少年时节我在银幕上看见的那些闪着银灰色荧光的人影，而是伸手可触的真人，她们或者悠然漫步，或者急匆匆地赶往某个指定地点，或者站在汽车站台燃起一支香烟，或者，一起坐在旅馆大厅塑料棕榈树下的桌子边，左顾右盼，寻找客人。

这些迷人的尤物中有一位，我有幸在某种条件下与之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她就是卡特琳娜——我忘了她的姓氏，倘若我曾经知道的话。她是一位自由作家，在布拉格一个小出版社做编辑。我是在第二次访问布拉格的时候认识她的，当时也是在冬天。我到库特纳·荷拉去参观，在那儿还有其他一些有意思的去处，其中就有著名的波尼小教堂。①下午回来的时候，我在宾馆里收到一张字条，是我的老朋友、捷克记者扬写的。他告诉我，他听说我去了城里——奇怪，他怎么知道的？——碰

① 库特纳·荷拉坐落在布拉格东部70公里处，圣徒的骨灰瓮位于城镇外面不远的地方，一面迎风舞动的旗帜上有一只头骨和一只十字形骨，这处圣徒安息教堂大约建于1400年。公墓本是一处普通民众葬身之地，自从一位西多会的修道院院长用十字军东征归来从圣地带回的土在其上洒了一层后，1500年开始，此处就人满为患了。于是，一位西多会修士被赋予一项重任，令其挖出那些古老的常住者为新来的人腾地方。他统共整理出四万具尸首。大约400年后，1870年，一位当地的木雕家弗兰提斯科·里特受雇装饰圣徒的遗体。结果，这让捷克共和国变成最令旅游者毛骨悚然也最富吸引力的地方。骨灰瓮的中心装饰品是一个形态丰满、由各种骨骼组成的枝形吊灯。有骨制十字苦像和骨制肖像。显然，那只臂骨制作的骨船是出自施瓦辛格家族，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混淆的话，一块球形骨关节构成了一只骨骼的眼睛，那是取自于土耳其人的头骨。无需惊讶，伟大的捷克漫画家扬·什万克马耶尔曾以此为题材拍过一部黑白电影短片，并配以生动的爵士乐。波尼教堂（即骨制品教堂）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可怕去处，我觉得应该推倒，给逝者更为仁慈的安葬。——原注

巧，还有一位朋友也在这儿，是菲利普，美国诗人，在纽约某市，西拉库兹，哦，也许是奥尔巴尼，主持一份小型杂志。我们三个是在参加威斯康星大学主办的文学聚会上认识的，自冬天于麦迪逊分手后，这是第一次重逢。我喜欢扬，他又高又瘦，留着络腮胡子，是一个容易激动的年轻人，双手颤抖，常怀忧患，用“神出鬼没”一词来形容他的灵感思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幽默渗透着捷克式的阴郁。我曾经很奇怪，现在仍然奇怪，在冷战相持的无政府阶段，他是怎么拿到赴美旅游的签证的，看起来似乎没费什么力气。难道他是某个地下组织成员或者是捷克暗探？——对于一个与你来往密切、为你提供居所和必需品的人，你难道还能说什么吗？对古斯塔夫·胡萨克的恐怖政策他表现出畏缩，不过，一个醉醺醺的夜晚，我们一群人聚在某户人家俯瞰着麦迪逊的一处湖面时，我发现他还是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厨房的冰箱里找到一瓶酒，我和扬、菲利普把它从冷如西伯利亚的“酒窖”里解救出来，扬声称这是人民的伏特加；我们全都喝得东颠西倒。黄昏时分，我们坐在一扇窗边，看着冰冻的湖面在月下闪着幽昧的微光，彼此传递着冰凉的酒瓶子，冷冽的酒从一只手转向另一只手，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扬发表了一通热情的演说，对辩证唯物主义赞不绝口，不过，他的声音

相当低沉急促，似乎害怕被校园密探偷听、遭到逮捕，这种忧虑并非出于非理性的恐惧，而的确需要多加小心。这让我想起其他类似的一些情景，只是当时无法立刻表述出来。第二天早晨，宿醉稍减，我仍能触及到伏特加制造的迷离轻雾。朦胧中，我意识到，扬让我想起60年代爱尔兰那些天主教神父，他们拥护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回到都柏林时利用改革者的狂热进行煽动活动。偶尔与那些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相遇，他们会为自己拥有的特殊待遇而激动不已，他们往往滥饮一通，后半夜跑到一个角落，用低沉的声调，凑近你的耳朵言说他们从梵蒂冈会议上得来的"福音"，据说太空时代基督正处于上升期。当然，用所谓的教条如禁止避孕、婚前性关系等等进行信仰强制，对这种古老、刻板的条文人们必会激烈反抗。

现在回来说说我们三个，我们在另一个被雪困住的城市见了面。我给扬打电话，让他到我住的宾馆来。他和菲利普一起到的。我提议在宾馆酒吧喝一杯，扬盯着大厅看了一会儿，摇摇头，带我们走到大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雪花簌簌地旋舞，在街道两边的路灯下颤动苍白的微光。我问道："宾馆的酒吧有什么问题吗？"扬耸耸肩膀，说："俄国佬。"一句话，让我想起第一次与教授见面的情景，声音中夹杂

着的古怪而厌恶的情绪让我再次想起从前那些熟识的朋友，那种半讥半讽的大笑，从鼻孔发出的极为憎恶的恨声，甚至让我进而想起了玛尔塔。据扬所言，在布拉格最舒服合意的旅馆一定是俄国商人、俄国军官或者俄国间谍开的。扬坐在出租车前面的副驾驶位上，他和司机聊天的样子似乎他们彼此认识，菲利普坐在他后面。我记得我和菲利普曾分别到中西部各自的公司坐过。菲利普，我称他大块头菲尔，是一个体形硕大、反复无常的男人，呼吸粗重，戴着眼镜，有一副橄榄球队员的肩膀和一双粗厚、笨拙的大手。他和扬的关系比和我的更亲密，我想他们在麦迪逊集会前就认识，菲利普作杂志编辑应该常有机会到布拉格或所谓的东欧去旅行。我总是觉得，在某些永远无法确定的方面，我对他不够信任；有意思的是，正是生活本身引领我们有这些不期而至的邂逅与相聚。我并不是一个善拉国际关系的专家，但我羡慕那种游客，他们走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朋友可以拜访，与朋友自由自在地相处，似乎他们只是昨天才离开。据说珠宝巨头兼艺术收藏家奥弗雷德·贝特在英格兰、美国和爱尔兰都有豪宅，所有的日子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家用设备都处于工作状态，厨房里有满架的食品，衣柜间有刚刚熨洗干净的衣服，贝特夫妇旅行时不带任何行李，直接走进家门，毫无阻碍地继续他们在爱

尔兰、英国、美国的生活。有一种与此相似的方式，但不需要那么多钞票，就是在纽约、伦敦或者布拉格邂逅老友。自上次一别，已经过去几多岁月。好长时间之后与某人重逢，我总有一种隐隐的畏怯感，似乎我得把这中间发生的一切解释一番才成，很像秘密的婚外情被配偶发现时的感觉。因此，当菲利普嘴里咕哝着向我打招呼，问我过去三年里都干了些什么时，我本能地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结果，我们很快便无话可说，只好一起保持沉默，这让他颇觉痛心，也让我备感羞愧。

我们一路开往斯拉维亚咖啡馆，它坐落在新城纳洛迪大街尽头的河边。雪花此时越落越快，老旧的出租车因红绿灯或者突然出现的拐角紧急刹车时会发出喷气声，吱嘎作响，时不时地偏斜打滑，好像一条逆水而行的船，和我们那位少言少语的司机开着玩笑。那些日子，在东欧，雪带来的不是狄更斯小说里的圣诞树和铃铛，像我们在西方常常看到的那样，而是寒意颇浓的狂风、灯影里的垃圾、挤成一团的小房子和冷若北极的深夜，裹在单薄衣衫中缩在床铺上冻得发抖的人们。在布拉格，雪是严酷的。

我们在呼啸的冷风中被送进了咖啡馆，这儿虽然拥挤不堪却极为安静。人们抬起头，满怀期望地对我们进行了一番扫视，仿佛警察的手指在我们随身携带的每样

东西上翻过，随后，那些眼睛又回到书籍、棋盘或桌子下的阴影里。我们坐在布满水蒸汽的窗边，喝着苦咖啡和一种味道特殊的黏乎乎的液体，瓶子上的标签说这是法国白兰地。我们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扬有些心不在焉，我在出租车上的沉默寡言显然仍让菲利普耿耿于怀。我环顾了一下周围。自 1920 年起，斯拉维亚就是布拉格最主要的文学咖啡馆。卡夫卡在日记中提到过它，里尔克常常到这儿来喝夜咖啡，穿着罩鞋，衣领浆得硬挺，戴着白色棉手套，在这儿开始他的短篇小说《布拉格故事集》的写作。塞弗尔特是这儿的常客，甚至还写了一组“斯拉维亚之歌”。斯拉维亚未被改造成奥匈模式，仍保留着古老的乌木和温暖舒适的形态，它更像特利斯特的圣马科咖啡馆，那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咖啡馆之一，喧嚣甚至有点儿吵闹和混乱，桌子紧挨着人，一站起来，椅子背就会让后面的顾客把前门牙磕到杯沿上。好在斯拉维亚除了门口拥挤些外，其他的地方看起来还不错，就像伏尔塔瓦河上的码头。1991 年，咖啡馆因改革被关闭，关了 7 年之久，缘于波士顿投资集团和隔壁电影学院之间的一场租赁纠纷。许多布拉格人包括哈维尔总统都坚决反对咖啡馆关门，1998 年，哈维尔就国家社会事业机构的保留问题做了一次谈话，斯拉维亚终于再次开张。

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夜晚，斯拉维亚更像一个民族的纪念品。在所谓的大众文学聚集地，常来常往的客人能有谁呢？60年代，在都柏林的麦克迪或爱尔兰咖啡馆，我从没见过贝汉或凯文纳；在巴黎的弗洛尔或"两个丑人儿"咖啡馆，我也只看到了大量美国游客，从未发现萨特或波伏瓦在咖啡馆里埋头工作的影儿。当年那个囊中羞涩的年轻爱尔兰小伙子在首次巴黎之行中，居然敢在它貌似温柔的昂贵之地冒险来去，想想真是不可思议。那天晚上，在我看来，斯拉维亚的主顾们都不太像文学人士，不是衣着不够光鲜也不可爱的年轻人，就是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我觉得，唯有在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当中，还可以辨认出一缕残存不灭的智慧之光。我记得，1987年的一天夜里，在都柏林，我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和苏珊·桑塔格进行辩论，话题围绕着他们的一封信和其他东海岸的学者写给《纽约书评》的文章，抗议苏联关押知识分子。言及此，我眼前出现一杯流动的酒，我几乎看得到烟雾后面布罗茨基那张永远笼在雾气中的面孔。我当时问他们，他和他的美国朋友可曾对关押一位俄国街道清洁工或打杂女工持过反对意见，有些可怜人从未写过一行颠覆性的诗歌却仍然在监狱中度过了一生。桑塔格坚持认为，对于庞大、强权的国家机器，有必要保持"挑剔"的姿态，就苏联来说，

她无疑是对的。然而，善良、正义而勇敢的布罗茨基对此却持妥协的态度，他说："我们更愿意自己管自己的事。"最近，我读到一篇俄国散文家和小说家塔季扬娜·托尔斯塔亚写的文章，是纪念布罗茨基的，他于1996年死于心脏病，年仅56岁。她在文中谈到，1989年后，她劝说布罗茨基回苏联，但他当时鬼使神差不想回去。她选了他年轻时写的一首诗，他曾预言，"我没有国家也没有墓地可选/我只能在瓦斯列岛死去"，那些在流亡期间将他当做代言人的崇拜者看到他与他们一起回到圣彼得堡可能会颇感安慰，即使这意味着得冒险到瓦斯列岛去拜访他。托尔斯塔亚这样回忆说："您的读者，那些有文化的小老太太、图书馆员、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拿养老金的、不敢带着缺了口的茶炊进集体厨房的公寓居住者，在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上站在后排，靠近圆柱，只因为那儿的票更便宜的那些人，谁会在意他们呢？"托尔斯塔亚是对的。我们会记得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些索尔仁尼琴们、布罗茨基们、萨哈罗夫[1]们，但在那些黑暗岁月，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们可曾想起过那些"有文化的小老太太们"、那些薪火相传的志士、那些英勇的光明守望者？

---

① 苏联人，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注

菲利普那天是从布加勒斯特来的，他在那儿会见了一位持不同政见的诗人，其实，这个形容词有些多余，因为在罗马尼亚，写诗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异议表现。我很有兴趣直接听他描述那儿的生活，尽管不免有怀疑。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一种西方式的怀疑，齐奥塞斯库政权对暴力过分渲染的报告一定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受到了不少影响。但菲利普对我还是颇有启发的。菲尔属于那种消息灵通人士，他们既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局外人——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用“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词，也是一位热衷于国际政治风云的参与者。不管你的信任度如何模糊，不管你的态度如何暧昧，不管你选择何种方式阐释世界历史事件，菲利普总有能力采取某种方式让你明白，你所掌握的事实是何等地荒唐和肤浅，你的思考是何等地有局限。在菲尔看来，所有的事件要么像暗藏凶险的巨大冰山的一角，看似只有一点点，在阳光下明亮地闪烁，要么就是故意制造的烟幕，在秘密的地下潜隐着愤恨。对于菲尔来说，尽皆如此，别无他样，因为他掌握着第一手信息。是的，菲尔讲给我听的有关齐奥塞斯库及其所作所为都是真的，说实话，我对这些事儿知道得很少。菲尔在布加勒斯特时，齐奥塞斯库正越过数个国际都市，凯旋归来，而这只是多次凯旋中的一次。他回国的标志，或许正如菲利普信

誓旦旦所言，一个与巴黎凯旋门等大的复制品，用木夹板制作，也可能是用卡板纸做的，耸立在公路边上，齐奥塞斯库主席将从机场沿路行经此处。在城市中心，林阴大道两边沿线有主席的车队经过，那些围观者——或许，也可能是捣乱分子都已经被清除出场地。几队安全警察穿着长至脚踝的皮外套，戴着松松塌塌的帽子，他们不知是在模仿电影还是在自我模仿，反正怎么看都像盖世太保。打字机若无允许使用证明，可以不用警告直接没收，齐奥塞斯库家族像黑手党一样控制着国家，他们的权力强化填满了他们在瑞士银行的秘密存款。所有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扬伸出手指捏了一小撮盐，在桌上洒出一个抽象图案，他忧郁地点点头，说，是的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吸血鬼，”他叹了口气，“他老婆也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俩把罗马尼亚整个弄回到中世纪去了。”俄国人当然知道这事，知道事情已经糟糕到什么程度了，但他们能做什么呢？“如果他们入侵罗马尼亚，接管政府，美国人就会大喊大叫；那么只好听之任之了，这个国家最终会爆发。无论什么方式，都是一场灾难。”大块头菲尔却缓缓地摇摇他的大脑袋，嘴角挂着一丝近乎怜悯的微笑。我们怎么可能一言不发？我们难道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吗？事实是，里根和他的人民是齐奥塞斯库真正的赞

助人和保护者。这个说法让扬一下子坐了起来。菲尔将我们轮流看了一番，嘴角仍然挂着怜悯的微笑，仍然摇着他的大脑袋，好像一个教师看着两个他最喜欢的学生，却发现他们此刻的智力竟不可思议地低下。“听着，”菲尔说，当他说“听着”的时候，他的语调是轻柔、耐心的，他要你明白，你就将了解到真正的第一手材料和内幕，你面对的才是真正的知情人。“很简单，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所谓联盟来说，最糟糕的广告宣传是什么？”他摊开宽大、柔软、粉红色的手掌，继续说，“是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是里根和中央情报局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源。正如菲尔所熟知的，通常人们喜欢称中央情报局为“局里”，局里定期选送齐奥塞斯库的高级安全人员到土耳其的一个基地进行“技能形态”训练——我头一次听说这个词，它指的是反起义技术训练，从南美丛林战发展而来。以色列人也被牵涉进来。“以色列!”菲尔粗野地大笑，叫道，“可恶的以色列!”他知道一件事，齐奥塞斯库委托一个以色列人的武装部队来保护自己，其中包括一支配备进攻型直升机的舰队，是专为对付城市游击战争而预备的。菲尔用手指在盐洒制的图案上画了一个三角形，破坏了扬的创作。

他说：“这就是核心线：华盛顿—特拉维夫—布加

勒斯特。”然后，他靠着椅背，双手叉在胸前。

我知道，扬和我一样，对这种分析都颇感怀疑，他眉头紧锁，手指在下颌的微须中间左右滑动，我们两个都不想大声说出这种怀疑。很显然，菲尔声称独家拥有的这些秘密信息因其无从考证，所以也就无法争辩。为什么我们从未听说过里根对齐奥塞斯库的支持呢？从未听说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罗马尼亚的安全警察，以色列给布加勒斯特供应军火？当然了，傻瓜，因为这全是秘密！所以它当然可能是真的。中央情报局曾企图用一支装有炸药的香烟杀死卡斯特罗；吉米·卡特的拥护者中有一个人还曾跑到德黑兰，拿一块饼和一本《古兰经》抄本作为谈判的礼物，请求释放一位疯狂的“毛拉”[1]。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外面，冷雪渐渐转成了雨夹雪，在路灯底下缓缓地飘落，湮没在黑寂的河面上。尽管时间还早，但夜幕已经降临了。菲尔的脸上露出一种自得的表情。这时，扬问他既然到布拉格来了，想不想去见见卡特琳娜。菲尔耸耸肩膀，这回轮到扬微笑着摇头了，他从牛仔裤里掏出一枚硬币，走向一台噗噗喘气的咖啡机旁边的电话。我问，卡特琳娜是谁？菲利普又耸了耸肩膀，说：“一

① 伊朗对教师、先生、学者的称呼。——译注

个姑娘。”他不耐烦的神情，和刚才那副内幕专家的形象完全不同，他可是无所不知的呀。过了一会儿，扬结束了他的秘密电谈，重新回到桌边。卡特琳娜在家，正举行一个晚会，我们受到邀请。一个姑娘……我们付了账，起身离开。

布拉格人是世界上最谨慎的城市居民，坐电车或乘地铁的乘客都小心地除掉可能布满灰尘的书籍封面，尽管是本对人对己毫无害处的书，他们在途中阅读也会在书外套上一张褐色封皮，将平装书的标题藏起来。可以理解，这个城市曾长期布满密探，旧的习惯还未消亡。同样，我们去卡特琳娜家的短途旅行也仍然充斥着60年代间谍电影中的气氛。首先是扬，他在咖啡馆里打电话时，手捂着嘴和话筒，肩膀耸起，背对着房间，好像屋子里有一位唇语解读者似的。随后我们走到外面，三个五大三粗的家伙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迎着冷风，冒着飞卷的雪霰，脚步坚定，迈向黑暗；那些间谍自然也都跟了出来，在冷风中进入指定地点集合，去见一个名叫卡特琳娜的女人。我们在街角处等了十几分钟，都冻得麻木了，才有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喘着粗气开过来接我们这群爱斯基摩人，车后座弥漫着皮革和烤烟的气味，我们三个挤成一团，倒是很暖和。

出租车是布拉格另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它们

像一种个头庞大、不招人喜欢却又羞涩的海洋动物那样，在受保护的浅水湾里聚集、回游。1989 年以前，他们由布拉格运输公司经营，这意味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公司，但现在，他们全都是私人所有，司机可以尽其所愿地赚钱。不过，当时，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绝无可能让出租车停下来等你，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成功过，一定有一套密码信号是专为布拉格本地人所知晓的。通常，我站在马路边轻轻地挥手招呼，一辆又一辆出租车鱼贯而过，而且每辆车都是空的，可是，一旦某个穿着皮夹克、嘴上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家伙，敏捷地走到我的前面，像一个专业的拍卖投标人一样，竖起一只手指，或者扬扬眉毛，就有一辆出租车不知从哪儿驶过来，绕过三条行车道，拐来拐去，穿过轰鸣不已的街道，拖着一道烟气，停到路边，啪地一声打开后车门。如今，出租车聚集在一起会受到警告。我最近一次访问布拉格，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情就是，当我进到宾馆房间时，大堂经理竟然兴高采烈地称呼我为“尊贵的来宾!”我几乎可以肯定，倘若我胆敢到街上叫一辆出租车，它必会向我漫天要价，还会提出各种听起来不大却着实令人快乐不起来的附加要求，相反，宾馆如今对客人礼让有加，应该能提供一项私人服务，即按要求派辆出租车，我只是觉得，也许对于宾馆方面来说，这

项服务要求可能有些夸张。当我同一位爱尔兰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谈及这类事时，他告诉我，有几次夜里，他从火车站打出租车回家，即使计价器上显示为600克朗，司机仍会坚持索要6000克朗。我问他，那你付给他吗？“哦，我付。”他面色凝重地说，鼻子里喘着粗气。看来最好不谈这个话题。

我还未看到卡特琳娜就已经听到她的喷嚏声了。她住在城东的斯来思卡大街，那是一座又大又空的公寓楼，在一幢灰白、多窗、峭立的东欧特色的楼房后面。[①]公寓楼有一个敞开的灰色水泥的入口，上面挂着一盏光溜溜的灯泡，灰色的金属大门在卡特琳娜的推动下，铿然一声打开。她的确就是埃娃，甚至也穿着一件紧身圆领的黑毛衣，黑色长统皮靴。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一张尖削的心形脸，一双纤细苍白的手和两条修长的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她眼睛下面的深色痕迹，是一种李子型的暗影，那是东欧女子的典型特征。她微笑着，鼻音很重，带着水味。鼻子的两翼又红又肿，手里握着一张湿

---

① 然而，我上一次访问布拉格，又到斯拉维亚喝了一杯，如果说这种变化是在著名的改革期间实现的，那么我已无法找到那些变化，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随后，我离开咖啡馆，也许我的记忆因为夜晚的寒冷和雪霰而不冷的峡谷那样，而是相当精致可爱，大道两边布满了19世纪的建筑，显得不够宽敞，一个停车场与大街并列，一直延伸下去。在我的记忆中，我清楚地看到那只巨大的灰色堆积物，光溜溜的灯泡，巨大的金属门。有时，记忆的欺骗能力远胜过它的追想功能，它令你既惊奇又困惑。——原注

透了的手纸。扬和菲尔用脸颊亲亲她，她却只和我握握手，口齿不清地说："噢，对不起，我感冒了。"

她的公寓只有一个单间，却很宽敞，里面稀稀落落地摆着几样家具：一张斜向一边的沙发，几把高靠背的椅子，一张四条腿都雕刻着花纹的红木桌——这是早已消失的中产阶级令人感伤的幸存物，一只书籍装得紧紧满满的书架，一套做工精良的立体音响被放置在一只坚实挺拔的黑色塑料柜里。一只小壁炉四围贴着瓷砖，炉架没有火，其中一半已经被一团团软纸塞住了。屋子里唯一的取暖源是一只小型加热器，这个生气勃勃的家伙好像一只青蛙，蹲坐在地当中，张着大嘴，呼呼作响。显然我、扬和菲尔来早了，房间里不但没有别的客人，而且还未来得及为晚会进行装饰。卡特琳娜走过来坐到壁炉斜对面的沙发上，扬和菲尔则走到高靠背的椅子边坐下。因为我是初次来访，按照待客的规矩，似乎我应该坐在沙发上，结果，整个晚上，我怀着说不清的无助感，半倚半靠在沙发里，仿佛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凝视着其他人高高地坐在椅子上。因为装饰不当，沙发上留下的肿块围绕着我，我时不时地尽量挺起腰，扭扭身子，咕哝几句，以减轻不适感。远处的屋角有一只高大的冰箱，像一只包装箱那样庞大，卡特琳娜从里面拿出一瓶冰凉的葡萄酒，是摩拉维亚的，发着嗞嗞的水汽

声，我们喝着大玻璃杯里的酒，味道过甜了点儿。在此期间，卡特琳娜时不时地就要打上一个喷嚏，她的喷嚏令她更显纤弱和娇小，最后，她使劲地擤擤鼻子，似乎因为它的背叛想要罚它一下，她把纸巾揉成一团，稳稳当当地抛进炉架，那儿已经有一堆湿漉漉的纸团了。我们谈些什么呢？菲利普已经预先讲述过他在罗马尼亚的冒险经历了，扬便为我们提供了一场长篇漫谈，讲他有一天夜里，在威斯康星某个小镇的酒吧外面，和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动手打架的事。故事的重心在于，他的对手事实上是一个波兰后裔，父母都是老牌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卡锡时代曾被关在监狱中。发现这种联系后，扬和他的新朋友重新回到酒吧，在那儿过完后半夜，喝着伏特加，说着波兰政治。扬讲完故事后，菲利普说："当然了，谁都知道，莱赫·瓦文萨[1]被俄国克格勃收买了。"

就在这时，我隐约感觉到身体里面有一股淡淡的忧伤在不断地滋长，很快，我就明白了，原来是饿了——早饭以后我就再没吃什么东西。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晚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喝完葡萄酒，卡特琳娜打了一连串喷嚏后，又找出半瓶梅子白兰地，那是她去都布罗

---

① 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波兰人，"团结工会"负责人，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后任波兰总统。——译注

尼克之前一次外出郊游的时候拿回来的。我经常喝酒，却不怎么喜欢喝梅子白兰地，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心怀感激地喝了不少。饥饿、寒冷和加热器的嗡鸣声搅在一起，让我的太阳穴跳个不停。我想起宾馆光线昏暗的小酒吧，经常坐满高声喧哗的莫斯科人的餐厅，那是我喜欢的地方，我有可能在那儿找一个靠墙角的桌子，带一本书，有一瓶酒，我甚至发现自己满怀期望地想要一盘美味烤猪肉，配着泡菜和热气腾腾的土豆布丁。门铃响起，打断了我的幻想。卡特琳娜走了出去，扬和菲利普若有所思地相互对望了一眼，突然爆发出一阵嘻笑。他们笑的是卡特琳娜呢，还是将要发生的别的什么我不知道的事？许多年来，身处异国，面对难以应付的场面，我在美国逐渐培养出一种面部表情，即暧昧而温和的微笑，这表明尽管通常因为语言障碍，我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但我仍十分愿意——如果人人都在大笑的话——请人向我解释一下这个玩笑的含义，即使那是针对我的，或者，如果每个人都皱着眉头，我会因自己无意间在言语或行为上得罪他人而道歉，或者，只是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表明，我并不像我表面看起来那么傻。许多年前，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第一次到国外旅行，我在鹿特丹参加一个晚会，坐在地板上试图给一位荷兰美人儿留下深刻印象——其实，我是试图在夜晚结束之

前看看能否找到机会被邀请到另一个国度去玩玩，美人儿在这场时续时断的谈话中，用一种极为舒缓的语调问我是否喜欢日内瓦，至少我当时就是那么理解她的提问的。我拿出一种倦怠的旅行者的倦怠的表情耸耸肩，说我从来没到过那个城市。金发碧眼的美人发出倾心的微笑，招呼自己的朋友们与她一起来分享这个笑话。她问的并不是卢梭的出生地，不过，如果我不介意的话，不妨站到地板上陪她喝一杯杜松子酒。我想自己每次在类似场合都表现出一种从容圆熟的态度大概就是源于这件事。

卡特琳娜回到屋里，身后跟着一对中年夫妇，她只介绍说他们是罗莎和阿利克斯，我露出美国式的表情，小心地等着弄清楚他们究竟是谁。从他们那身毫不出众却不乏魅力的旧衣服、那种漫不经心和含糊的态度上，我确认他们当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也许是大学教师，或者中学教员，甚至也可能是作家。罗莎是那种虽年过五十仍能保持良好形象的女人，看起来似乎只有二十多岁。她们年轻时的影子仍未从她们身上消失，纤长的脖子、娇弱的脚踝、温柔动人的微笑……她身材修长，头长得很像莫迪里阿尼那些神情萧索的模特儿中的一个，有一种令人心动的憔悴。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毛皮大衣，有几处地方的毛已经掉光了，她一开始拒绝脱下

大衣，抱怨说房间太冷，的确如此，我和她握手时，她苍白的手在我的掌心里冰凉，似乎她是一个娇小、灵巧、骨骼精美的造物，刚刚被冻得要死。她把灰色的头发在后面拢成一束，使头发不会过于散乱，在脸前面飘忽来去，仿佛在水里，我突感惊惶的是，这令我想起了投进柳树边河水中的可怜的奥菲丽亚。在另一方面，阿利克斯纯粹就是一个契诃夫。他像罗莎一样高，甚至更瘦削，一张淡灰色的长脸，似乎正在苦修；在我的印象中，他戴着夹鼻眼镜，不过，记忆常常是不可靠的。他有一双叉开的大脚，需要刮刮胡子，下巴上的短须闪着银色的微光，脸颊凹陷的地方尤为动人，那是上了年纪的标志。在我旁边，罗莎半坐在沙发的软垫上，微微斜着身子，两只可爱的手拢抱着膝盖。此刻，她由奥菲丽亚变成了埃迪特·西特韦尔，只是少了些皱纹和痛苦的表情。她不断地发出低微而沉重的叹息声，每次似乎都要连成抱怨或者变成悲苦呼号的哀求。我那时想，她正处在某种可怕的精神或心理崩溃的边缘，在这房间里，似乎没有哪个人从她忧伤的迹象中看出了这一点。阿利克斯站在书架边，两手抱着双肩，皱着眉头，我猜想，他正透过那些小圆石的空隙，读着架子上的各类标题。他从进到房间一句话也没说过，他好像认识扬和菲利普，连我这个陌生人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也没说一句

话，不过，他的沉默似乎不是出于无礼，而更像是一种深思熟虑，似乎他不得不说的每件事，他都已经和每个人说过了，他的善良仁慈使他不忍再重复，免得让大家有负担。

与此同时，卡特琳娜在洗涤池边刷洗出两个杯子，为新来的两位嘉宾倒上最后一点儿梅子白兰地。阿利克斯一开始不想喝，他的嘴唇扭动了一下，弄出一个微笑来，他彬彬有礼地抬起手，把手掌按在胸前，摇摇头，但卡特琳娜又让了一次，最后，他拿过杯子，脚后跟啪地一声并拢，微微地鞠了一躬——或许，这又是出于我的想象？罗莎熟练地敲敲装酒不多的杯子，它看着比一口气喝进去的量要多些。她皱紧眉头，仔细盯着面前的杯子，那神情很像一个刚从祭坛上领完圣餐回到座位的人。不过，我有印象，她曾侧过肩膀非常热情地向菲利普打招呼，却对扬很冷淡，因为他用一种相当不客气的方式假装没注意到她。我自然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看明白，房间里的这两个人不会再为我做任何解释说明工作了，而我仍然不知道罗莎和阿利克斯究竟是谁。晚会邀请的客人？可这能算是晚会吗？卡特琳娜的亲戚？叔叔、婶婶？或者是她的父母？谈话东拉西扯地进行着，轮到阿利克斯和罗莎时，都是关于捷克的话题。阿利克斯仍然什么也没说。我一直支撑到最后，喝尽杯子里的

最后一滴白兰地。现在，所有的酒都喝光了。我偷偷地瞥了一眼手表，已经8点半了。

我真希望自己能这么描述——就在这个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大群喝得半醉的布拉格人唱着歌儿，挥舞着酒瓶子拥进房间，口袋里塞满了香肠，我则从肿块团团的沙发上蹦起来，一直跳到天亮。天亮的时候，阿利克斯和罗莎已经走好长时间了，卡特琳娜大笑着，把扬和菲利普推出门去，转回头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她的闺房，我们并肩躺在床上，我是彼得·费什，她是埃娃·巴多克，然后……然后……然后可惜什么也没发生。卡特琳娜开始煮咖啡，罗莎最终接受建议，脱下了毛皮大衣，扬开始断断续续地讲他在美国的另一个故事，为自己的笑话大笑不已。以前我从未发现扬的笑声竟如此狂放。随后，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喝上咖啡。有那么一会儿，卡特琳娜的感冒更厉害了，她朝加热器凑近些坐下，轻轻地喘着气，不断地擤那只红肿可怜的鼻子，她把湿漉漉的手纸攥成纸团，一扬手，扔进如今已近满溢的壁炉架。罗莎用捷克语和她说了一句，听起来好像是责备，她皱着眉头，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昂着头走进厨房，把咖啡壶嘭地一声放到炉子上，随后又打了一个喷嚏。罗莎举目向上看了一眼，便走过去找她，两个人开始用一种暗藏愤怒的语气争辩着

什么。扬看看菲利普，菲利普耸耸肩。这时，阿利克斯在这个晚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表现出他的兴趣，为了将注意力从争吵的女人们那儿转移过来，他小心翼翼地坐到罗莎刚才坐的位置上，在我的旁边，用无可挑剔的都柏林口音满怀渴望地问我是否想“出去喝一杯”。这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或者曾经是一位英格兰-爱尔兰文学教授——在那些日子，我在这个城市遇到的大多数学者都被解职了。他曾到爱尔兰去过。他把他曾访问过的地方称为圣地：“艾莱丝大街……都乐巴莱……阿兰岛……”他曾经见过布伦丹·贝汉。我说，那么，你一定和他“出去喝一杯”了？不过，贝汉看起来已经喝不少杯了，他在酒吧里呼呼大睡。阿利克斯说，爱尔兰人非常好非常友善。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曾跟他讲过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笑话，但他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屁士’[1]艺术家？”在斯里郭，一位老船夫向他保证说在这个地方除了他没人听说过因尼斯弗瑞湖岛，可是当游客让他带他们到那儿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船划到瑞特岛代替那个地方。我说确实是这样，叶芝老年的时候曾找过因尼斯弗瑞，却没找到。阿利克斯教授温和地笑笑，摇摇头。

① 原文为piss，即撒尿、小便的意思。——译注

我问他是否真想让我陪他出去喝一杯，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异常急切。他又笑了，说这次十分遗憾，这正是维亚叔叔心绪不佳的时候，在布拉格没有吉尼斯黑啤酒。我说我并不在乎喝什么，我只想喝点儿什么。他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玩儿，就冲我眨眨眼睛，在我胳臂上轻轻地捅了一下，把我当做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这时，我们身后的争吵差不多结束了，罗莎走过来，看起来受到了冒犯，满脸不悦地穿上皮大衣。阿利克斯冲她说了些什么，使她表现出对我的关切，嘴角露出淡淡的怜悯之情，我猜自己对饮酒习惯的玩笑说法被她曲解了。阿利克斯和我庄重地握握手，陪着罗莎走向门口。在门边，他们两人略略停顿一下，我觉得这有点儿情节剧的味道，罗莎此时完全就是个西特韦尔。我回头看看卡特琳娜，门在她身后敞开着，她不太高兴地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不过还是走了出来，送他们离开。我们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渐去渐远。菲利普说："老天，我觉得我的亲戚们可真糟糕。"我问，罗莎和阿克利斯是卡特琳娜的父母吗？菲利普瞧瞧我，又看看扬，他们又嘿嘿地笑起来。我听见楼下的大门打开的声音，卡特琳娜和"假定的父母"勉强地道过晚安。一阵风从楼梯的平台上吹进来，带来一股强烈、刺激的冰雪的味道。卡特琳娜回到屋中，对我们这些男人看都没看

一眼，直接走到洗涤池边开始气哼哼地刷洗杯子。菲利普和她说了几句话，她耸耸肩，仍然背对着他，什么也没说。扬站起身，冲着我和房门口扬扬眉毛，拿起他的皮夹克。晚会似乎结束了。我穿上大衣，以为菲利普也会穿上外套，可是，菲利普，大块头菲尔，却仿佛要留下来。我和他，我们两人再次握手，说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在都柏林、纽约或者萨拉托加温泉村。卡特琳娜走到门口和我们道别，我向前倾身，想吻吻她的脸，不料她后退一步，打了个喷嚏，微笑着说抱歉。

街上的雪越积越厚。阿利克斯和罗莎的脚印已经全被填满了。扬把手插在夹克衣袋里，我们两个一起走进雪花漫舞的夜色中。我向他询问菲尔和卡特琳娜的事，扬抬起肩头挡住嘴，说："她认为他能把她带到纽约去，给她一份工作，让她成为名人。"他能做到吗？我问。扬看着我旁边的人行道，在飞舞的雪花里，他眯起眼睛，微微地笑了笑……

为什么我会如此清晰如此生动地记住那个夜晚呢？一切都像菲利普·拉金满腹辛酸地看到的景象那样。事实上，在卡特琳娜那间宽敞、昏暗、冰冷的房子里并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它却正是1989年革命之前布拉格的典型特征。那个场景的特殊性在于，它虽普通平凡却不可思议，既沉闷乏味

又古怪奇异，对于西方游客来说，这正是那些被监禁者的生活特征。这群被监禁者，被关在一个巨大的、难以抵抗的、庸俗的体制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流亡者，从偏右的索尔仁尼琴到为左派欢呼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他们对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冷酷无情、厚颜无耻和缺乏理智极为愤怒，简直就是出离愤怒。然而，在布拉格，像扬、卡特琳娜和她的父母（倘若那是她的父母的话），你会觉得，他们的愤怒并不多，而只是厌倦、无聊、烦躁和不平。卡特琳娜厌倦了她的琐碎、庸俗的生活，那间空荡荡的大房子，那只功能不良的加热器，水池里的玻璃杯，储量很少的冰箱，从楼梯吹进来的风……她渴望五彩缤纷、激动人心、冒险刺激；像教授的妻子玛尔塔从前一样，她想去美国，想要拥有所有美国所代表的事物。我不知道菲尔是否能把她带到那儿，我倒愿意设想她是用自己的钱去那儿的。今天，当我在纽约、伦敦或者都柏林遇到某个长得像埃娃的姑娘做着卑微的事情，我都很想知道，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她们每个人都异常美丽，在眼睛下面会有动人的黑色暗影，她们站在当地亚洲人开的食品店的冷冻柜台后面，柔弱纤细的手指揉搓着冰冻的生肉，修长美丽的双腿已经有静脉曲张的迹象。这时我会想起卡特琳娜，想起她厌倦的绝望的神情，我也会想起罗莎和

沉默寡言的阿利克斯、玛尔塔和教授，以及那些我认识和更多不认识的人，想起他们伤痕累累的生活。我希望现在他们能过得快乐些，能活着看到独裁者的倒台，我仍然能听到我的朋友兹德涅克悲哀的叹息："太晚了！对我来说太晚了！"

# 四　大丹麦人，小狗

哈温岛也叫哈汶岛，或简称为汶岛，从前属于丹麦，现在属于瑞典，我们姑且选择中间的说法，称它为哈汶岛。哈汶岛坐落在赫尔辛根东南部的俄莱桑，即哈姆雷特曾居住过的埃尔辛格，距布拉格400英里，是海鸥飞翔的距离。据说，这个名字来源于格林梅尔夫人的宫女哈汶妮德。格林梅尔夫人是该岛主人，传言她谋杀了两个兄弟，其中一个曾让哈汶妮德怀上一个孩子。这个名叫兰克的孩子长大后，就把他的姑妈投进地牢并饿死在那儿，他则代替她成为小岛的真正主人。13世纪，利欲熏心的哈特神父率领一群海盗中途停留在哈汶岛进

行抢掠，毁掉了格林梅尔夫人在诺得堡、松得堡、卡尔松和哈默等地建造的四座城堡。在随后沉寂的几百年里，除了呼啸的暴风雪在海湾盘旋肆虐外，小岛一直保持着宁静和平。1576 年，一个令人难忘的大人物留着光滑的胡须，戴着一只用来掩饰受伤的鼻子的金银合色的鼻甲来到这个礁石林立、景象壮观的地方，丹麦王腓特烈二世把该岛作为礼物，授权他在此建造了尤兰尼堡大天文台，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1546 年，第谷·布拉厄出生于丹麦贵族之家。布拉厄是丹麦贵族家室中第一批离弃天主教改宗基督教的家族。1523 年，第谷的祖父泰格·布拉厄死于保卫路德教徒的马尔莫围攻战，这场战役使丹麦全民改宗。1537 年，路德派大主教克里斯丁三世在王位的加冕典礼上授予泰格的哥哥阿克塞尔统帅权。第谷·布拉厄两岁时，被他的叔叔约尔根·布拉厄及妻子英格·奥克塞丝（当时丹麦女子婚后仍保留父姓）从他父母在纳德斯鲁的城堡拐走，如今，这个地方划归瑞典所有。令人不解的是，尽管第谷曾有过一个孪生兄弟[①]，出生之时便死了，但第谷的父母竟对这场发生在家族内部的暴力事件听之任之，没有

① 第谷成年后，他的亲生母亲最终告知他曾有过一个死去的孪生兄弟，他知道后异常震惊，后来写了一首拉丁文诗歌，借那个死去婴孩的口以一种怜悯的语气表达他俯瞰尘世的心情："我住在高高的奥林匹斯山，而他住在尘埃满满的俗世间。"——原注

任何争辩。似乎，约尔根知道第谷的父亲能理解这事，毕竟他们还有一个儿子，而约尔根夫妇一直没有孩子，这是唯一能分享后嗣之福的办法。第谷晚年对此事的看法很达观，他认为唯有约尔根和英格夫妇才会在财产上慷慨大度地支持他，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地对待他。

布拉厄本是一个尚武家族，然而，幸运的是，因为这次诱拐，第谷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家族接受影响。奥克塞丝的姑母英格家系的人偏好文化学习。英格·奥克塞丝的哥哥彼特是丹麦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是国务政要，掌管高官的任免。英格像她哥哥一样喜欢思考，是一个思想者。许多年里，她和丹麦国王腓特烈的姐姐安妮公主（既属丹麦亦属德国萨克森）保持着活跃的通信关系，书信记录了她在炼金术方面的工作。炼金术几乎是专属男人的研究领域，不仅因为这种研究对女人来说有危险，还因为沉湎于这种秘密技艺的女人容易被人当做巫婆受到责难。[①]无疑，英格对她侄子的教育很具影响力。在文法学校毕业后，第谷先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他当时的座右铭是——“仰望天国之光”。三年后，他到莱比锡继续读书。维克多·E. 托伦新出的第谷传记中写道：“当时，伟大的漫游是丹麦贵族阶层标准的教育模式，第谷沿着比莱斯和奥克塞丝提供的路线到国外学

① 约翰尼斯·开普勒的母亲就被人当做巫婆，仅仅因为她卖过草药。——原注

习，而未采取布拉厄家族去国外打仗的方案。”

在德国温特堡的时候，他在路德的母校读书，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被迅速送往北方尚属安全的罗斯托克市。1566年10月28日，就在罗斯托克城，他目睹了一次月蚀。第谷在仔细地研究了这一现象之后，认为这预示着土耳其苏丹伟大的苏尔曼之死，于是很不明智地发表了一首拉丁语的六步格诗宣告这场即将发生的事件。不久，有关苏尔曼之死的确切消息就传回来了，只不过他死在月蚀前6个月。可见，月蚀并非预示死亡而只是一种变形。两个月后，在圣诞晚会上，第谷同另一个住在罗斯托克市的丹麦学生曼德尔·帕斯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者是布拉厄家的一个远房表亲，他在晚会上嘲弄第谷写的那首有关苏尔曼之死的尴尬的预言诗。决斗中，第谷的鼻梁被砍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幸运的是，他未受感染，经过一段痛苦的疗养终于恢复健康。他回到丹麦的家中，自己做了一次修复手术，用金子和银子混合的肉色金属遮盖疤痕，从此他随身总是携带一只小银盒，里面装着一种粘合药膏。这只珍贵的金银鼻甲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平常只用一只铜制鼻甲代替。

第谷很早就对天文学感兴趣，在莱比锡读书的时候他就“偷偷地买、悄悄地读天文学著作”。显而易见，英格姑妈可能对此有过私下里的鼓励，因为有关星星的

科学知识并不是喜欢舞枪弄剑的布拉厄家族的兴趣所在。17岁时，第谷已经按照亚历山大城托勒密画的各种星图进行了精密的测算，然而，往往是然而——那个时候，托勒密和那些根据哥白尼日心学说设计出普鲁士星图的近代学者仍是最受崇敬的人。第谷的测算仪器只有一只小型天体球,"比一只拳头大不了多少"，他用一根细绳把它悬挂在夜空之下，用一颗行星和两只恒星为其定位，然后根据恒星在天体上的位置验算行星的位置。

第谷对于精密度的热情表明他具有成为科学家的伟大素质。他不像哥白尼、开普勒、牛顿那样是一流的理论家，他也不像伽利略那样是一个天才的技术专家，但他却看到了精确地测定和记录观察结果的必要性。在莱比锡，他买到一只天文半径体，尽管它比一只木制直角校准器还小，但比那只用细绳吊着的器具成熟合用多了。不过，这只半径体只能精确地测量到弧形的一度，而第谷要寻找的是弧形的更微小的测量数值弧分，即1/60的弧度。[①]1596年春天，在德国的奥格斯堡，他周游欧洲各国回来。有一天，他和一个朋友在大街上闲谈，告诉对方他急需一只略大一些的精密仪器。幸运的是，这场谈话被当地一位商人

---

① 我无法解释这种弧度与弧分之间的角度之差别，也许这让你深感混乱，也让我备觉枯燥。此外，尽管我假装明白，可我却不敢确定我所掌握的内容。那些渴望这种知识的读者不妨去读读基蒂·弗格森写的《大人物和他的小狗》一书的附录，它为这些内容提供了一个简短、清晰的说明。——原注

兼天文学爱好者听到了，这位慈善家名叫保罗·海因泽尔——每个善良的人都配叫这个名字，他出资用橡木和黄铜建造了一个巨大坚实的四分仪，也可以叫它大象限仪，半径长度为5.5米，它大到足以一下子容纳40个男人在里面。后来证明这座仪器并未给第谷带来他所希望的成功测量，不过，利用这个庞然大物所做的观测努力表明，理论的应用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时，这也让科学界开始注意到第谷，并使他拥有了天文学家的名声。

35年里，第谷一直在积累星座的观测资料，别忘了，他可从来没借助过望远镜，因为当时还没发明出来呢。这些资料最后为开普勒进行天文学革命打下了基础。100年后，牛顿说他能看得更远是因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①]，而第谷未能自由驾驭的东西却让开普勒有机会借此窥测宇宙深处的光辉。第谷提供的精确可靠的数据资料使开普勒垂涎欲滴，在令人瞩目的1600年，他心急火燎地赶往布拉格，希望能从大丹麦人的星表图中分一杯羹。开普勒本人绝非一位完美的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天文学家，他视力不佳，一只手有残疾；而且，他对天体的实际运行的兴趣也远不像哥白尼那么大，他一辈子观测过的行星不超过6颗。但开普勒和哥

① 这段尊敬之言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谦虚大度：大多数牛顿的研究者都认为这段话是牛顿对其竞争者罗伯特·胡克的尖刻讽刺，因为后者驼背。——原注

白尼全力关注的并非表面现象，而恰恰是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更高一级的真实。①

第谷·布拉厄不是这样。在他十几岁之前，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习惯于分辨夜空中璀璨的群星”。这种谦逊的表述进一步证明了这件事：1572年11月11日夜晚，他发现了一颗“新星”。那时，他住在赫维德修道院，那是一座改宗后的西多会修道院，距他在纳德斯鲁（现在瑞典南部）的家庭所在地不远。他从炼金实验室出来，步行到修道院去吃晚饭，他仰望天空突然停下脚步——那些上了年岁的天文学家一定都患有慢性“颈”挛症——一道闪电越过他的脑海，在仙后座附近的星群中，有一颗从未出现过的新星。当代天文学家断定这颗“新星”很可能是一颗“超新星”，是一颗“白矮星”因自己的重力压迫发生衰落分解，在太空深处引起一场巨大爆炸的结果。出于好奇，第谷对这颗星进行了为期数周的目测记录，可惜唯一的观察资料丢失了。也许就像那些老掉牙的书本上经常写的那样，对这种粗

① 在开普勒之前，天文学家所求的只是他们提出的任何行星理论都应该“让现象有所保留”，就如该句所表明的那样，比如，从地面进行的记录只要能解释行星运行理论，它就是合理的，他们不想用图表标明它们实际的情形。“尽管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但像托勒密和哥白尼这样的学者却从未思考过有关运行的因果问题，他们本人关心的只是如何描述和预测天体的位置及其运行模式，而从未回答过究竟是什么动因使它们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速度和距离进行这样的运转。”（引自基蒂·弗格森的《大人物和他的小狗》）——原注

心行为的一种解释是，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一个注定要与其共同生活的女人——柯尔斯顿·约根斯达。这是“一个从纳德斯鲁乡村来的女子”，也就是说，她是平民身份的女人，这表明一个出身于布拉厄家族的男人是不会娶她的。然而，她却是配给第谷的那个人，他至死都对她忠心耿耿，与她生养了一群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麻烦的孩子。尽管这样的联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人们仍想知道，门第高贵的布拉厄家族对青年第谷的单身女友是怎么想的，能否认可她成为他法律上的妻子。据第谷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彼埃尔·加森迪所言，“第谷所有的亲戚都因柯尔斯顿的卑微出身而被别人轻看，这让他们异常烦恼，只是因为国王的亲自干预，对第谷的激烈指责才未过分株连他人”。

这种干预的根本原因无从知晓。不过，第谷作为天文学家的名声却在不断增长。1576年5月23日，腓特烈二世亲笔签署一份文件将其派往德国和其他诸侯盟国，第谷在这件事上深受鼓舞，腓特烈二世在这份文件上授权给“我们敬爱的第谷·布拉厄……哈汶岛上属于我们的土地，所有属于王权治下的居民、仆从，所有的租金、税务……在有生之年，可以自由使用和掌管，不算租借”。这样的恩惠，一般人都会想，这个丹麦人不会拒绝的。但他却犹豫再三，和朋友、同僚仔细探讨，

听取他们的建议，起码，他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知道了一件好事。第谷的老朋友物理学家约翰尼·普拉丁斯在写到皇帝的供给时，概括性地总结了大家的感觉："这是阿波罗的期待，尤拉尼亚的推动，墨丘利及众星宿的命令。"[1]对于像第谷这样的天文观测者来说，他自然要服从神明们的旨意。

但他并未草率前往。他用了数月时间调查研究他的新领地，甚至在整个海岸线步行测量岛屿的周长，发现是8160步。他似乎也把对上帝的敬畏放进了土著居民的心中。在岛上唯一的村庄里，到处是拥挤凌乱的茅草小屋，他们捕食金枪鱼，或者在哈汶岛上不多的几块散地上耕种。从一开始，他在那些野蛮人中就有了一个坏名声——傲慢而贪婪。基蒂·弗格森把这些写进《大人物和他的小狗》一书，第谷"在哈汶岛的居民及其后代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并不是那个时代智慧的启蒙者，而倒更像古代的格林梅尔夫人那样不乏神秘和恶意"。岛上居民世代自治，并不欢迎这个新主人的到来。他选择在岛中心的一大片土地作天文观测台的地址，这立刻让他站到了居民的对立面，在此之前，这是他们的公用牧地。这种不容抗辩的高压行为并不是腓特烈二世在授权

① 尤拉尼亚是希腊神话中主管天文的缪斯女神，天王星；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信使，水星。——译注

文件中的精神原旨，他曾吩咐第谷“要注意法律和当地农民的应得权益，既不要纵容他们的违法行为，也不要用任何新的课税或非常规的改革加重他们的负担”。

如果说在那儿有什么属于非常规的改革，那就是尤兰尼堡天文台了。第谷构建的观测台、炼金实验室、官邸及行政中心都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楼里面。他是根据罗马建筑师维特里威和16世纪建筑师帕拉提奥的理念进行设计的，后来帕拉提奥对建筑物整体与部分的比例关系的和谐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同时代人的木版画中可以看出，天文台位于弗兰克斯坦城堡和大信号台的十字交叉口。第谷在这里工作了20年，建构了巨大的天文仪器，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对他的天体图之全面精确和欧洲当时建造尤兰尼堡的科技水平感觉神奇和不可思议，甚至在奇迹渐衰之时亦如此。第谷的资助人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他的继位者克里斯丁在花钱上极有节制，第谷不断增加的巨额投资工程尤兰尼堡大大地消耗了国库资产。这时，他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一项来自国王授权的调查对他提起诉讼，指控他虐待当地农民；紧接着，与乡村女子结合25年的婚姻问题再次被提出来，随即是对其孩子合法性的认定问题。绝望无奈之际，第谷认为这一切都是针对他而起的，这是需要离开的时候了，1597年6月，第谷带着全家老小二十多

人乘船赶赴德国。

此后的18个月里，第谷和等待他抚养扶助的家人生活在动荡不安中。在此期间，第谷花费大量精力试图获得克里斯丁的好感与照顾，却毫不奏效。最终，第谷对祖国完全失望了，他开始转而关注布拉格，它是欧洲地理和政治的皇权中心。他以前和鲁道夫的宫廷内侍及贴身顾问们有过接触，知道鲁道夫皇帝对科学和神秘艺术感兴趣。最终，1599年夏天，皇帝传其入宫的圣旨来到，第谷及其随从动身赶往南方，在哈布斯堡，布拉厄家族坐上了一辆辉煌的“新车”。看起来似乎晴空万里，第谷对未来满怀新的希望与期待。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不祥的事，一天夜里，第谷豢养的一头爱畜麋鹿在城堡附近漫步时，发现了一条通往楼顶的路，它在楼板上喝到一盘啤酒，结果喝醉了，一下子从楼梯上跌下来，摔断了脖子。第谷失去了心爱的动物，大为伤心，也许就像鲁道夫从非洲狮之死中所领受的一样，第谷也从这次事故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甚至包括受过教育的人，第谷也很迷信，据加桑迪的说法，他异常害怕代表不祥的兔子和老女人，无疑，麋鹿之死让他深受刺激。

不过，布拉格的欢迎会还是大大满足了他的期望。7月初，他到达布拉格，可能就寄住在位于诺维·斯维

特（“新世界”大街）的格里芬客栈[1]，它坐落在荷拉德卡尼城堡旁边，距皇宫很近。当然，身为贵族的第谷不会在一个小客栈里驻留太久的，况且，从附近的卡布沁修道院传来的钟声也让他时时感到头疼。他表达得很清楚，他迫切需要一个宽敞的地方来安置他从哈汶岛带来的庞大的观测仪器。他来到布拉格市的第一天，就在宫廷花园中受到鲁道夫私人秘书约翰尼·巴威兹的欢迎，对方语气温和地向他致意，并传达了皇帝对他的问候。几天后，他受到鲁道夫本人的亲自接见。第谷在信中向他那位声名狼藉的表兄弟腓特烈·罗森格兰兹[2]描述了这一光荣时刻，极现骄傲之色。鲁道夫在私邸接见他，这当然是特殊礼遇的标志，“他背对一张桌子，坐在房间的长凳上，除我们之外，别无他人……甚至连一个随身的侍从都没有”。不过，尽管第谷可以把皇帝的单独召见渲染为一种特殊的礼遇，

① 这个客栈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街上的第一所房子就叫金色格里芬（译者：直译为“金色鹫鹰”）。隔壁则是金梨酒店，诺维·斯韦特就是金羊羔和金树的意思。金色格里芬的房子上刻着一条捷克语铭文，很有意思：“我们的主人 1801 年在此设立一块纪念碑，以纪念令人尊敬的著名丹麦人第谷·布拉厄，他是皇家的数学教师和天文学家，来布拉格市时曾下榻此处，那时这里名为 U zlatebo noha，即今天的金色格里芬。布拉厄 1600 年住于此地，1601 年 10 月 24 日在如今谢尼宫所在地的一所房子里去世。”到金梨酒店询问，听到的却是否定的答案，金色格里芬的隔壁从前是一家客栈，但有些人似乎记得，在聂鲁达瓦大街经营时，金色格里芬曾经是一家酒店。在神奇的布拉格，所有的事情都变化莫测。——原注

② 1592 年，这位罗森格兰兹和第谷的另一位表兄弟尼德·格登斯迪带着外交任务到伦敦旅行，在那儿，他们肯定遇到过当时英国最重要的戏剧家们……——原注

他还是细心地指出，这种出现在皇家内室无人相扰的情况与皇宫外面的纷扰正成对比，求见者和侍卫的缺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此时城里正是瘟疫肆虐之际，人们认为有些城堡的守卫队也被传染上了，而且，众所周知，鲁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忧郁症患者。第谷用拉丁语交谈，他还呈递上科隆主教和梅克伦堡公爵的引荐信，鲁道夫仁慈大度地没有打断他的谈话去读信，“这种宽容让我不由得将信上的内容说得更加详细，要知道，就当时而言，我的到来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合宜的，他答应支持我和我的研究工作，他说的时候，带着友好的微笑，这让他的整个脸庞闪动着仁慈的光辉”。这个老天真那天的心情一定好得不得了。在信的第二段，他描述这个时刻是安详从容的：“我无法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他的语调真是太轻柔了。”不妨想象一下他们当时所处的场景，在酷暑难耐的盛夏，在低语的房间，皇帝坐在长凳上，眼睛总是湿润润的，下巴低垂，对面是那个身材高大、眼神火热的金发碧眼的丹麦人，留着两撇黑胡子，戴着流行的皱领和一只闪光的金属鼻甲。

接见结束时，第谷从房子里退出来，秘书巴威兹被皇帝召进去谈话。他后来转告第谷，那位从不错过任何事的皇帝曾从窗口俯瞰他到达城堡，这位目光锐利的收藏家想

知道那个附加在他的马车车厢上的机械装置是什么。那东西看起来很像一种计程表，是第谷自己设计制作的。第谷让他的儿子把那个东西送到宫中，巴威兹把它拿到了皇帝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出来说，他的主人也有一两个类似的装置设备，不过，当然了，不像这个这么大，制作方式也不一样。第谷立刻要把它当做礼物呈送，但鲁道夫却说他只要一个按照第谷的设计制作的成品就满足了。巴威兹也向第谷保证说，皇帝对他是极为看重的，他决定为他提供年金，并为他和家人提供合适的住处。第谷欣喜不已，终于有一位皇帝知道如何对待一个天才人物了。

尽管鲁道夫是个反复无常和疑心很重的人，但他的确是位极为坚定的资助者；尽管炼金术的必然失败表明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的全然虚妄，但他仍顽固地支持他的魔法师和通灵巫师"投身于"——怎么说呢——是"炼金术士的试验器皿"还是"炼金术士的无底深渊"？无望的重复，甚至是背叛，都无法动摇他对巫术的魔力及功效的坚信。大博士约翰·迪说："谁能明白鸟的话，谁就能使用起初亚当的语言。"里佩利诺告诉我们说，1584年，约翰·迪到达布拉格时，是带着著名的爱德华·凯勒一起去的，后者在其他那些自吹自擂、不可信任的家伙中，能用迪的那面魔镜召唤魂灵，博士声称一只喷雾的石英球是天使乌列送给他的。凯勒是爱尔兰人，至

少是爱尔兰后裔，官方的记录把他的名字斯耐梅·舍思科误写为斯耐姆，“爱德华·凯勒，贵族出身，出生于英国爱尔兰王国的科纳哈古郡，人称其家族为伊梅米”。布拉格人把凯勒当做江湖骗子，而不完全是谄媚之辈。他的真名叫塔尔博特，他并非出生在科纳哈古郡，而是在伍斯特市。1580年，他因伪造罪被捕，在兰开斯特市受罚被削去双耳。没有耳朵，再加上鼻子被钩起来，一对粉红色的眼睛，这无疑大大加重了他的形象的丑恶。在游历英国期间，他在一个威尔士小酒馆发现了一份神秘文件，来自一个神奇的墓地，还有两只小瓶子，分别装着红色和白色粉末。文件用一种无法破解的文字写成，但凯勒确信文件里面的处方就是点金石。他带着羊皮纸和小瓶子到达伦敦莫莱克区约翰·迪的实验室，成为这个伟大人物的助手。看起来，迪博士好像和那位未来的皇室资助人一样容易受骗。不过，迪自己早已声明，他在格莱斯通堡废墟找到了某种长生不老药。①

---

① 然而，迪不应该低估或者以同样轻信的目光来看待凯勒。R. J. W. 埃文斯在其著作《鲁道夫二世和他的世界》中，借助大量的学术资料及个人的研究，指出迪的行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埃文斯写道：“迪的宽泛的形而上学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他相信小宇宙哲学，即在和谐的宇宙中、在可视世界的下面隐藏着力量。他的观点使其推进了对天文学的思考。与此同时，他还相信，通过诸如象征符号、智慧的‘钥匙’及其他类似物，能够找到那些神秘之地的入口……无疑，迪感觉灵界是一种完全真实的存在。不管他从何处获得这些信息来源，他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它们，从他的降灵会的发展上可以理解当时知识界努力进行普遍更新和改革的时代气氛。”埃文斯是一个宽容的评论者，甚至对凯勒的案例亦如此，他以尊重的态度注意到，此人受到其时代许多人的影响和控制，但他们绝不是无知的白痴。——原注

1583年，谢拉兹宫廷官、天主教徒、大地主奥伯拉特·拉斯基去英国的旅行途中拜访了在莫莱克的迪博士，在迪的水晶球里出现一个幽灵，他预言拉斯基会继承波兰王位。拉斯基既震惊又感激，立刻邀请迪和他的助手到波兰。不过，这两个人不久就离开了那儿，也许，匆忙离开波兰克拉科夫的，还有另一位失望的资助人——拉斯基从未戴上过波兰王冠。1583年，鲁道夫从维也纳坐车回到王宫。一年之后，迪和凯勒就来到了布拉格。早在得到鲁道夫的赏识之前，迪就已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魔术师，20年前，他拜见过鲁道夫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象形文字》献给他，这次，他进一步用欺骗手段将水银变形为黄金，又与凯勒联手召唤水晶镜里的灵界之王，皇帝立刻上当。一时间，似乎只有迪才有资格直接与皇帝对话。布拉格的天主教团对这位被开除教籍却大得女王赏识的英国魔术师深表怀疑，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他可能是一个基督新教徒，但事实上，迪不过是一个不受教条规范的普世教徒。1586年，也就是到布拉格的两年后，迪受到罗马教廷大使的谴责，被称之为“魔鬼”，鲁道夫毫无办法，只好将其驱逐出境，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但迪受到富裕的贵族罗泽姆伯克的保护，在其位于泰布尼的庄园住下来，1594年，他回到英国。鲁道夫

则很轻率地让凯勒代行迪的执事。

凯勒为皇帝提供的服务可谓尽善尽美，获得了大量金子去购买酿造厂和制造厂，并在城里购置了大量房屋，其中一间，据传说，就在不吉利的家畜市场，如今这里是查理广场，浮士德博士曾在那儿住过。浮士德之屋依然屹立，在卡尔洛沃大街40号。[①]不过，命运女神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就在凯勒的地位如日中天之际，紧接着便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1591年，他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鲁道夫的一位侍臣，他试图逃走，但皇家卫兵还是抓住了他；在又一次斗剑后，他被关进克里沃科拉特城堡。他在那儿过了两年半，有天晚上，他贿赂了监狱看守，拽着一根绳子从牢房的窗口逃走。可惜绳子断了，他掉进了护城河，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还摔断了一条腿。鲁道夫大发慈悲，允许他重回布拉格，但那条腿已经感染，只好截肢，装上一条木头假腿。此时，他身无分文，他的波希米亚妻子也已经把她的珠宝首饰当光了，最终，鲁道夫还是把这

---

① 在《神奇的布拉格》一书中，里佩利诺对浮士德的题材异常着迷："根据一个让捷克浪漫主义者引以自豪的传说，浮士德是捷克人，从事魔法、通灵术和印刷术的研究。他的名字是圣·埃斯提尼，意为幸福，也可称为浮士特斯。胡斯运动期间，他移居德国，借故乡捷克昆坦·霍拉镇为自己取名浮士德·冯·昆坦伯格。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人古登堡……在捷克民间的木偶剧中，浮士德更是一个传统性的人物形象，魂灵们一一出场——'亚历山大大帝披着捷克公爵的斗篷，美丽的海伦穿着土耳其的衣服，站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宫廷里，浮士德的样子倒颇像捷克的潘趣——只不过名叫卡斯帕科，常把猫头鹰误认作魔鬼。'"——原注

个叫花子又送进了监狱，这次是在莫斯特城堡，在布拉格上游 80 公里处。尽管有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务大臣威廉·谢斯尔的外交干预，也没把他救出来。但凯勒从未灰心过，他试图再施诡计，但绳子又断了，他再次掉进护城河，摔断了另一条腿。把他拖回监狱后，他喝下妻子偷偷带给他的那瓶毒药粉，也许，可以理解，她正急不可耐地等着做寡妇呢。凯勒死于 1597 年 11 月 1 日。[①]那时，鲁道夫经历了一次不祥预感的震动，凯勒死后不久，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又一个稀奇古怪的外国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第谷留着两撇胡子，鼻子上戴着金属镶片，在身材矮胖的皇帝看来，肯定像一个北欧海

---

① 凯勒并不是坏到极处之人，甚至都算不上是最骄奢的人物，他充其量也就是个江湖骗子，受到容易轻信的鲁道夫和布拉格人的赏识和重用。有一个来自法玛古斯塔的马姆纳，一个希腊骗子，自称是安东尼奥的儿子，曾在土耳其人围攻法玛古斯塔的时候被劫掠后生还，马姆纳在凯勒当红时期来到布拉格，他牵着两只凶神恶煞一般的黑色大獒。他在城里取得了短暂成功，从布拉格的显贵那儿捞了不少钱。1591 年，有人揭穿了他的欺骗伎俩，他迅速逃往慕尼黑，却发现那儿并非避难之地，他被吊死在一只镀金的绞架上，和那两只大狗一起葬在贫民墓地。意大利探险家葛洛尼莫·斯各特于 1590 年夏来到布拉格，驾着由 40 匹马拉着的 3 辆红色天鹅绒车。他是一个高明的骗子，主要手段就是与富裕家庭联姻，然后携嫁妆潜逃。他很快就找到投合鲁道夫喜好的门路，不过，凯勒在一米外就发现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很快就让他自取灭亡了，斯各特最后沦落到在老城广场摆摊卖鹿角膏和来自火星的硫酸盐。（埃文斯在其《鲁道夫二世和他的世界》中猜测，事实上，凯勒和斯各特可能是同一个人。）不过，这些恶棍中没有一个像迈克尔·森迪沃斯那么令人不能容忍，这个家伙是个波兰魔术师，他同其死党、苏格兰著名的普世主义者、神秘的亚历山大·塞冬一道，用一种来路不明的红色药粉表演奇异的咒语。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简单的脚注无法容纳的。（里佩利诺对这两个令轻信的鲁道夫备受困扰的家伙有过精彩的评论。）塞冬在森迪沃斯从柯尼斯坦城堡监狱逃跑后，死在德累斯顿，在那儿，他因不肯说出神奇的红色药粉的配方而惨遭折磨。森迪沃斯本人被吊死在斯杜嘎特，像马姆纳一样，用的是镀金绞架，衣服上挂满金光闪烁的金属片。——原注

盗；而令第谷最感惊奇的却是，他竟然能在皇宫中受到如此热情和慷慨的接待。当然，这位丹麦人作为天文学家的名声早已传开，不过，凯勒可是先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赏识然后又得到迪博士担保的。[①]不管怎样，鲁道夫确如其所言，提供了资助，并让第谷及一大家子人住进了前任代总理雅各布·库兹的房子——库兹已经去世。第谷把这儿描绘成“一座金碧辉煌的神奇宫殿（库兹按照意大利样式建造了它，有一处迷人的私人场地，总计花费超过两万德拉斯）”。这座大房子建在荷拉德卡尼西面的山顶上，如今，房子早已不见，在谢尼宫附近，耸立着第谷和开普勒两人的巨大塑像。秘书巴威兹向第谷炫耀宫殿之繁华，但第谷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只注意到了房子上的塔不够大，他从哈汶岛带来了一些天文仪器，它连其中的一台都容纳不了。无疑，巴威兹已经习惯于和鲁道夫那些生性骄傲又喜怒无常的客人们打交道了，他暗示布拉厄先生也许更愿意选择偏远些的皇家城堡。似乎可供选择的有皇帝最喜欢的狩猎休息地布

① 有传言说，迪和凯勒是伊丽莎白或她的老谋深算的首席事务大臣威廉·谢斯尔派往布拉格的特务，企图在英国—西班牙战争中获得波希米亚人的帮助，另外就是阻止哈布斯堡夺取波兰王位。这种说法持续了好几代，里佩利诺和其他一些人对此都颇感兴趣，而诸如埃文斯、弗朗西斯·叶提斯这样的作者则对它们不太在意。当然，里佩利诺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做此判定，是基于这种观点，他认为二人肯定是奸细——这里用“小鬼儿”一词更为贴切，他声称“这就说明，那些镜子、预兆和天使长什么的都只是出于政治阴谋的欺骗，迪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同重要信使之间的多次谈话，记录文字是密码”。——原注

朗迪和一处建在山边的房子，那座山距布拉格市区约40公里，需要坐6个小时的马车。贝纳克城堡坐落在肥沃佳美的平原上，吉泽拉河环城而过，城区以“波希米亚的威尼斯”而闻名，因为河水泛滥时，整座城就在水上。第谷大为喜悦。在这个内陆的欧洲中心，这里就是另一个哈汶岛。8月末，布拉厄一家搬进了贝纳克，第谷架起了他的第一台观测仪器。①

第谷马上着手启动皇帝提供的慷慨的建设方案。几周之内，庄园管家卡斯帕·冯·姆尔斯坦就向巴威兹发去紧急警报——那个丹麦人正在大肆地革新庄园。与皇家行政部门的一系列争吵一直延续到第谷去世，甚至此后仍有余波。还有其他一些难缠的事，第谷搬进贝纳克之后一个月，因为城里再次突发瘟疫，皇帝只好离开荷拉德卡尼到更为安全的乡下躲避；瘟疫自然也传到了贝纳克，周围地区的死亡人数已达两千，布拉厄家的女人们惊恐万分——第谷很不屑地如此评价她们。在她们的催促下，他只好暂时放弃正在建造的新的尤兰尼堡，退居到30公里外河流下游的吉斯特城堡。那正是1600年初，是约翰尼斯·开普勒到达布拉格的时候，因这次事

---

① 贝纳克城堡如今变得很小，被指定为博物馆，但并不好，由一群极为漂亮能干的工作人员管理。1990年，我参观此地，只有我一个游客。站在有回音的房间，我试图感受一下那位丹麦人遗留于此的气息，可惜那天连一个鬼影都没有。——原注

件，他们推迟了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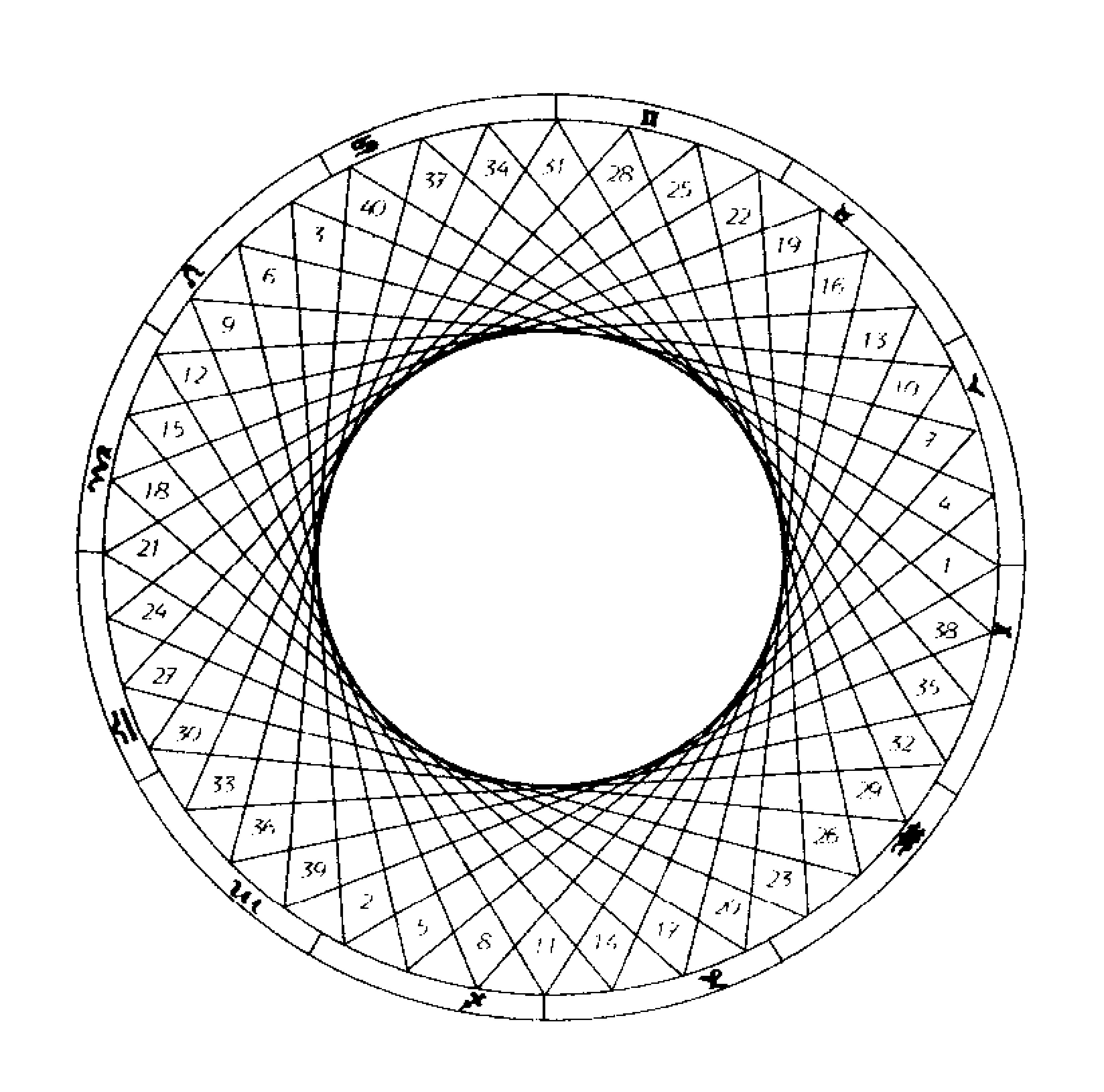
很难再想出有哪两个人物能像开普勒和第谷·布拉厄之间的差别这么大的了。开普勒，一位年方25岁的年轻人，出生于1571年12月27日下午2:30，极为精确；出生在德国西南部森林周边的魏尔市，在符腾堡公爵领地，这是一个“自由城”。这个家族很混杂，祖父舍伯德曾做过一段时间魏尔市长，父亲叫舍伯杜斯，约翰尼斯·开普勒在对其父简短的描述中，说他是“一个占星者、耶稣会士、结过婚、患有忧郁症、邪恶”。开普勒的父亲是一个专职雇佣兵，喜欢吹牛，虐待妻儿，最后抛弃他们，跑到低地国家做阿尔巴公爵的打手去了。开普勒的母亲卡塔丽娜才智敏捷，但性情冷漠，像儿子一样，她喜欢自然界，对草药和自制药物的兴趣最终让人把她看做巫婆，并试图起诉她。约翰尼斯从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8岁那年被送到农场工作，致使病情加重，最后因符腾堡公爵的开明政策，被送回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17岁时，他进入图宾根大学读书，受教于著名的迈克尔·马斯特林，一位深受大学者第谷·布拉厄崇敬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开普勒既是虔诚的新教徒，也是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那位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认为宇宙并非以地球为中心，而是一团永恒、无形的火焰，这有力地支持了

哥白尼的革命学说，后者提出太阳是行星运动的中心。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在当时那种宗教压制的氛围中，学习掌握这些信条是极为大胆的。[1]他也广泛阅读了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和神秘主义哲学家、库萨红衣主教尼古拉斯的作品。尼古拉斯有预见地指出，一百年后哥白尼声明的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观会得到证明。三年级，开普勒被大学当局直接安排到奥地利南部格拉茨做学校教师。在他到达格拉茨时，因为使用不同的日历，他无端地失去十天，想到自己的一生将埋葬在斯捷里亚这样一个落后、偏远之地，开普勒不寒而栗。然而，他仍顺从了当局的安排，1594年22岁时成为中学教师。他主讲高等数学课，还包括天文学。他是一位让人恐惧的老师，第一年还有几个学生，第二年就一个都没有了。他还是省际数学教师，尽管听起来似乎位置很高，但只需要他在每个新年开始之际从星相角度对本城本地进行一番简短的预言。开普勒对占星术的态度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称其为“天文学的愚蠢的小女儿”，另一方面，终其一生，为他自己、为家庭尤其为他的孩子们，他不断地投入在占星术的研究中。他密切关注那些星图的同时，又不太情愿地搜集数据，目的是避免不祥的预言。

① 布鲁诺因为宣扬哥白尼学说被烧死在木头柱上。——原注

1595年7月19日，开普勒记下了这个日子，可以说，这是他作为科学家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他在格拉茨中学的教室里上天文学课，在黑板上画出一个简图以标明木星和土星在运行中相接近的轨迹，也就是说，每隔大约20年，木星就会赶上土星并超过它，在行进中它们会出现一个交汇点。在黄道带上这些交汇点之间的距离会有些微变化——请注意，实际上，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复杂——在黄道带的运行环中可以依据那些交汇点画出一系列的三角形，这些在里侧的三角形将依照某种神奇或者说是神圣的目的形成一个略小的圆环……哦，当然，这里有一个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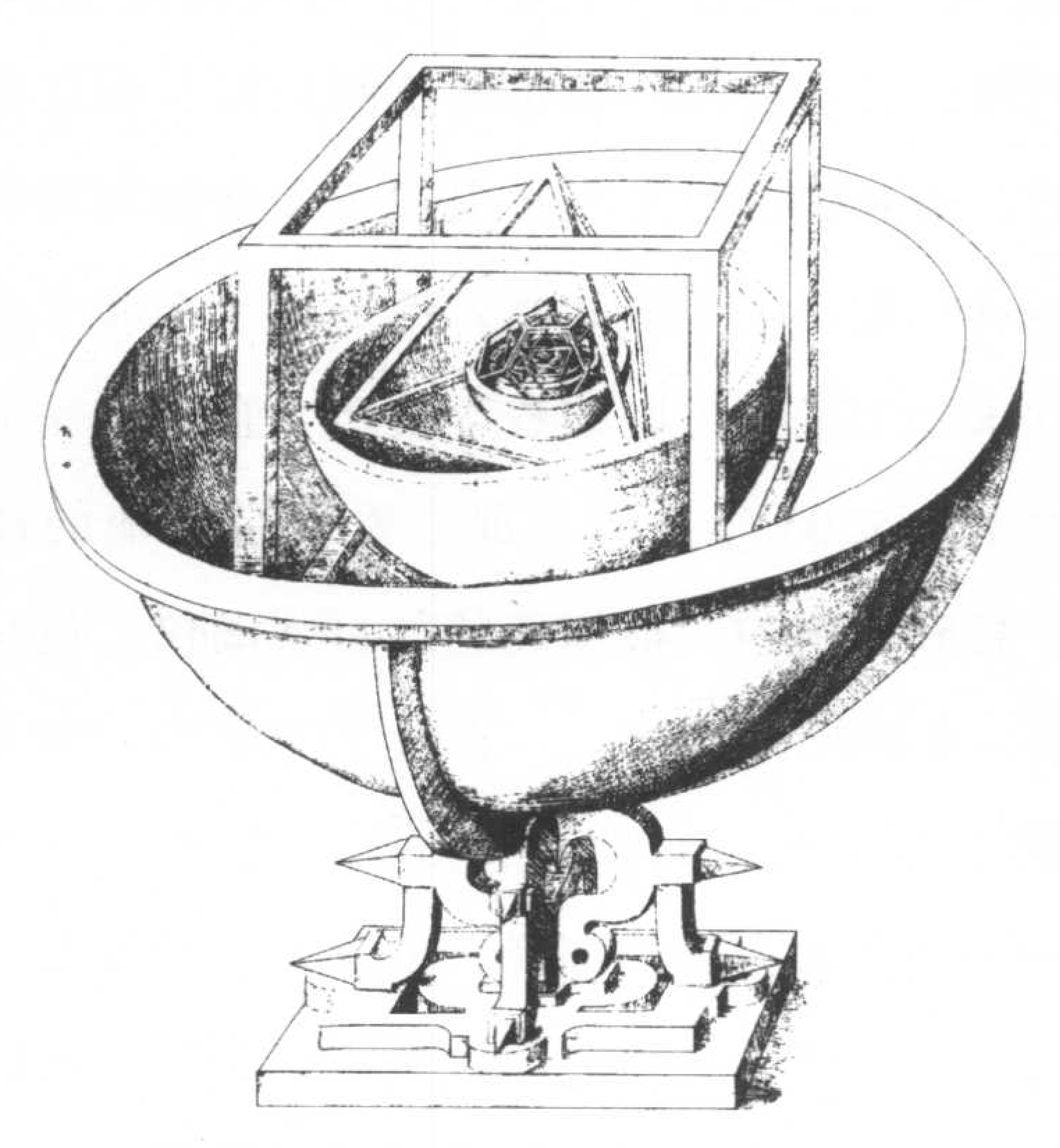


有那么几年，已经成了天文学家的开普勒仍然沉迷于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为什么是6颗行星——在他那个时代只知道6颗行星，为什么轨道与轨道之间是以这样的距离呈现出来的。这一切一定出自一个计划，一种理性的设计，就像几百年后，爱因斯坦所强调的那样，上帝不拿这个世界掷骰子。①对于开普勒来说，毕达哥拉斯的行星系统说是一支庞大无比的乐器，它的巨大而沉默的琴弦正合乎和谐的几何法则。可以确信，他像大多数天文学家一样都追溯至太古时期。开普勒的天赋及其令人惊叹的创造性思考使他不断地提问、探究，并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他之前，宇宙学家们总是尽最大努力按照事物看起来的样式描述它们的位置状态，并尽量准确地描绘出它们在未来的可能情形。开普勒是第一个致力于解释而不是描述的天文学者。他不仅想知道星辰如何运转，而且想知道它们为何如此运转。一定有一个计划，一个方案。

在格拉茨教室讲课那天，他在黑板前面走来走去——你完全可以想象出这样的场景——夏日，太阳光射进尘灰满布的窗子，粉笔的微尘在透明的空气中旋舞轻腾，困倦难耐的学生们在书桌前垂着脑袋，一个孩子迷迷糊糊地伸手捅捅鼻子——开普勒眼中看见的却是那

① 根据量子物理，他是这样。——原注

个外环竟然比内环长一倍。土星和木星是太阳系中两颗最靠外的行星，就像他所知道的，木星轨道大体上有火星轨道的一半长。它们之间的关系式难道真是几何中的第一图形三角形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能根据其他的几何图形的大小找出别的行星运行的轨道之间的关系式吗？他在余下的夏日时光里，试图找到那些可能的图形，他一直摆弄各种三角形、四边形和五边形，那样子很像贝克特笔下的莫洛不停地把几块骨头从一个口袋折腾到另一个口袋里。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他发现他必须放弃两三种体积。在几何学中，有 5 种且只有 5 种有规



开普勒的宇宙模型，选自他的著作《神秘的宇宙》

则的或者说完美的立体，从6面相等的立方体到20面体。这些形状的特征就是，它们可以被放在一个球体中，这样它们所有的转角接触的都是球面，球体也能被放在它们里面，这样球面也会接触到每个面的中心。完美之极。开普勒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大秘密，这就是行星系的结构，这就是巨大世界的座标格。像他所思考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会有6颗行星，因为创造宇宙的上帝是在5种完美的立体上建造太阳系的，以太阳为中心，每一颗行星在其中都有自己的运行轨道。

开普勒毕其一生来证明他的理论，尽管事实上这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它是错的。甚至在他最重要的发现——行星们并不是按照完美的正圆运行，而是按照椭圆形运行，而且他已经发现了引起天文学和物理学革命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即便如此，他仍执著于那个美妙的观念，并求助于某些可耻的数学技巧，企图消除不能自圆其说之处。1595年夏天，那个发现带给他的最初冲动就是，找到可用的、最精确的行星观测仪。他马上想到了第谷·布拉厄。然而，一直过了四年多，他才有机会见到那个丹麦人；而且，又过了一年半，第谷去世后，像开普勒喜欢自述的那样，他这只“小家犬”才有机会吃到第谷那块汁足肉厚的行星图。那时，他已是一位已婚男人，有一个继女，他的妻子名叫芭芭拉，和他

相遇时年仅23岁却已经两次守寡。同时，他也是一位作者，在发表他的天体理论时，他采用了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题目——“关于奇妙而匀称的轨道运动、星等数、运行周期的测算、图示、几何体的5种规则的宇宙学绪论暨宇宙奥秘简论”，简而言之，就是“宇宙的奥秘”。

16世纪末叶，住在斯捷里亚省的新教徒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反改革宗教的运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格拉茨的天主教掌权者们实施严酷的宗教镇压。1599年夏天，开普勒的女儿苏珊娜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死在襁褓中，开普勒拒绝给婴儿举行天主教葬礼，从而导致罚款。同年秋天，谣言四起，任何路德宗教徒搬离该城，其财产和所有物都将被充公，如果传言是真的，就意味着开普勒一家将失去芭芭拉的相当可观的继承物。乡村和城市街道上相继发生数起宗派主义者的暴动事件，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开普勒满怀越燃越烈的渴望，不顾一切地赶往布拉格，在那儿，大丹麦人第谷·布拉厄独占丰富的天文数据却不知如何使用。开普勒给老恩师马斯特林的信中写道：“他和大多数有钱人一样，不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他手中的财富。因此，你必须耐心地从他手中抠出那些财宝，软硬兼施，毫不保留地公布他所有的观测结果。”稍后，1601年，开普勒从布拉格给意大利天文学家安东尼奥·马吉尼写信，说起他到那儿的理

由："深深影响我的是，我希望完成自己对天体之和谐观念的研究——某些东西，我已经深思许久，要完成它，要么第谷有能力重建天文学，要么我有机会使用他的观测结果。"尽管开普勒的视力不佳，但他的眼光却相当锐利清晰。

1600年初，开普勒的机会到了。他认识了家境富裕、知识渊博的巴隆·约翰尼·弗兰德利克·霍夫曼，他是鲁道夫皇帝的贴身顾问，刚到格拉茨出席斯捷里亚省的会议，正要赶回布拉格，准备为他提供一次帮助。巴隆性情和善，尽管是一位天主教徒，但他对身为路德教徒的开普勒的艰难处境却深感同情。而且，巴隆自己还是一位业余天文学爱好者，读过开普勒的著作，非常钦佩他。他与第谷·布拉厄也相交颇深，认为两个人应该见一面。开普勒需要朋友的引见，因为他曾犯过一系列令其尴尬的愚蠢错误，对那位桀傲不驯的丹麦人也有着潜在的极深的误解，包括发表过支持某个叫尼哥拉斯·莱莫斯·巴尔的声明，这个人的拉丁名字是尤阿斯，有一语双关之意，即拉丁语中的熊。他曾在哈汶岛做过第谷的临时助手，后来出版了一个天体系统图，第谷发表激烈声明，指出他在抄袭自己的研究成果；第谷之所以陷于此境，其实并不是他不想发表研究成果，而是因为在他生活的圈子及其家族中，写作出书被认为是

不合绅士和骑士名声的举动。不过，第谷还是原谅了年轻的开普勒的过犯，慷慨大度地写了一封信邀请开普勒到布拉格，向他保证说："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在我这儿，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幸运的追随者……不过你的朋友在不幸的环境下并不曾放弃过为你提供建议和帮助的机会，而且，他更愿意让每件事都能尽善尽美。"开普勒并未回复这封信，他只是带着它，一路直奔布拉格。

1600年，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月，一个微冷的黎明，开普勒到达这座城市。经过10天的旅行，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却听说他要找的那位布拉厄并不住在这儿，而且也没住在贝纳克，他当时为了避开瘟疫正躲在吉斯特。开普勒离开住在格拉茨的芭芭拉及其7岁的女儿瑞吉娜，借住在好客的巴隆·霍夫曼位于荷拉德卡尼的房子，在皇家庭园后面有一条街，有一天这里将被称作第谷新星大街。某个游走在布拉格的人一定注意过这个来自德国维尔的穷小子。照搬维也纳的皇家宫廷当时使布拉格成为帝国的第一座城市，在鲁道夫统治的30年中，它成为欧洲中心，不是因地理位置而是因财富和权势。像每个首府城市一样，它具有一种磁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纷至沓来，有大使、外交官、学者、艺术家，当然，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也有大量的炼金术士、

魔术师和无数江湖骗子。开普勒来到此地，一定是眼花缭乱，在他的想象中，他会拥有“金碧辉煌的屋子和欢欣鼓舞的掌声，受到高贵人物的关注”①。这里有豪华富丽的哥特式宫殿和罗马风格的教堂，②当城堡在小山上沉思时，它一定把这里当做一个城中之城。开普勒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荷拉德卡尼，它属于鲁道夫所有，他明白这位皇帝对于新异科学和古老魔术的热情。开普勒首先是一个专家，此外，他还准备尝试一下，看看占星术和数字命理学能否成为获取皇室欢心的通道。

一月末，严寒杀灭了残余的瘟疫，第谷重返贝纳克，给开普勒又写了一封信。信寄出了。在信中，第谷诚挚地邀请开普勒到“波希米亚的威尼斯”——新建的尤兰尼堡来，这个丹麦人写道：“我并不是把你当做一个客人而是看做一个受欢迎的朋友，一位在观测天体方面最理想的参与者和伙伴。”第谷进一步表达了他的诚意，他让一位天文研究助手、年轻俊美的威斯特贵族弗兰兹·泰纳格和小儿子前往布拉格接这位新客人。开普

① 嗯，此处可见约翰·班维尔的小说《开普勒》（伦敦，1981年）。——原注

② 最好的罗马风格的残存建筑是巴西利卡的圣乔治教堂，在城堡内部，圣维特是最大的教堂。13世纪，西多会的修士来此，给这个城市的建筑带来了法国的影响，现在仍然可以在圣阿格尼丝女修道院中找到这种痕迹。教堂由温西斯一世的姐姐所建，坐落在约瑟夫里面的 U milosrdnych ，一个老犹太区。1782年，该处不再作为修道院；1960年，重新恢复使用；如今，这片房子收藏着国家博物馆里的19世纪的捷克艺术品。——*这回可别说我的导游建议缺乏实用性哦。——原注*

勒在两名“护卫”的陪同下到达贝纳克。第谷热情地接待他，要帮他偿还旅行费用，询问他的家人情况，计划着怎么把他妻子、继女接来同住。开普勒激动异常，欣喜若狂，这位世界上最伟大、至少是最有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毫不怀疑第谷是最伟大的那位——这位哈汶岛的传奇岛主、尤兰尼堡的魔术师、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皇家数学家，握着他的手，邀请他与自己一起工作，一起解决“宇宙的奥秘”。

可惜，不过一两天，开普勒的希望就一下子化为灰烬了。他对贵族阶层的表达方式还不够了解，他误解了第谷出于贵族本能的彬彬有礼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一旦涉及细节，尽管是第谷非常关注的事，他也不堪事务的琐碎，急于回避和逃开。贝纳克仍是一个建筑工地，工人们四处闲荡，到处是嗡嗡声。布拉厄的大部分珍贵仪器仍留在哈汶，其他那些被运到了德国的某地。开普勒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赞助一事感觉灰心失望的人，还有贝纳克的管家姆尔斯坦，他对向第谷及其不良计划提供财政支持的皇家不断发出警报，没有皇帝直接的命令，他拒绝为改革城堡投入赞助费用。

开普勒在贝纳克的流亡生活是纷乱嘈杂、拥挤不堪而又孤独备至的，他用诗意的语言悲哀地描述自己是“身在高处不胜寒”，尽管第谷比他离故乡更远。与此同

时，丹麦人没完没了的粗哑的说话声和陶罐、酒杯接二连三的破碎声不断地传来，待在城堡的顶楼对开普勒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家主布拉厄一脸阴郁地坐在餐桌的顶端，那个喜欢开玩笑的侏儒吉普盘着腿，蹲坐在他的脚边，他的妻子、女儿们大呼小叫，为数众多的随从和助理海阔天空地东拉西扯，你推我挤只为了拿到桌子上的盐瓶，一桶桶的葡萄酒被一饮而尽。平时饮食颇为节制的开普勒在入驻的第一周里一定是常常处于半醉半醒中。第谷答应提供给他的天文学珍贵资料并未打开，第谷自己也未敞开。在晚宴中，开普勒费尽心思地找机会坐到这位大人物的旁边，在不多的几个时刻，趁他屈尊放下架子，比如从盘子里捡起一块面包屑什么的，听他谈几句关于火星的轨道、月球的闭塞或者在这颗那颗行星之间出现的交汇点等问题。第谷信誓旦旦地为这位“共同观测天体的伙伴”提供的东西在哪儿呢？开普勒感觉，第谷并不认为自己在科学知识方面能与他平起平坐，在这个丹麦人看来，他并不是亲信，而只是一个雇员，但开普勒却未注意到第谷的担心和不祥的预感。第谷知道，尽管开普勒还不是一个科学家，但几年之后，在名垂青史方面，他必将成为自己最为强大而可怕的对手。第谷不情愿把那些珍贵的天文数据送给这个只有他一半岁数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害怕开

普勒这个哥白尼的追随者会利用这些数据去证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正确性。因为第谷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这套理论并不笨拙，就像开普勒后来证明的那样，但它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是将古代托勒密的地心说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相调和的产物。

又过了几个月，开普勒像他自喻的小狗一样变得急躁不安，有时甚至充满恶意。[①]尽管不太情愿，第谷还是打开了他搜集的观测资料库，把火星运行轨道的记录交给他。不过，他像往常一样小心谨慎，让自己的另一位助手克里斯丁·索仁森监视开普勒。索仁森出生在丹麦朗堡村（即今朗曼塔努）——他们就喜欢这些拉丁式双关语！这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对上司对待开普勒的态度心里暗含不满。两个人合作得非常好，这主要归功于朗曼塔努人的宽容和作为天文学家的坦荡。终于，第谷放松下来，重新分配任务，让朗曼塔努人研究月球的运动原理——月亮在第谷的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

① 26岁那年，开普勒用第三人称以半玩笑的口吻描述自己："这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不乏狗性的人。他的样子长得像一只家养小狗，他的身体敏捷活泼、瘦长结实而且比例匀称，甚至他的食谱都和狗一样：他喜欢啃骨头和干面包壳，他很贪婪，伺机而夺；而且，他像狗一样，从不喝酒，吃得非常简单，他的生活习惯也像那些家养狗……他不断地走来走去，在科学、政治和个人的感情生活以及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钻研探究；跟在某个人后面，模仿他的思想和行为。他像一只狗一样喜欢向来访者问候却不愿长谈，可是若把一个最不起眼的东西从他那儿抢走，他就会怒不可遏、大发雷霆。他对坏人不能容忍——也就是说，他向他们大吼大叫，连讥带讽地攻击、噬咬这些人。他憎恨许多人，他们也躲避他，但他的主人喜欢他。他像狗一样恐惧洗澡、吃药和上防晒霜。"——原注

角色，他还允许开普勒独自继续进行火星研究，但不久，他就强迫开普勒写下一份保证书，绝不向外界泄露新尤兰尼堡的任何秘密。分配开普勒进行火星研究是科学史上一个颇为幸运的机会，因为该行星的轨道偏离只能用其与太阳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这支持了开普勒一贯坚持的看法，即太阳是引起行星运动的根源。研究火星的那几周，表明开普勒具有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科学家的天赋。

当开普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时，他开始为自己的权利进行呼吁。他要求同第谷签订一份协议，在贝纳克进行的宇宙研究计划中，对方要把他当做一个合作伙伴，保证他的劳动付出有合理的酬报。两个人的协商拖拖拉拉地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天。开普勒要求获得两份工资，一份由第谷支付，一份由皇家支付，而且他可以利用每天下午的业余时间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进行研究，仍在格拉茨的家人芭芭拉及继女正急切地等待着团聚的消息，应该给他和家人一所自己的房子居住，远离贝纳克城堡和这儿的混乱生活。这些协议从某个方面表明开普勒不乏歇斯底里和偏执，同时也展现了第谷的宽容与忍耐，尽管不太明显。不过，他仍然怀疑开普勒对哥白尼学说的偏爱，他预见到无论如何不情愿，都得承认这位年轻人是个天才。第谷极可能是出于贵族的傲慢，才会喜欢

开普勒这个容易激动、积极肯干和多少有些滑稽的合作者。当然了，他在某些方面颇为纵容开普勒，那是贝纳克其他助手想都不敢想的。

四月初，第谷和开普勒坐下来研究解决方案，皇家首席物理学家詹恩·杰森斯基做仲裁人。开普勒递上他写给第谷的要求，第谷也提出了一份文件予以回应，其主要内容是关于保密事项。如果开普勒签署协议，第谷会催促皇帝给开普勒提供一份像样的工资，为他及家人找一处房子，并为芭芭拉和女儿报销从格拉茨到布拉格的路费。开普勒想自由支配星期日和假期，第谷认为这种说法近乎无理取闹，他强调说从未要求助手在这些时间工作过。“助手”一词再次被提及。开普勒却坚持说，要么他的要求完全得到满足，要么就取消协议。尽管杰森斯基博士竭力缓和矛盾，但会谈还是因怨怒不欢而散。吃晚饭时，当着布拉厄一家的面，开普勒喝得酩酊大醉，对第谷厉声愤斥，第谷也如法炮制，针锋相对。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个头儿不高的开普勒因为酒精和愤怒满脸通红，挥舞着拳头尖声喊叫，与此同时，丹麦人抓着桌子的一角，似乎准备把桌子掀翻，与开普勒的狂怒的尖厉不同，第谷的愤怒听起来更像男低音的共鸣。第二天，开普勒离开贝纳克，在杰森斯基的陪同下回到布拉格。第谷再一次表现了他异乎寻常的克制，在两人离开

前，他告诉杰森斯基，倘若开普勒愿意写封道歉信，他仍然可以回来继续他在贝纳克的工作。有人也许以为，开普勒听到这种要求时会愈加生气、愤怒，不过，一旦回到布拉格，开普勒只能到巴隆·霍夫曼家落脚，当然，杰森斯基和善良的巴隆的热心提醒促使他反省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处境的危机，他便给第谷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过分花哨且可怜巴巴的措词令人瞩目。这只小狗决定屈意相从了。第谷接到信，备感轻松，他破天荒地立刻叫来马车，亲自到布拉格去接这个浪子回贝纳克。春日的阳光照着霍夫曼的宅邸，开普勒谦逊地举步长趋，眼中泪光闪烁；丹麦人从马车车厢里下来，金属鼻甲闪闪发光，虚弱的肩膀脱下一只罩在绣花锦缎里的手臂，他们匆匆对谈了几句；巴隆和杰森斯基博士分别站在开普勒的两边，圣维特大教堂传来和谐喜悦的钟声。

回到贝纳克，第谷和开普勒很快就雇用事宜达成协议。由皇帝指定开普勒做第谷的助手两年，在此期间，他可以继续获得斯捷里亚地区数学教师的工资，同时还享有皇家财政提供的半份津贴。协议还提到要将开普勒的妻子及继女从格拉茨接来安置。五月，第谷指定腓特烈·罗森格兰兹——一个不可救药的坏蛋——陪同开普勒到斯捷里亚南部，后者自行到维也纳加入了奥地利军队，与土耳其作战。最终，对于开普勒来说，无论生活

还是工作，似乎一切已经是晴空万里了，然后又像通常那样，不久又阴云疾涌。6月10日，鲁道夫从普尔泽回到布拉格，为躲避瘟疫，他已经离宫9个月了。有一堆等待回复的文件、待定的决策以及皇家数学家——也可以说是皇家天文学家——的建议，皇室要求第谷在一天之内，不，是一个小时内赶到。第谷必须立刻赶往布拉格，他和家人及助手们将被安排在金色格里芬下榻。第谷自然惊诧不已。他在贝纳克的工作刚刚接近完成，北部船运航道已经完全解冻，可以把他放在哈汶岛的仪器运送来，却在这个时候，突然要求他离开新尤兰尼堡，他再一次领教了皇帝的反复无常，其异常古怪的性情很像撒泼。在鲁道夫驱逐了圣方济会的修士，并将金色格里芬后面的修道院令人难以容忍的钟声关掉后，第谷才算多少得到一点儿安慰。善良的修士强调说应当受到驱逐的是第谷，因为他们祈祷的馨香圣洁之气弥漫在荷拉德卡尼，无疑对以炼金术士著称的布拉厄所进行的黑暗邪恶的工作具有阻拦作用。[①]第谷确实抱怨过金色格里芬不够舒适，说得多了，皇帝很快就为他及全家人

① 鲁道夫曾把他们的神奇的圣母子雕像借回去，擦洗干净放在自己的私人小教堂里，若仅就此而言，圣方济会修士们的愤怒可以理解。不过，雕像很快就以自己的方式重回修道院。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景：一个愤怒的母亲，手里抱着一个金色的婴孩，在沉沉夜幕下，大踏步地走出屋子，穿越整个荷拉德卡尼。该雕像被搬过三次，三次重回原地。令人感触颇深的是，皇帝在圣母子像离开后去找修士们，甚至给圣母献上一顶金冠和一件礼服，好像玛丽亚先前向他要过这些东西。——原注

重新安置住处，就在巴隆·霍夫曼府附近如今的第谷新星大街上。[1]鲁道夫进一步指示第谷在美丽的皇家夏宫——即今所谓的贝尔伏德的宏伟的拱廊上安装他的天文观测仪器。[2]与贝纳克的那些仪器相比，这些设备并不理想。第谷在新房子里安装仪器并安置他的3000册图书时，不安地发现西南部的天空有一大片被皇宫建筑物挡住了，对此，他只能听之任之。

与此同时，随着夏日渐近，身在格拉茨的开普勒在越来越热的季节里不知所措。首先，斯捷里亚当局拒绝向他支付他离职赴布拉格的费用，并说他们也不会继续提供他作为省际数学教师的工资，不会顾及皇帝的命令——斯捷里亚的新教徒对天主教的鲁道夫皇帝提出的种种愿望不太重视。开普勒打算同第谷一同工作的希望正在减弱，绝望中他向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二世寻求资助，但费迪南并未理会他的请求。更糟糕的是，7月末费迪南发布了一项命令，将所有不愿改从天主教的新教

---

① 不同版本的传记中关于第谷是否在这个时候搬到另一间房子还有争议，可能去的是第谷新星大街，也可能回到了巴隆·库兹从前在荷拉德卡尼西面那所意大利风格的宫殿里，就是第谷初来布拉格时住的地方。金色格里芬门前标牌上提到的谢尼宫令我尤为惊讶。这个庞然大物于1668年在库兹府的原址上建造，如果标牌所述第谷死于此处的话属实，那么，在布拉格的最后几个月里，第谷肯定不是住在如今的第谷新星大街，而是在谢尼宫。——原注

② 贝尔伏德迄今仍在，在大厦林立的荷拉德卡尼它依然美丽、精致。《旅游手册》上说它是“中欧最具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典范之一”。1833年，夏多布里昂满怀崇敬来到布拉格参观此处，但他对在布拉格的冷房子里度过一个非意大利的冬天还是颇为担忧。——原注

徒驱逐出省。开普勒在科学理论方面的兴趣日益高涨，这使他对路德宗的信仰愈加坚定，根本不可能改从天主教。面对以费迪南为首的宗教裁判所，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于是，裁判所强令他与另外60个持守路德宗的新教徒在45天内离开格拉茨。他马上想到布拉格，从前，那里是他的希望所在，如今，那里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只能再次寄望于第谷的宽容仁慈。10月中旬，由芭芭拉和继女陪护，他回到布拉格，一路上精疲力竭，一直发高烧，但他知道自己足够幸运能找到这么一个避难所。后来，他这样写这段生活："上帝通过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将我和第谷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最压抑最艰难的时候，他都不让我和第谷分开。"鲁道夫，一位天主教皇帝竟然能够允许一个因坚守信仰而被斯捷里亚驱逐出省的新教徒回到布拉格，这足以表明鲁道夫对待宗教超乎寻常的宽容之心，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是斯捷里亚省的统治者。常被客人打扰的巴隆·霍夫曼再次接待了开普勒和他的小家庭——有人会奇怪，对巴隆执著的好客精神，巴隆太太是什么意见呢？——后来，他们搬到第谷那里，和那帮人住在一处。

那是一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鲁道夫仍受着抑郁症的折磨，比以前更谨小慎微和偏执。第谷时不时地就被召到宫里，有时一天两三次，让他提供占星建议，以对付

日渐混乱的宫廷之争。事到如今，第谷已无望重回贝纳克。的确，早在1600年秋天和冬天，绝望之情就开始噬咬他的内心了。第谷55岁，在那种年代，这个岁数已经相当可观了，为了借助王公权贵们的财力来证明第谷宇宙体系中行星的运动轨道，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与他们奋斗了三十多年，已经精疲力竭。尽管他所憎恶的对手尤阿斯早已离世，但他留下的工作印记还在。开普勒发现第谷再次强使他承担工作，第谷不满地说，“尤阿斯从前对我的新学说尽管有曲解和背叛，但仍然比你做得清晰和完整”，这里所说的新学说就是第谷的宇宙体系。若不承担此工作，开普勒几乎无法回到布拉格，他只好毫无热情地进行反尤阿斯护第谷的研究工作。他从未出版这本书，直到19世纪，他的手稿片段才得以面世。整整一个冬天，开普勒持续发烧，仍坚持研究第谷体系，尽管他试图在水星、火星和月球的运行轨道方面做些工作，却根本拿不出时间来研究自己关心的天文学问题。接下来的春天，他回格拉茨一趟，徒劳地想把妻子已被充公的财产抢救出来。秋天，他重回布拉格，第谷陪他进王宫拜见皇帝，这是第一次，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面。

此时，鲁道夫已经恢复神志，第谷有一份请求要呈送给他。根据几十年的天体观测，第谷想在助手约翰尼

斯·开普勒的帮助下出版一份重要的天文星表，有必要提一句，这份星表是基于第谷宇宙体系建立的，它将被称作“鲁道夫星表”。皇帝想到可以因之而同享不朽，非常高兴，欣然同意。第谷的慷慨大度可能出于无意，却颇令人钦佩，他遵守协议，大胆请求皇家为开普勒提供一份薪水。鲁道夫又点头同意了。你可以猜想，开普勒会发现自己很难说清究竟哪个结果更让他高兴——是这次皇帝的召见，他将获得一份有保障的工资，还是第谷的这场把自己也拉入其中的谈话，它表明第谷最终将拿出那些他渴望已久的珍贵的观测资料。

此刻，开普勒突然发现，在第谷的研究室和布拉厄的家族中，他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不再仅仅是助手，而且，无论承认不承认，他已成为丹麦人在科学工作中的同行和伙伴。可惜，这种双星相伴的合作关系并未持续太久。10 月 13 日，就在和皇帝相见的数天之后，第谷与一位朋友米克威兹大臣见面，他们在施瓦兹堡宫也就是彼得·沃克·尤阿斯尼·罗泽姆伯克家吃饭，他喝了很多酒，急着把它们排出去。但良好的风范不允许客人当着主人的面起身离席去办这种事，何况，第谷在社交细节上又是那么讲究的人，开普勒解释说，“他更看重礼仪形式而不是身体状况”。他咬紧牙关坚持着，但罗泽姆伯克饮食虽有度酒量却惊人，等第谷好容易能上

厕所的时候，他却发现已经不会排尿了。他回到家，仍然尿不出来。开普勒写道："随后是连续性的失眠、肠胃炎、发烧、渐渐陷入昏迷。由于他的饮食方式，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简直无可救药。"他躺在床上，自知不久将离世，便请求开普勒，尽管知道他对哥白尼学说深信不疑，仍请他"按照第谷假说进行证明"。据开普勒所述，第谷一再地重复说，"就像……就像一个作曲家创作一首歌曲"，他令人心碎地祈求，"别让我好像白活了一辈子!"开普勒继续写道，10月24日，"昏迷了几个小时后，他在家人的祈祷、哭泣和安抚中慢慢停止了呼吸，他走得很平静"。[①]第谷葬在老城广场的提尼教堂，葬礼非常隆重，棺材上覆以绣金线的黑布，是按照布拉厄外套袖子的色彩搭配织绣的。当时，在令人生畏的教堂里，黑色与金色都是抢眼的颜色。据开普勒所述，第谷的妻子"随后被两位上了年纪的地位高贵的皇室官员护送走了，然后是他的三个女儿，各由两位贵族绅士相陪，陆续护送走"。皇帝让第谷获得了尊荣，这表明柯尔斯顿最终"被看做是一个诚实的女人"，他们的孩子至少在波希米亚地区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对这座收留了他的城市为他举行的送行仪式，第谷

① 当时的医疗诊断说第谷死于肾结石，但1901年的尸检中却未发现结石。可能其真正的死因是尿毒症。——原注

应当感觉满意。开普勒写道："街上站满了人，送葬队伍仿佛在两道墙之间前行，教堂里挤满了贵族与平民，几乎无处容身。"①

第谷·布拉厄的墓地仍在提尼教堂里面，有一个真人大小的桃灰色云石浮雕像，上刻一行字迹闪亮而含义模糊的墓志铭："存在胜于感觉。"

第谷的人生终结标志着开普勒专业研究生涯的真正开始。两天后，皇家秘书巴威兹带来皇帝的旨意，指定开普勒接替第谷做皇家数学教师，甚至死亡也无法拖延《鲁道夫星表》的出版工作。开普勒异常惊讶地听说他的工资竟然是或者说至少是第谷当初答应的6倍。另一方面，开普勒如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拿到第谷的观测资料，自由使用他的仪器设备，不过，对于视力不佳、戴眼镜的开普勒来说，这些仪器的使用价值并不大，但皇帝还是用2万弗罗林从布拉厄家族手中购买了布拉厄的天文研究财产。开普勒和芭芭拉从荷拉德卡尼搬到位于老城区费塞拉德斯卡大街的一间房子，距浮士德的房子不远，与艾默斯修道院相对。②尽管家庭不幸——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孩子也

① F. 马里隆·克拉伏特的哥特式小说《布拉格的女巫》的开头就是描写一场在提尼教堂举行的葬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复印的这本平装书是"丹尼斯·惠特利图书馆的神秘系列"丛书。是的，布拉格有时能接受一个古怪的朋友。——原注

② 如今这里是捷克科学院。——原注

死了，而且还时不时地和布拉厄家的人争吵一番，[1]但在布拉格做皇家数学家的那些年是开普勒生命中最接近其梦想的时候，尽管房子并不是金色的，也没有欢呼与掌声，可至少身后还会传来一两声皇家的喝彩。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布拉格完成的，研究题目多种多样，从人的肉眼观测火星轨道到雪花的结构直到他写出第一篇科学理论杰作《天文新星》。他心里牢记着第谷逝前的请求，给这个丹麦人以应得的尊重，但他无法证实第谷假说的正确性，正像一位传记作者明确指出的那样，“历史欢呼的是哥白尼革命，不是第谷革命”。

1608年，鲁道夫被迫让出皇位，大势已去。在欧洲，开普勒所有的和平前景都被扫荡一空、不复存在。1611年冬天，布拉格陷入混战。帕索主教、大公利奥波德五世指挥军队，他本是鲁道夫为了夺回皇位轻率任命的，这支军队在城里引起了暴乱，缺乏训练又毫无纪律观念的士兵任意胡为，同波希米亚自卫队展开了流血战役。开普勒那时正在新城区的房子里工作，想要揭开

---

① 鲁道夫没能很好地履诺用2万弗罗林买下第谷的资料和仪器，第谷家自然很不情愿把它们交给这位新的皇家数学教师。第谷的助手泰纳格早已接替他编辑《鲁道夫星表》的工作，他两次向开普勒提出所诺的薪水一事，泰纳格要求归还第谷的手稿和星图。开普勒答应了，却悄悄地留下火星观测资料。就是给小狗的那根骨头……——原注

宇宙和谐的秘密，他从工作室的窗口望下去，看见街上到处是烧杀抢掠。与此同时，荷拉德卡尼的皇宫“弥漫着疯狂和毁灭”的气息，鲁道夫的兄弟满怀仇恨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攫取了波希米亚王位，这让鲁道夫近乎精神崩溃。4月，开普勒也从荣耀之地跌入凡尘，在布拉格无法生活下去，他被迫接受了奥地利林茨一所中学的教职。皇家数学教师再一次变成了中学教员。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6月，芭芭拉因高烧去世。对这个同他荣辱与共近半生的女人的离去，开普勒确实伤心了一阵子，但他还是再婚了，这次的婚姻还比较幸福，不过和前一段婚姻一样，他们的孩子还是一个一个地夭折了。1615年，开普勒的母亲被控施行巫术罪，他用了6年，是的，整整6年时间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和保护。他离开她几个月后，她也去世了。可是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开普勒从未停止过天文学研究。当他周围的世界陷入一片混乱和可怕的宗教争战时，他却深深地沉醉在探寻天国和谐的奥秘中，作为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他始终把宇宙看做是一个音乐的模型。1618年5月15日，开普勒完成了他重要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第三公理，即《宇宙和谐论》，指出行星的运行轨道及其与太阳的距离之间的关系。他欣喜若狂，在《和谐论》的结尾，他向宇宙的创造

者上帝唱了一首赞美诗："哦，主，伟大的创造者，我感谢你……你用自然之光唤起了我们对永恒之光的渴望……"

5月23日，在开普勒发现第三公理的8天之后，一百多名贵族新教徒强行进人鲁道夫宫廷的大臣府，抗议鲁道夫收回了"圣信"——保证省区的宗教宽容政策，以及鲁道夫的哈布斯堡继承人对波希米亚兄弟会教堂的镇压，这所教堂是扬·胡斯①用生命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他们表达虔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抓住两个信奉天主教的摄政大臣加洛斯拉夫·波利塔·兹·马提尼和维莱姆·斯拉瓦塔，把他们和他俩的秘书菲利普·法布利修从大臣府的东窗扔了出去。这三个人死死地抓着窗台，运动领袖图伦伯爵用剑柄敲击他们的手指，直到他们松开手。这些替罪羊还算幸运，窗外就是时常漂浮下水垃圾的护城河，他们都掉在了柔软的河床上。正如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的那样，这就是布拉格的第二次自卫战

① 扬·胡斯（Jan Hus，约1372~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曾任布拉格大学教授和校长、布拉格伯利恒教堂神父。他受到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的影响，反对天主教会及德意志帝国对捷克的控制，反对教会占有土地，反对教皇兜售赎罪券，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主张信徒在圣餐中可与教士一样领取圣体血；提倡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并亲自将《圣经》译为捷克文。1415年因异端罪名被处死。由此激起捷克人民的极大义愤，引起了胡斯战争的爆发。著有《论教会》一书。——译注

"三十年战争"的开端。[1]第二年，皇帝马提亚去世，皇位传给侄子费迪南二世，他是耶稣会士的顽固追随者，曾于1600年亲自下令将开普勒及其他新教徒一同驱逐出格拉茨。这立时引起波希米亚地区的叛乱，他们推举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做波希米亚国王。1613年，腓特烈娶了英国王室詹姆斯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欧洲对这对"仿佛莎士比亚戏剧男女主人公"的绝配寄予厚

① 布拉格人有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特别喜欢把人从高处扔下去。1393年，第四位温西斯国王就命人把布拉格的大主教管区的教区牧师扬·内波姆斯基即后来被追封的圣约翰·内波姆克从查理桥上扔到伏尔塔瓦河，显然这位国王比不上与其同名的祖先。1419年，温西斯死后，激进的宗教改革者扬·胡斯的信徒们把布拉格市市长及其外交助理从新城大厅的窗子扔了出去，没有松软的垃圾保护他们，结果一摔就死了。跳过一段看看——为了使表达不至于太过枯燥，不妨直接跳到20世纪，在1948年3月10日，捷克外交部长扬·马萨利克，一位自由主义者，曾试图在新政党的联邦政府中限制共产党的权力，被人发现死在外交部的院子里，上面是敞开的窗户。有人猜测说他因无法面对斯大林主义给其祖国带来的危难前途而自杀，但也有人怀疑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而是别人推下去的。因此，可以理解，在1968年8月那个重大的日子里，许多害怕俄国人的人们会在布拉格有所行动，比如把改良派首席部长阿历山大·杜贝克从某个高处推下去。——原注

望。[1]他们住在海德尔堡那座童话般的城堡里，“有花园、岩洞、流水弹奏的风琴和会唱歌的雕像”，此处堪与鲁道夫的荷拉德卡尼宫相媲美，是“17世纪发达文明的集中地”。伊丽莎白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年轻女人[2]，英国大使说她的丈夫是一个“具有超乎其年龄的虔诚、聪慧、活跃且勇敢的人”。这对夫妻仔细地讨论波希米亚国王加冕的问题，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腓特烈的母亲磋商，大主教极力主张接受加冕，而腓特烈的母亲却恳求他拒绝。不过，腓特烈是个热忱的新教徒，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呼召，便于1619年9月27日携伊丽莎白及长子亨利王子出发赶赴布拉格。欧洲大部分新教徒欢喜非常，英国认为“世界上唯一的完人”女王伊丽莎

---

① 见弗兰克斯·叶提斯的《炼金术士的启蒙时期》一书。伊丽莎白女士是一位颇具鉴赏力的戏剧爱好者，1612年圣诞节期间，王室剧院在这对新人的订婚之夜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以示庆贺。叶提斯注意到，有些学者指出，剧中的婚礼假面舞会原作中没有，是为了这个场合特意加上去的。1613年2月14日的婚礼之夜，在新婚夫妇和王室面前，一场由托马斯·坎皮恩作词、伊尼戈·琼斯作曲的假面舞会在英府的宴会大厅举行。叶提斯引述了一段迷人的合唱：

现在都来唱吧唱吧一起唱，
让爱的歌声将这里照亮，
这夜晚因为有了爱的誓言，
这夜晚变得美丽平安；
你的微笑让王冠闪烁高贵，
它的日子必充满荣美，
莱茵河啊泰晤士河
不同的名字写进一个传说。

唉，*莱茵河与泰晤士河的神奇结合不会维持太久的。——原注*

② 笛卡尔曾将《哲学原理》一书题赠她的女儿，另一位伊丽莎白。——原注

白一世的时代即将回来。这对夫妇在圣维特大教堂举行了加冕典礼，弗兰克斯·叶提斯说这是“由波希米亚教堂举办的最后一个盛大仪式”。

波希米亚相信新选的国王和王后将成为国家自治和宗教自由的救星，在鲁道夫神秘加魔力的统治时期，自治和自由就是他们的唯一渴望。不过，波希米亚人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太信任伊丽莎白的父亲、英国国王詹姆斯了，他们相信他会维护他们的目标，如果有必要，甚至会采取武力支持。可詹姆斯却因害怕哈布斯堡而反对波希米亚的冒险行为，他藏在幕后，否认女儿及其丈夫同他的关系。德意志的新教徒诸侯也无法前来提供波希米亚人所期望的支持。与此同时，天主教开始集结兵力，1620 年 11 月 8 日，在布拉格市外的比拉·赫拉地区，腓特烈的军队在白山战役中被彻底击败。“冬之王”带着妻子逃回海牙。溃退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迫不及待地对波希米亚的新教徒进行残酷的报复。第二年的 6 月 21 日早晨，27 位捷克新教徒领袖，包括贵族、骑士和平民，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被处以斩首，执行官是扬·米迪拉。当天受刑的就有善良的老扬·杰森斯基，他是鲁道夫的医生、后任布拉格大学校长，曾为开普勒与第谷·布拉厄的协议做仲裁。27 位牺牲者的头颅用钉子钉挂在查理桥上，一直挂了 10 年，直到 1631

年瑞典军队攻入布拉格——布拉厄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心脏可以因此而涌荡自豪吧——瑞典人才把他们移到提尼教堂埋葬了。里佩利诺在《神奇的布拉格》一书中，描述那个可怕的日子，说它是这个城市几个世纪的悲惨象征，他对执行官米迪拉尤为愤怒，诅咒他当下地狱："让火吞了他，让火吞了他!"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开普勒在惨遭战乱的南欧四处奔走，他先向符腾堡公爵求助，但因宗教立场问题遭到拒绝，随后，较为成功地从波希米亚将军、费德兰和梅科伦堡公爵、萨根王子阿尔伯特·沃雷斯登处获得支持。在抵抗由丹麦克里斯丁四世领导的北部德意志人的入侵战争时，此人曾取得赫赫战功——第谷在地下一定会感觉不太痛快——还是这个人，对鲁道夫皇帝痴迷的占星术也深信不疑。1628 年，沃雷斯登用种种条件诱惑开普勒到萨根来，承诺为他提供一套房子和一年 1000 弗罗林的薪水，帮他出版著作，以此酬谢他接受做将军的占星家的职位。能出版著作真是再好不过了，甚至在和平时期出书都是极为困难的事。开普勒有一个可爱的小东西，他最后决定把它交付出版，这就是《幻游》，世界上第一本科学虚构小说，28 页纸写的是一次月球幻游记。在小说中，叙述者参观尤兰尼堡，学习丹麦语，目的是与第谷及其助手们对话，游历月球结束

后，他描述了从月球上观看地球和其他行星的样子。

“幻游”是一个随意取的预言性的题目。1630年10月，该书正在印制中，开普勒开始进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短途旅行。从萨根出发到南部的林茨，他走了450公里——中途肯定会在布拉格停留，他徒劳地去催要林茨拖欠他的工资款。从林茨启程，他旅行了差不多同样的距离到北部的莱比锡参加该市举办的秋季图书博览会，想卖掉他的东西。他带了将近150本自己的书，包括6册《鲁道夫星表》，尽管泰纳格试图接管此书的编辑工作，但还是在1624年由开普勒最终完成了它。正像后世的科学研究者所证明的那样，它的精确与完整令人惊叹，开普勒把这归功于第谷·布拉厄，是他先做到精确和完整的。博览会结束时，开普勒又赶了300公里路到南部的雷根斯堡，在此召开的国会正在讨论腓特烈皇帝的儿子另一个费迪南的继位问题，这位费迪南曾阴谋免除了开普勒的赞助人沃雷斯登的皇家军队的指挥权。开普勒希望皇帝能开恩，把拖欠的皇家数学教师的工资付给他，当时，他仍然担任这一职务，尽管它已不值一提。11月2日，他骑着一匹瘦弱的小马，到达雷根斯堡，住在老朋友席莱伯朗兰·比利的家中。还有一个多月，他就该过60岁生日了，他已经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这个可爱、古怪而奇特的天才人物这样写自

己，从中可以读出一丝幽默和自嘲：

我曾观测天外之天，
如今要测度大地的暗中之暗；
我的思想游荡在上，
我的身体栖息在此。[1]

① 开普勒于1630年11月15日在雷根斯堡去世。——译注

# 五　快照

我在心里把这座城市拟人化了。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仲夏，布拉格在热雾的弥漫中喘个不停，似乎经历了几十年可怕的日子后存活下来，正处在疲惫的恢复期。天鹅绒革命后，我初访布拉格——这种新闻记者的表达方式，我还从未听到哪位布拉格人用过，它可能会惹起不满——我不得不四处寻找那些已然改变了的标记。我住在孔雀大街一所舒适的小宾馆，在玛拉·斯拉那区的查理桥附近。夜里，从房间敞开的窗子望出去，越过树梢，一眼就可以看到坐落在小山上接近城堡的沃加公园，灯火通明。我关掉桌头灯，以便让远处的灯光

充分发挥亮度。灯火通明是1989年改革的结果吧。有些人会认为这种炫耀是对城市电力资源的无耻浪费，是西方腐朽堕落的典型特征，也许他们是对的。站在窗边，看着灰�茫的夜幕，我深受震动，远方的大城堡可真像一座城堡啊，阔大坚实的城墙密密麻麻地排满一行行小窗户，它没有望塔，也没有圣维特大教堂那样纤细的塔尖，仿佛女巫的长指甲，直刺云霄，一副歇斯底里的架式。我们无法确知现实的本相，从来如此。现在的总统是哈维尔。就像卡夫卡笔下的K一样，他突然被满面含笑的卡拉姆迎进城堡，并被告知，由于某种确定的原因，他将不再做一个地位卑微的调查员，而要做某地区的领导人了。作为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崇拜者，我试图描绘出这样一幅戏剧场景，哈维尔穿着一套整洁的蓝色套装，坐在鲁道夫宫殿的桌子边，看着面前的一堆文件。他对自己升至权力高位这件事充满强烈的荒诞感。在发表就职演讲之后，在耶路撒冷的一次简短的发言中，他近乎炫耀地直言自己的不适——感觉自己像个冒名顶替的人。

如果在就任总统期间，我被传唤并率先站在审判台上、站在那些面目模糊的审判员面前，或者直接被带到某个采石场去砸石头，我一点儿都不感觉惊讶；如果我突然听到起

床号，从监狱的牢房中醒来，然后昏头昏脑地告诉狱友自己在过去6个月里发生的一切，我也不会感觉惊讶。我是如此无能，应有更合适的人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又是如此清醒，我强烈地怀疑，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如果他真是这么理解的，无疑，那些面目模糊无名无姓的当局也会以一种刻薄机警的方式派出两个精疲力竭的演员去实施逮捕，甚至也可能穿着长袍、戴着不可折叠的高帽子。

午夜时分，通明的灯火一下子全熄了，因为事先并无任何声响，我感觉十分突然。眼前的黑暗异常浓重，灯火熄灭的一瞬间总应该伴随着阵阵钟鸣或者隆隆雷声吧，或者，哪怕是一只巨型灯泡发出的夸张的嘶嘶声呢。我在黑暗中怅然地摸回床，感觉好像头上蒙了一块床单。当眼睛习惯了黑暗的时候，我发现城堡有一扇窗子，只有一扇窗子，仍然亮着灯。那儿一定有人还在工作。我从方才对哈维尔的联想继续下去，想起贝克特写的一段话："人类微小的亮光……"我深感安慰，便闭上了眼睛。我们的一部分本性常常像孩子一样。

我到布拉格参加一个文学节，顺路去捷克中南部的布

拉迪斯拉法市做一个学术演讲。我的老朋友作家兹德涅克和他的女儿金德拉开着他的崭新的绿色轿车——他坚持认为那是蓝色的——到机场接我，他现在住在女儿家。兹德涅克七十多岁，喜欢开车，非常喜欢自己的那辆小轿车，他那种傻里傻气、欢喜快活的样子令他十分可爱。坐在驾驶座上，他表情严肃，双手紧握方向盘，脑袋向前伸得太远了，脑门几乎要碰上挡风玻璃。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愉快地行驶在郊外，在欧洲，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郊外风光。我向他打听车的价钱，他耸耸肩，说车价一直在涨，别的东西也在涨。尽管金德拉在哈维尔的办公室有一份重要的工作，但他和金德拉也只能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我告诉他自己夜里对大城堡通明的灯火突然熄灭产生的不安，随后看到一只孤零零的窗子里面一直亮着灯。他大笑，说，那一定是金德拉的办公室，她总是工作到很晚。这种巧合像布拉格小小的古老传说一样令我大为震动也颇受吸引。金德拉的窗子突然成了阿基米德的那只杠杆，足以将黑色的夜幕撑起那么一两寸。

我前不久从孔雀大街换了一家旅馆，在一条狭窄的山坡街道上，叫卢兹科霍学院大街。[1]前门的接待台是一个小隔间，后面有一只高高的柜台，那个漂亮的金发

① 卢兹科霍学院大街的名字取自于16世纪一所专门为东部卢兹科地区提供义务教育而设立的学院，该地使用自己的斯拉夫语言，如今学院已经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大街命名的原因了吧。——原注

碧眼的女经理向我问候，把我当做德国人。兹德涅克坚持要亲自帮我把手提箱从车里拿出来，他用捷克语和她说了几句，她立刻改用英语和我交谈。我再一次因为自己不懂别的语言而深感羞愧。兹德涅克告辞了，说他当晚会来接我，同金德拉我们三人一起吃晚饭。那个令我心生爱慕的女经理带我登上狭窄的楼梯。墙上有狩猎的印记……突然之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回忆着那些印记，想起我曾在90年代末创作的一部小说中写过一间旅馆，以孔雀大街的那间旅馆为原型，不过那间旅馆不是在布拉格而是在波尔图·维纳尔，是意大利利古里亚区的一个海滨小村子，我的小说的一个角色跑到那儿去自杀了。小说是种奇特古怪而且欲壑难填的东西，无论多么独特的人物与地方，到了小说里都变得稀松平常。

作家节的开幕式在老城广场一家直接对着有天文钟①

①钟楼于1410年由卡旦城的米科拉斯建造，1490年由一位名为汉斯的钟表巧匠重建，这份工作要求如此高超，市政要员害怕这位匠人在别的地方再做出同样的东西，他们竟然把这位不幸的手艺人的眼睛弄瞎了。直到今天，自鸣钟的机械装置仍然正常运转，这是扬·塔伯斯基的手艺，自1552年起，他用了20年的时间来完善它。当自鸣钟打点报时之际，一个代表死神的假人就会用右手拉动绳子，左手抬起并翻转肩上的沙漏，随后，表盘上面的两扇门吱吱呀呀地打开，走出一行12人，由圣彼得领头，12使徒绕行一周，待钟门关上之后，一只公鸡开始啼叫，于是钟声齐鸣。这只钟不仅报时还能显示太阳和月亮的位置，这是按照地球为宇宙中心，日月围绕地球旋转时设计的——开普勒当初在钟楼下经过时一定偷偷地笑过。在钟楼的下方还有一个更为精致的刻度盘，是1846年约瑟夫·曼尼斯绘制的，标出十二宫并画出月份与年度的标记。钟楼是一个深受游客喜爱的地方，而这还只是一种保守的说法。——原注

的市政厅的酒店召开，房间不大且极热，里面浓烟弥漫。钟楼引人注目的不仅有色彩鲜明的绘图刻度盘，还有装饰用的真人大小的人像，代表着死亡、空虚、贪婪、天使长和摇头晃脑的土耳其人。布拉格人一向偏爱各种塑像、小雕像和自动装置：布拉格著名的娃娃像杰祖拉特果——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一个珍贵的镀金小塑像，各种奇异的圣母像——有一个竟然是黑色的，卡雷尔·恰佩克的机器人[①]和怪异的格来姆，令人惊恐的异形，大师扬·斯瓦克马杰动画片中的人物……许多木偶剧院异常火爆——唉，如今只有受了蒙蔽的游客才会进入剧院，当然，这当中最为离奇的莫过于卡夫卡的奥德拉德克，一个星状的生物，像一卷线轴那样自行滚动——是它自己还是他自己？——游动于无名叙述者的房间，在"家中父亲的问题"片段中发出一阵大笑，听起来"好像落叶的沙沙声"。当然，里佩利诺在鉴赏稀奇古怪的东西方面是个行家，他对布拉格人沉迷于非人方面的行为颇感兴趣。他特别用杰祖拉特果为

---

① 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1890~1938）捷克作家，1909年进入查理大学攻读哲学，1915年获博士学位，后任新闻记者并从事文学活动。1925年起任国际笔会捷克分会中心主席。创作科学幻想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科幻小说《制造绝对存在的工厂》、《原子狂想》等作品，认为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将导致整个人类世界的毁灭。他创造的"机器人"（Robot，由捷克文Robota"劳役"、"苦工"演变而来）一词，已被各国语言所接受并成为世界性名词。他的不少作品曾在国内获奖，并在国际文坛享有盛誉。——译注

例，这个奇异怪诞的小精灵长得圆滚滚的，戴着镶金嵌银的王冠，“一个蜡制玩偶，穿着金光耀眼的丝绸锦缎，质料高级，所费不菲，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巴洛克风格的卡默利特教堂里展览它的各季服装”，这是1628年鲁道夫执政时期，由洛伯科威兹的波吕克塞娜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里佩利诺写道：“如果说大家伙格来姆……带来了混乱和灾难，那么，杰祖拉特果——一只精致的穿衣服的玩偶、一个构造精巧的模型，则是一剂有益健康的止痛药膏，让灰心失望的情绪被重新激发出活力，成了对身心皆有帮助的医生。”里佩利诺式的推论虽然不合逻辑但例证却异常出色：“黑暗的教堂所在之处以及卡梅拉派的那些如今成了木乃伊的保护者们都躺在造价高昂的敞口棺材里，教堂的主要资助者是生性残暴的西班牙将军巴尔塔扎尔·德·马拉达斯（1895年他在弥留之际的剧痛中，让人按照女雕刻家弗拉维娅·桑科尼雕刻的尤利斯·泽叶尔传奇中的“艾努尔提斯”来制作杰祖拉特果），不过这件事并没多少意义。”

尽管不太情愿，现在我不得不把话题从那些雕刻的小玩艺转到布拉格作家节的事务上来。

尽管组织者竭尽全力，但开幕式却热闹得一塌糊涂。人们在烟雾弥漫得令人窒息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但观众如此，与会的作家们也这样，现场气氛立时变得

不安和暧昧起来。

我发现自己被安排在讨论席上时顿感惊慌。题目是关于东西方文学影响什么的——但我对此却从未有任何独到的发现。我没有笔记，也没做任何准备，因为与会的发言者大多用的是捷克语，我的发言时间比较长，大部分时间里我在语言的混乱中挣扎，与此同时，我的耳机只能提供音量大小的服务。一位留着一脸浓密的黑胡须仿佛土匪的作家，不耐烦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对那个荒唐的题目进行了充分详尽的论述，真的，我可以把他的说法当做此次盛会的核心解释。他谈到过去的地下出版物，我蛮有兴趣地听到，它们大部分是由乔治·索洛斯提供资金的，随后，讨论陷入了古怪的沉默。绝望中，我请座谈小组中一位匈牙利作家代表参与评论。我俩从前有过短暂接触，不算陌生，但他似乎忘记曾经见过我，我们是在布达佩斯还是维也纳见过面？——我或多或少地打扰了他。他谈起一本小说，作品名和作家名我都没听说过，然后，他满怀期待温和地望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就在这时，不断抽烟的那位叹了口气，站起身，慢慢地走了出去，我猜他是去上厕所，可他却再没回来。我近乎失措，试图“将讨论话题抛向脑后”，讨论席上无言的沉默慢吞吞地持续了一两分钟，观众纷纷将目光投向我，似乎眼神里强压着不满。最后，有人

提了一个问题，关于过去时代的新闻检查制度，可这只引起了更多的脚步声和清嗓子的声音。面对尴尬的沉默，我小心翼翼地转向评论当前捷克文学的强大阵容，我提到克里玛、赫拉巴尔、米歇尔·艾瓦兹，似乎想说明，这些作家不但在独裁政党的管辖下生存下来，而且还取得了文学上的成就。然后，随着一个胖大男人慢慢地落下，无能为力地轰然跌倒在陡峭的楼梯台阶上，我听见我的声音，仿佛有自己的意志一样，问道，格尔·维达评论说好莱坞永远不会伤害任何值得援助的人，但却可能为适应苏维埃和捷克作家的需要而改动作品，这是否可能。此后的谈话使我陷入到一种既热烈又暧昧同时令我畏怯的窘境中。最后，时间到了，我的苦行总算结束了，我拿掉耳机，耳朵嗡嗡乱响，满面含愧地遁入广场，在那儿，土耳其人正冲着我摇脑袋，伤心地责备我，死神抬起沙漏，拉动绳子，自鸣钟轰然敲响，这就是死亡的丧钟，宣告我作为捷克文学裁判员职业的终结。

下午，为了给自己的羞愧寻找安慰剂，我便买票参观古犹太人的公墓，这是每位来布拉格朝圣的旅游者必选之地。我上次参观是在80年代的一个冬天，那时公墓覆了一层白雪，景色荒凉。在闷热的下午，这里展现的却是但丁式的场景，游客们聚集在一处，沿着专用的人行道慢吞吞地前行，两边是芜杂凌乱、生满苔藓的墓

碑，约有12000至20000不等，不同旅游手册有不同说法，随你自行选择确认。最古老的一块石碑是1439年为犹太拉比（教师）阿维多·卡尔或者卡拉或者卡洛立的；最晚的一块上面写的日期是1787年5月17日，是莫西·贝克之墓。葬于此处的还有皇帝鲁道夫时代的两位犹太血统的重要人物，一个是当时布拉格最有钱的人莫德查·梅斯尔[①]，一个是犹太拉比尤丹·洛乌·本·贝扎尔（1520？~1609），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犹太学者之一，从1597年任布拉格的拉比领袖直到去世。洛乌拉比是许多传说的主题，尤其与假人格来姆的被造有关，传说格来姆是洛乌用地上的土块塑造成形的人，就像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了亚当。据说，在1580年有一个云游四方的修士泰丢斯，他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因宣传迷信仪式和流血牺牲对抗布拉格的犹太人而受到谴责。洛乌拉比恳求耶和华神的帮助，在梦中受到指引创造了格来姆，是一个专门对抗基督教乌合之众的信仰保护者。洛乌呼召自己的女婿以撒·本·西门和门徒利未人雅各·本·查姆·萨松，让他们分别代表元素火与水，他自己则代表空气，当然，格来姆代

① 梅斯尔是一个大慈善家，建造了三座犹太会堂——其中的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多所公共浴室、一家旅馆和犹太人的市政厅，俯瞰公墓，可以看到一座时针与分针反向移动的希伯来钟，这是阿波利奈尔的幻觉诗作《地域》中不容忽略的一个细节。——原注

表着决定性的元素——土。三个人履行完复杂的宗教净化仪式后，就在午夜时分来到伏尔塔瓦河岸，用河里的黏土揉搓成一个人形。大拉比洛乌教导祭司以撒绕格来姆走了7圈，从右边开始，反复咏唱《诗篇》，背诵神奇的灵语，一边走一边写各种组合文字，此后，洛乌又命利未人雅各从左边开始绕人形也走了7圈，然后，拉比洛乌自己绕格来姆走了几圈，于是三种元素的能量开始燃烧发亮，产生生命力。最终，拉比把一块写着无法言传的上帝名字的石片插到格来姆的舌头底下，这个造物便抬起脚，这是一个随时等候主人命令的活的小矮人。

在希伯来语中，“格来姆”①意思是初期、胚胎或者选一个更通俗的词汇，就是“本质”、“实体”，它出现在《圣经·诗篇》第139首②：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① 身为教授的里佩利诺有不少没多大用处的知识，他告诉我们，“在犹太法典中，不孕的妇女和需要打磨擦亮的罐子都被称为格来姆”。——原注

② 引自中英文对照新标准版《圣经》。——译注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拉比洛乌是一位伟大的圣经学者，同时亦精通犹太神秘哲学，这种神秘哲学源自于13世纪西班牙犹太人创作的幻想性著作，鲁道夫皇帝执政时期曾得到广泛传播。犹太神秘学说在犹太人聚居区外得到更好的流传，它对新柏拉图主义有强烈的影响，甚至影响了约翰·迪的神秘思想。不用说，鲁道夫皇帝对此当然十分感兴趣，于1592年传令拉比洛乌到荷拉德卡尼，并与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单独密谈。①真想把这场谈话录下来呀。

犹太神秘哲学据说可能是一种地下犹太教，是关于创造神话和犹太人的弥赛亚，采用数字命理学和复杂的按字母顺序组合的占卜法，被叫作“格玛特利亚”。格来姆的创造传说讲述了神名组合排列的复杂仪式，上帝的名字由四个极为重要的字母组合而成。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格来姆故事是犹太神秘的创造神话的世俗化翻版。奇怪的是，再没有哪种说法能像里佩利诺的评价那么武断了，他坚持说布拉格的格来姆传说“顶多可以追溯至浪漫主义时期”，认为它第一次出现在

① 鲁道夫对犹太人异常宽容，他的贴身顾问许多都是犹太人，人们知道他常向当时的大富翁莫德查·梅斯尔求教皇家财政管理事宜，与之接触更有可能是为了财政贷款。——原注

一个五卷本的长篇民间故事和轶闻集中，标题“辛波利姆”是德语而不是意第绪语（犹太语）。19世纪中叶由沃尔夫·帕斯莱斯出版。里佩利诺指出，大卫·甘斯编写的1592年布拉格的犹太人编年史中没提到格来姆，但是这位大卫后裔，在1718年出版的拉比洛乌的传记中也未提到过格来姆。

然而，里佩利诺谈的还只是书面的传说故事。格来姆的历史像布拉格的犹太聚居区一样古老。早在公元10世纪就有犹太人来此居住，事实上，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就有犹太人来到此地，那时犹太人的口头传说中已经有格来姆的故事了。1179年，根据拉特兰宫第三次会议，罗马教皇指令应该在犹太人居地建墙，以便和市区南部的天主教徒分开居住。尽管犹太人处处遭排斥、受诅咒，但犹太区却繁荣昌盛，范围从老城广场的北部直到伏尔塔瓦河两岸。1781年，皇帝约瑟夫二世废除了犹太人只能住在犹太区的法令，不过，皇帝的目的并不是要让犹太人得自由，而是企图让他们被天主教徒完全同化，藉此破坏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受到禁止，犹太人被迫使用德语起名字。到19世纪初，犹太区只有10%的人口属于犹太人，1850年，该地变成了市政区，名为“约瑟夫”。不过，就像《旅游手册》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改宗了的

皇帝"也许无法完全理解这种荣誉，如今，这个地区依然是千疮百孔的贫民窟……"。19世纪90年代，尽管有些精美的建筑，包括老城和新城的犹太会堂以及梅斯尔的金碧辉煌的市政厅还都空着，尽管建筑师和艺术家纷纷抗议，在现今的约瑟夫地区，大部分破房子和胡同里的大杂院还是被清除扫灭了，为多少有些卑鄙的大规模改建城市林阴大道让路。令人惊奇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被侵略之后，纳粹也决定保存剩余的古迹，他们打算在迅速灭绝犹太种族后，把这些古迹变成犹太人的博物馆，表达一种讽刺性的纪念。在纳粹占领期间，有将近8万犹太人被屠杀，今天，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东正教的犹太人小社区被保留了下来。如果没有像我的朋友兹德涅克这样善良的人和地下抵抗组织的努力，会有更多的犹太人被屠杀。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政府因兹德涅克在战争期间为布拉格的犹太人所做的工作为其授勋。[①]

格来姆，这个犹太籍翻版的弗兰肯斯坦式怪物，有着善恶二重性。为了阻挠反犹分子修士泰丢斯，他在犹太区的大街小巷来回逡巡，警惕地守护着穷人的家，不让心怀恶意的外邦人潜入室内，把天主教的儿童藏进犹

① 详细报道兹德涅克为犹太人所做的一切没有多少意义，他只会微微笑笑，摇摇头，摆摆手拒绝。真正的勇敢不需要大肆宣扬。——原注

太人的房子。一天晚上，他惊奇地发现，屠夫哈维里科把一个婴儿藏在一只宰杀好的猪的肚子里，扛进莫德查·梅斯尔家，原来屠夫欠他的钱，便想在仪式上诬告这个有钱人是个凶手。一个周五晚上，假人格来姆不断地乱跳乱闹，拉比洛乌本应对他进行一次安息日前夜的指导，但拉比忘了这事。假人在厌倦无聊之际变得狂躁不安，把目之所及的一切都踩个稀烂，直到把拉比找来，才让这个怪物安静下来。最后，格来姆就像一只拒绝被驯服的宠物一样，不得不被除掉。对于传说中的创造者拉比洛乌来说，1593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年初的一天夜里，拉比命令格来姆不得再到房间的床上睡觉，而要到老城新犹太会堂的顶楼去过夜。后半夜两点，拉比洛乌带着随从以撒和雅各，爬到格来姆睡觉的顶楼上。拉比先从这个造物的舌头底下拿走石片，然后，三个人表演了先前曾带给格来姆生命的那种仪式，但这次正相反，早晨，可怜的格来姆变成了一堆土块。

拉比自己的结局相比而言更具诗意：在他醉心于孙女送给他的玫瑰花的香味时，他遇到了隐藏在花瓣中的死神。当然，这比他的波兰同行的结局要好得多。著名的奇迹制造者塞尔姆的拉比艾利亚，也叫以色列的巴·闪·多夫，也曾创造了自己的格来姆。当他的造物到了生命结束之时，拉比艾利亚准备采取涂掉这个造物前额

上雕刻的四个字母“emet”的第一个字母来毁灭他，只留下了后三个字母“met”，其意为“死”。不过，拉比错误地命令格来姆自己来涂掉那个字母，命令一出口，那个造物便立刻化成了一座泥像，在拉比艾利亚眼前碎裂，飞迸的泥块把他砸死了。

今天，在约瑟夫几乎没有犹太人生活的印迹，反而因这种缺失而平添了一份沉重和空虚，尽管诗人奈兹瓦尔声称拉比洛乌的石片仍在这儿，“在所有东西的舌头下面，甚至在人行道下面，布拉格铺砌的所有道路用的都是同一块石片”，但那个古老的世界如今只在想象中存在。里佩利诺喜欢黄昏时分在拥挤的街道上行走，喜欢边走边幻想：“我感觉自己很久以前就住在犹太区，我看见自己像犹太人一样，手里拿着一把黄色的香柏枝，点燃了有八个枝叉的灯台上的蜡烛，或者像许多犹太会堂里的守灯人一样，在肮脏、阴森、幽黑的窄巷中穿行。”

兹德涅克坚持开车送我到中南部的布拉迪斯拉法市，我到那儿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早晨，他安排我们坐汽车去，午饭后，他再开车回布拉格，来回600公里。我为他表现出的善意深为感动，金德拉却大笑，说她父亲并不是为了表达善意，而只是找到了一个长途驾驶的

好机会。夏日的清晨温柔宁静，中午阳光炎热，灼烤着兹德涅克最喜爱的绿色或者说是蓝色的汽车顶棚。在十字路口，我们停下来，兹德涅克指着田野远处，说那是他家的农庄，1948 年从他父亲手中被充公，1989 年之后重新归还给他；兹德涅克摇摇头，对自己竟然能活着看到这些奇迹有些不解。①在斯洛伐克的边界处有一个护照检查站。我问兹德涅克他对捷克斯洛伐克被分成两个国家怎么看，他耸耸肩，说捷克共和国属于比较富裕的一半，但斯洛伐克想自治，那就自治吧。后来，在布拉迪斯拉法市，我又听到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兹德涅克用一种高亢的声调和冷嘲的语气称呼心机颇深的捷克总理瓦斯拉夫·克劳斯为“克劳斯先生”，说他施巧计使斯洛伐克陷入一种糟糕的情形中，因为他想瞄准他们，找出他们的经济问题。我们开车驶过斯洛伐克的乡村，许多农民全家人站在田地里堆干草，自小时起我就再没见过真的干草堆。那种景色很像米勒的油画，或者出自一位不太夸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之手。

① “1989 年以后，所有在革命时期被政府充公的财产（工厂、旅馆、出租公寓、土地、森林）都重新回到前主人手中（更准确的说法是，回到他们的儿孙手中）；这种做法叫做偿还：只要某人能够拿出有效的法律证明文件，在他提出声明期间经过讨论，一年后就会得到偿还。法律判决程度的简单化会纵容一批骗子，不过，也避免了遗产争夺、诉讼、上诉和其他各样问题，在一个令人吃惊的短时期内，这种做法滋生出一个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他们是富裕的企业家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高官们。”（引自米兰·昆德拉的《无知》）——原注

布拉迪斯拉法不是布拉格。市中心的老城区美丽迷人，但至少在我游览此地的那个时候，城市周边的建筑却毫无章法和规划，乱建一气。午饭后，我们开车进入乡村，到一个19世纪的仿哥特式城堡，入口处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在我面前无声地打开，沉默得令人惊悚。共产党执政时期，这里曾是一些受政府偏爱的作家——或者说是御用文人的疗养地。我的休息间在三楼，房间很宽敞，到处点缀着黑漆的家具。一扇高窗似乎正用忧郁的眼神凝望着远处热气氤氲的森林和鸭子浮游的池塘。我一夜过得很不自在，仿佛木板一样直挺挺地躺在那张黑亮的床上。早晨，会议组织者之一、我的朋友艾格快活地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我说不好，他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他对此并不惊讶，在这个黑屋子里曾住过的客人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一位狂热的作家，他是最后一批享受前89时代的定居者[①]，从窗户跳了下去，摔死在池塘边。我浑身颤抖着下楼到会议室宣读那篇关于辛格和阿兰岛的文章，讲完了，一位加拿大的学者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说我采用的是狂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视角。真是倒霉得很，刚过去的一宿已经被勃列日涅夫搅乱了，早晨10点又被人攻击了一回。

① eighty-niner：（1889年开始）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获得定居的人。——译注

傍晚，回到布拉迪斯拉法，我受邀参加一个晚会，在那儿度过了惬意的半小时，和一位作家兼翻译家聊天，我叫他H先生，他刚刚将一部爱尔兰现代主义经典作品译成捷克语出版，他用了20年时间完成了这件有意思的工作。他抱怨说，在“改革”前，也就是在1989年以前，政府限制出版业，只能翻译西方文学中最经典最有教益作用的作品，但今天，允许各种各样的美国垃圾书进入国内。我后来向艾格提到这次谈话，他又嘿嘿地笑起来——我发现艾格的笑有许多种变声——他说，H先生对以前的出版政策当然了如指掌，因为他曾经是官方审查人员。

会议结束后，兹德涅克又从布拉格来接我。我向他说起在晚会上遇到的另一个人，留着乌黑的短发，戴着厚厚的眼镜，穿一套古怪的银色西装，看着像是锡纸做的，那种派头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大块头菲尔来，他们都是掌握内幕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用一种谈论尽人皆知的秘密事项的神情告诉我说，在1989年革命前的最后几个月，仍关在监狱里的哈维尔与捷克情报部门共谋，一旦胡萨克政权倒台就接任总统，看起来所有人都将知道这件事了。然而，兹德涅克却坚定地说——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我没坚持，但我私下里想，说不定它是真的，我对总统的事知道得可不多。即便你是一个荒诞派

剧作家，政治就是政治。我们在布拉格的郊外行进，驶入浓烟滚滚的工业区时，兹德涅克指着道路拐弯处的某个地点说，那儿是盖世太保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 1942 年被捷克游击队刺杀身亡的地方。作为报复，纳粹将一个煤矿利迪泽村夷为平地，它在布拉格西北部，距布拉格 20 公里，当时枪杀了村子里所有的男人共计 184 人，其中年纪最大的 84 岁，最小的只有 14 岁。随后的几天，德国军队将村里剩下的一切都埋到土里，利迪泽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1947 年，在村子原地竖起一块纪念碑。在捷克共和国的战争纪念碑中，这是参观得最多的一块碑，今天它依然矗立如初。

作家节即将结束时，英国大使邀请我参加一个晚会。会议是在一个漂亮的房间——不是大使馆而是某人的家中举行的，它位于大城堡后面一条绿荫浓密的街道上，游客通常不会到达此处，许多布拉格人认为这才是他们的城市真正的中心。我打算逃会——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小说让我在生出偏见之时也对这种场合产生了抵触。我的朋友、作家、德意志文学专家克劳狄奥·马格利斯也参加了作家节，他说我一定要待在那儿，说是可以“见到戈尔德施蒂克”。我不知道这位戈尔德施蒂克是谁，也没兴趣在周末再认识一位新人——这一周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很不情愿地同各种口若悬河的陌生人

打交道。但男主人和女主人——我姑且称他们为史密斯-琼斯夫妇——气度不凡，不像一般的英国参赞那样滑稽和傲慢，而且在选酒方面颇有眼力。晚会人不多，12对客人分坐在椅子和沙发上，这显然是史密斯-琼斯夫妇的客厅，我在我的椅子下面发现了一个孩子的短袜，这多少表明这将是一场真正的闲谈。我正在回想自己在斯洛伐克的历险、黑屋子以及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子，她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她对我的露骨而夸张的莞尔一笑，相当可爱，她的门牙被口红沾出几个有趣的星点，这时，克劳狄奥用胳臂挽住我，向前推着我说："来来来，你一定要见见他，快来！"

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教授（他还是一位博士）是一位英俊的男人，有一张方方正正的大脸，一双明亮的海蓝色眼睛，一双方方正正的大手。他80岁出头，看着却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坐在屋子中间的沙发里，一双大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目光沉静地凝视着某处，头微微倾斜，有那么一刻，我疑心他可能是个盲人。但马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情形，我从未见过哪个人的眼神能像他那么锐利。他身上有一种气质是语言难以描述的。我发现，他有一种本领能让他所在的地方变得异常严整，与之相比，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像穿着太空服的宇航员，臃肿得不合体。有人把我介绍给他，戈尔

德施蒂克邀请我坐到他旁边，他说自己是一个爱尔兰文学的崇拜者。他指着我们对面墙上的一幅画，说他正在研究它——这可以解释他何以会歪着头凝视了。那是一幅平淡的风景，一片低地，一道彩虹穿过雾气缭绕的绿色旷野。他说，他很惊讶，想知道这是不是英国风光，因为它让他想起了苏塞克斯郡。我看着他，把他的微笑想象成传说中蛇怪[①]的笑容，我只能藉此来描述他：他的眼睛精亮而快活，鼻孔喷着热气，嘴唇紧闭，嘴角下垂。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苏塞克斯大学教学。1968年8月苏联入侵之前，他逃离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在英国定居。“从此，”他顽皮地自嘲道，“我能说一口标准无比的英语了。”

在随后的大约一个小时里，戈尔德施蒂克给我讲了他的生平，此后，我又从其他渠道为他的叙述找到了一些补充的细节。令我震惊的是，在某些方面，这场叙述的意义之重大及内容之可怖正是布拉格在20世纪后半期的历程。戈尔德施蒂克1913年出生在斯洛伐克的伯德贝尔村，父亲是一个犹太木材商。1931年，他到布拉格学习德国和法国文学。大学时代，他是共产主义学生会主席，1933年加入捷克共产党。1939年前，他一

① basilisk：蛇怪，传说出现在非洲沙漠中，其呼气和眼神均足以令人毙命。——译注

直在一所中学教书，后来携妻子逃离德国占领区，经波兰和瑞典逃到英国，家里的其他成员后来都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戈尔德施蒂克在伦敦主持杂志《青年捷克斯洛伐克》。后来，1943 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驻伦敦的流亡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4 年赴巴黎做捷克大使馆的文化参事。战后，他回到布拉格，成为外交部的一位文职公务员，1947 至 1949 年间在伦敦的大使馆做参事。随后，1948 年共产党执政，他的外交事业曾有过短暂的辉煌。1950 年他被派往以色列做大使，1951 年任瑞典大使；还是在 1951 年，斯大林命令从共产党内部清除犹太人。戈尔德施蒂克和许多人一起在 1951 年 12 月遭到逮捕，被秘密警察带到司令部，他在那儿被单独关起来，不断地受到提审询问。

他对我说："我头一次去机场附近的警察司令部，我问他们为什么逮捕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个审问我的负责人冲我一笑——那可真是讽刺的微笑！——他说，这不是你要问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要问你的问题。"他重述往事，哈哈大笑。然后，他侧过头来看着我，抬起一只手，大笑着说："请……请不要和我提卡夫卡。"审讯持续了一轮又一轮，三组问题轮流问了他 8 个小时。他说，幸运的是，他在中学做过一段时间数学教师，可以通过在头脑中演算数学方程式保持清醒。

我问，他们究竟想从他那儿了解什么呢？他们想让他坦白些什么呢？“我是一个敌方的情报人员，企图阴谋破坏社会政权。他们为我预备了一次公审，目的是让我当庭坦白，好让它听起来更像真的，我必须制造反对自己的证据。你明白吗？”短暂的沉默过后，他说了一句我不敢问的话：“是的，当然，我得‘坦白’。除此别无出路。”

他被捕一年半后举行了公审。一切不过都是预演，他说：“公审在剧院举行，事先的准备程序既荒唐可笑又小心之极。我拿着一个本子，里面按顺序写好了法官的提问和我的回答，如果我不照着本子回答，在某个地方偏离，审讯就会停止，我会被秘密警察带回去，所有的程序重新开始。”他的辩护律师给了他一条建议——不要在法官席前起誓，然后走进法庭，打开文件，为他所受的“最高刑罚”即死刑判决进行辩护。辩护律师说他应当事人的请求，认为这“无疑是罪有应得”，不过，因为他并不是“阴谋”集团的主谋，法庭不妨宽大为怀。审判员们果然体现了他们的宽大体恤，他们夜里对判决一事重新考虑。戈尔德施蒂克说：“审讯从早晨九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然后，又从下午四点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九点，我不得不忍耐接受的只是处以死刑和立即执行之间的不同可能性。”他笑了笑，又说：“约翰逊

博士说得对，早晨将被绞死这件事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

他被免除死刑，代之以终生监禁，送到铀矿，在那儿，他赤手挖掘放射性金属，一干就是两年半。他说：“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多年以前，我为什么没因癌症死掉。”有一段时期，甚至在劳改结束后，他只能四肢着地爬来爬去。在那些时候，他不知道斯大林已经于1953年初去世，1955年，莫斯科召开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开始释放古拉格群岛的犯人。捷克当局观察着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向，也开始谨慎地执行自己的释放计划。1955年圣诞节前，还是那个差点儿把戈尔德施蒂克处以死刑后来改判监禁的法庭，决定无罪释放戈尔德施蒂克，立即执行。他说：“监狱主管招呼我到办公室去，他显然有些为难，我记得他不安地翻动着桌子上的那些文件，警告说我被释放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所有的希望马上就破灭了，这些人，这是他们喜欢耍的残酷的小把戏，他们告诉你说你就要获得自由了，却又一拖好几年不放你出去。那个主管继续说，嗯，怎么也得花两三个小时才能让你离开这儿。”戈尔德施蒂克又研究起那幅水彩风景画。他说，仿佛梦语一般，“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打交道的是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不是人的人。他可否想过，在经过几年的审讯和关押后，我怎么会把三个小时当做一段时间，噢，不，他不是一个人，不是我所理解的人”。

被释放后，他在查理大学哲学系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又成了那儿的德国文学教授，最后被任命为系副主任。1963年5月，他在里比利城堡主办了一次传奇式的卡夫卡学术会议，为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卡夫卡的文学地位奠定了基础。许多年里，他不断地忙于学术工作，做过短期的国民大会代表，1968年1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布拉格之春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春天历时很短。戈尔德施蒂克说：“俄国人刚刚侵入布拉格，我和妻子就逃到了维也纳。我接到英国一个记者的电话，他告诉我苏塞克斯大学准备为我提供一份教职。我当然接受了。不过，你知道，我忘了这个记者的名字，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说出我的恩人是谁。”

在布拉格的时光成了这个异乡人的回忆，第二年，戈尔德施蒂克曾回来待了几天，在此期间，他宣誓就任捷克国民大会委员。他想重回布拉格，但胡萨克政府发表声明要揭露一群阴谋的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德施蒂克是其中的一个。1974年，他回到苏塞克斯，因缺席，他的捷克共产党委员职位被取消。他说自己在英国过得

很舒心，或者至少没什么不舒心的。最终，1989年，捷克历史进入了又一个20年的转折期，胡萨克倒台，哈维尔当政。戈尔德施蒂克立刻和新的捷克政府联系，说自己希望能回布拉格生活。他得到了一个语含多义的回复：回来当然可以，但需要再过一段时间……几经提醒，他明白了，在前政府时期，他毕竟曾是一位活跃的共产党员。幸好他的女儿同哈维尔政府外交部长的女儿关系不错，他最终才被允许重回祖国。他说："就这么，总算，回家了。"

我问他如今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嗯，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不会放弃我的信仰。那些掌权的人太糟糕了，简直是坏透了，但这个体制本身没问题。"

我后来一直与戈尔德施蒂克保持联系，几年后，我协助歌德研究会主办一个学术会议，曾邀请他到都柏林来。他写信说他很想来看看，第二年春天动身，不过，他提醒我应该明白，对于他这种年纪的人来说，布拉格的冬天真是"凶险难挡"啊。如其所言，他没能度过那个秋天。2000年10月24日，歌德研究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戈尔德施蒂克教授在前一天去世的消息。我无言以对，就我来说，欧洲尤其是布拉格最本质的那部分，已经随他一起逝去了。

# 尾声：大洪水

据说，伏尔塔瓦（Vltava）是由已失传的凯尔特语言中的两个单词组成的，vlt 意思是旷野，va 意思是水。通常情况下，来布拉格旅游的人未必会认可这个起源的说法。这条辽阔的大河蜿蜒流过市区，最宽处只有 3 百米，它在这里环绕着一座小岛，在那里静静地溢出堤坝，好像一条乡间小河。在布拉格，在那些未受其魅惑的作家中，不只一个人把它当做一种象征，认为沿河而居的人们像它一样地浅显简单。比如，古斯塔夫·梅利克就愠怒地发现，一个外国傻瓜可能以为伏尔塔瓦河像密西西比河一样，可事实上，它“只有 4 毫米深，里面

爬满了水蛭”。不过，T.S.艾略特却在《四个四重奏》里对这条大河有更为正确的理解，他声称：

> 但我认为那条河
> 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大力神，阴沉、撒野、倔强，
> 起初作为开发者，还有些耐性；
> 商业运输时倒肯帮忙，就是不太可靠；
> 那时给造桥人带来极大的麻烦。
> 桥一旦造好了，城里的居民几乎忘记了
> 这位棕色皮肤的神，
> 不过，他仍一如既往，毫不留情，
> 狂暴，破坏，四季更替的脾气不改，
> 提醒人们想要忘却的事情。[1]

当然，许多布拉格人早已忘记了河流在奔涌时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里发过多次洪水，1890年，查理桥的两个桥拱被冲垮，可是，没有哪次像2002年夏天的洪水那样令人惊慌恐惧了。8月8日至9日夜间，一场大暴雨连续下了一周，而后汇涌在波希米亚南部，滔天巨浪开始全速奔向首都，沿途冲毁

---

① 此处译文参考了《T. S. 艾略特诗选·四个四重奏》，张子清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译注

了许多城镇乡村：科拉姆洛、布德鸠文斯、彼舍科、斯特拉格尼斯、斯铁索文斯……布拉格对此未做任何准备。洪水于8月14日开始减弱时，市里的一个区即从前的工业中心、后来的新兴地卡林完全被冲毁了，一半的气象站关闭，剩下没关的预报也失灵。珍贵的古老建筑遭到损坏，有些已经无法补救，游客人数下跌了50%。修整市里被水浸泡的建筑令捷克花费了数十亿资金，没有一个人会问由谁来最终支付这笔款项，这是欧洲的灾难。

洪水过后一个月，我再访布拉格。通常，我避开那些受灾严重的地方，但即便穿行在波姆皮伊或者赫尔古拉纽姆的废墟上，即使这些受灾的城市依然美丽迷人，我仍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没买票擅自入场的观众一样，非常不自在。对此，德·斯坦尔太太真切地表达了游客所处的窘境——“目之所及的让我厌倦，目之难及的令我忧烦”——这种谴责不乏道德意味。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曾在这座城市闲游漫步，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但如今，在遭逢如此灾变之后，我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呢？我应该如何表现才相称呢？

我到达布拉格时正值傍晚的交通高峰期，结果未发生任何交通堵塞事件。市区像威尼斯一样安静，每次来访之初，好像我都会多多少少地听见些什么，唯独这一

次也是第一次，这里如此安静。无论是中欧的情调还是令我神迷心动的建筑物，它们都为这座城市赋予了独特的个性，并或多或少地为其不朽的神秘进行了解释。在电影录制过程中，声音录制员在场景外的录音被称作画外音，背景分场次表现时，需要重新配音，中间会出现一两秒钟的空白无声。在布拉格，我感觉，好像某个人忘记做画外音了，甚至连最响亮的欢呼或抗议的场面以及日常的事务都被推至后景，呈现出一种缺乏深度的沉默。但如今，在这个被水浸泡了的琥珀色的九月，沉默的含义亦有不同。威尼斯说它现在不是水上的威尼斯，而是水下的威尼斯。

你若知道，在几百年里，这个城市曾接二连三地遭到破坏和占领，你就会理解，在那个8月，面对伏尔塔瓦河的惊涛骇浪时布拉格人表现出的震惊和畏怯。这是又一次白山之战，这是又一次突袭，只是，这一回不是由外而来，却是自内而起的。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几乎忘记"了的那个东西突然出现，再一次将他们震醒。第一次的湍流扑涌着穿城而过，一个目击者向我描述说，他看见一只40英尺大小的箱子被冥冥中的一双大手掀翻，在每小时流量6千米的河面上飞转。住在城里的人说开始他们不太相信，后来看到河面一天天地不断上涨，他们才渐渐惊慌起来。一位爱尔兰外交人员告诉

我，每天早晨，她步行到坐落在玛拉·斯塔纳的大使馆办公，俯瞰河水不断地漫上人行道，混浊的河水无情地上涨，有些地方的最高水位已经达到4米。如今还能看到玛拉·斯塔纳的房屋、商店和饭店标记出的最高水位线。

大多数的桥都无法行走了，所有的交通只能依靠电车和出租车，军队和武装警察开始执行戒严令，设置路障。靠河边的交通要道甚至比平时还混乱，一个上下班坐通勤车的人说，坐电车在市里穿行让她想起在加尔各答的公共交通："电车里挤得要命，大家恨不能坐到天花板上去！"我感觉到的不是惊慌、失望或者为了求安全你拥我挤，而是深切的悲哀。在每条街道的拐角处，都有某种气息吹到我的脸上，那是一种精疲力竭的无声叹息，来自于过去的阴影，似乎洪水流过了地下墓地的一个个墓穴，流过城市的地下通道，扰动了深藏在布拉格地下的古老精灵。我感觉自己似乎是要去看望一个从前的恋人，发现她依然美丽，但却对她年老的未来充满忧虑和悲哀。

对于布拉格人来说，这里没有任何浪漫可言。城市无论是声音还是气味，都颇像威尼斯，但水塔散发出的无声、刺鼻的气味却令游客闻而却步。生意都停掉了，那些最大也最贵的宾馆已经关闭，也许会一关好几年；

玛拉·斯塔纳地区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内部，许多珍贵的墙体已经被冲毁；上学的孩子、上班的工人和职员会发现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像一场噩梦。然而，每个住在城里的人，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者，都会做证说，布拉格人展现了他们的可贵精神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就是——谁来付款？由国会议员投票选举的政府提出收取洪水税，通常这让人怀疑是为了提高税金而施的巧计。为了给洪水后重建筹集资金，学生们在温西斯广场卖砖，那是洪水毁坏的建筑残余。这个行动看似令人心痛，却让人心情激奋，布拉格会活下去！布拉格会一直活下去！

# 后记:飘零的印迹

还有一些东西我从未说起过，就是我的情感琐事，在伏尔塔瓦河上的这座城市里，我的激情与感伤交替出现。我想起一个沉闷的傍晚，在查理桥边，一个身材娇小、美丽可人的小女孩偷了我的东西，我尾追不舍，心中激涌着诧异和莫名的羞辱感，追到拐角处，她拉开裙子，只露出一条小小的花短裤，咧着嘴尖声地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嘴里嚼着口香糖，用浓重的捷克喉音让我来搜查她。不远处站着一个小伙子，很可能是她的同伙，正低头看手指甲，显然我的钱包早已装进他的裤袋里了。我想起一次参加外交活动，组织者安排我下榻

在荷拉德卡尼后面矮树丛生的大街上的一个地方，我绝望地发现自己竟然穿着考究的西装和浆得硬邦邦的衬衫，与大使及其属下坐在一起，他们只穿一件短袖衫，扣子敞开着，整个晚上大谈特谈布拉格的迷人魅力和布拉格人的大事小情。我想起一次晚宴，在玛拉·斯塔纳下面的城堡处有一家楼上酒店，兹德涅克和女儿金德拉步行至此，兹德涅克自嘲地说起他过去的往事，非常有趣，我们大笑不已。我想起一个寂寞的夏日的午后，在约瑟夫区，我站在街角，四下里望去，周围没有一个人影，我的心里突然生出一股莫名的幸福感，我不但活着，而且是活在布拉格，这个瞬间极其珍贵，因为它逝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另一个时间书写另一个城市时说，飘动的旗帜多容易变成羽翼啊。是的，多容易变形啊……布拉格，就像卡夫卡说的，长着爪子，不肯放人走。我从里佩利诺——我的灵感之源和永不厌倦的热情的导游——那儿引述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他写道："当我想为神秘寻找一个词汇时，我能找到的唯一的词语就是布拉格。她像彗星一样，阴沉而忧郁；她的美仿佛一团激动人心的火焰，在风格特异的艺术家手中被夸张变形，扭曲倾斜，散发出衰败的忧伤气息，在无休无止的幻灭中痴昧地欢笑不已。"

# 致 谢

现在，读者不难发现，我从安吉洛·马利·里佩利诺的作品《神奇的布拉格》里拿了不少东西，这本书由大卫·牛顿·玛丽内利翻译，马克尔·亨利·海姆任编辑（伦敦，马西米兰出版社，1994 年）。对此，我深表感谢。我也很高兴地发现，该书也参考了不少他人的作品。

书里所有塞尔费特的诗句都引自《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诗选》，由爱伍德·奥泽斯翻译，乔治·吉比安编辑并补译（纽约，1986 年）。

书中第 31 页中的引文出自约翰·怀兹达的《中世纪之秋》，罗德尼·J. 培顿与乌尔利希·马米希合译（芝加哥，1996 年）。

书中第 34 至 35 页中引用的卡夫卡作品节选自《城堡》，艾德利斯·派瑞译（伦敦 1994）。一本虽然古怪却有趣的小册子《弗朗兹·卡夫卡与布拉格》由哈拉德·萨尔费内翻译（布拉格，2002 年第三版），里面提及不少作家生动迷人的生活细节和他对布拉格的眷恋与抵触。此外，该书大量材料取自于作家的日记和书信。本书第 9 页、20 页和21 页的引文就选自萨尔费内的著作。

摄影家约瑟夫·苏迪克的传记内容和其他有关其作品的宝贵资料与艺术评论由兹德涅克·柯斯内先生提供，在此特别感谢他。传记《约瑟夫·苏迪克》中包含了艺术家的摄影精品、图示说明、个人回忆和创作笔记。我还要提到由索尼娅·布拉季和安吉洛·

罗密欧合写、由安娜·法洛娃作序的《苏迪克》（纽约，1986年）一书，这是有关苏迪克艺术创作最为精彩的评论之一，其中包括复制水平极高的摄影图片。我在书中引用的对苏迪克的大量评论都选自安娜的前言。

本书第67页中有关桥的思考，参阅了马丁·海德格尔的《诗·言·思》，阿尔贝特·霍夫斯塔德译（纽约，1971年）。

关于皇帝鲁道夫的那些段落，我特别要感谢R.J.W.埃文斯，他在《鲁道夫二世和他的世界》（牛津，1973年）一书中以客观、精细且不乏同情的笔调刻画了这个独有魅力的人物和这座造成其独特性格的城市。

弗兰克斯·叶提斯对约翰·迪的生平所述甚详，尤其在《世界剧院》一书中提供得更多。至于对运气极差的“冬之王”费迪南及王后伊丽莎白的短暂统治的记录，我参阅了叶提斯的《炼金术士的启蒙时期》（伦敦，1972年）和《莎士比亚的晚期戏剧：一种新方法》（伦敦，1975年）。

关于第谷·布拉厄的标准的现代式生活描述可参见维克多·E.托伦的《尤兰尼堡的地主——第谷·布拉厄传》（剑桥，1990年）。此外，基蒂·弗格森在《大人物和他的小狗——第谷·布拉厄与约翰尼斯·开普勒：科学革命中的奇异搭档》（伦敦，2002年）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和生动的故事，详细叙述了布拉厄与约翰尼斯·开普勒之间复杂多变的合作关系。基蒂·弗格森似乎和我一样，并未过分依靠托伦的权威传记。

米兰·昆德拉的《无知》（伦敦，2002年）由林达·阿舍由法语译为英文。扬·聂鲁达的《布拉格故事》（伦敦，1993年）由迈克尔·亨利·海默翻译。

还有一些资料来自随处可见的布拉格旅游手册，不过大多数的实用信息和记忆漫步之类的记录，我通常会参考迈克尔·雅各布等人合编的《蓝皮旅游指南：布拉格》（伦敦，1999年）和

弗拉吉米尔·苏库普等人合编的《亲历旅游导航：布拉格》（伦敦，1994年）。

我要向迪尔德丽·伯克、利兹·考尔德、H.E.约瑟夫·海斯、捷列扎·利曼诺娃、贾斯廷·奎因、安东尼·谢尔表示感谢。还有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圣玛德琳娜基金会理事贝亚特丽斯·蒙蒂·雷佐利和她的助手亚历山德拉·涅基·鲁斯科内。正是在环境优美、宁静的圣玛德琳娜，我顺利完成了布拉格的文字漫游。感谢所有人。

最奇妙的记忆留给了因德日谢卡·杜什科娃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
作者＝（爱尔兰）约翰·班维尔著　　张鹤译
页数＝２０７
ＳＳ号＝１１８７７８４９
ＤＸ号＝
出版日期＝２００７年０９月第１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